

# 炎黄春秋



在访美国途中的飞机上右起：邓小平、姚云



袁世凯的后裔及其亲属



## 我随邓小平访美

### 民谣：“要吃米找万里”

### 的来龙去脉

### 民初五大总统后裔

### 今何在

### 半鼻故里在英山

# 8

# '94



### 《老子出关》(局部)

老子，东周史官，周室衰，遂西游归隐。看，他那一双沉静的眸子凝而不流，望着远方，正在运思。正如太史公所说：“老子沉远矣”。

### 《双僧对奕》

看胖和尚已占上风，两眼笑成了一条线，看着对方下步棋如何走；瘦和尚已处下风，但不服输，正在蹙眉注目寻找对策。

# 张良仁国画选



## 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

1979年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世人记忆犹新。可是，人们并不太了解，在庄严隆重的外交活动和热烈友好的欢呼声里，掩藏着一种复杂的斗争，以及中美警卫人员为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访问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本文作者，原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同志所讲述的正是这方面鲜为人知的史实。

## “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龙去脉

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本文不仅回顾了安徽受“左倾”折腾的六十年代所经历的成功与灾难，也道出了七十年代一则流行民谣的来龙去脉。

## 康生是怎样扼杀历史学研究的

一本颇有影响的书，由于康生的粗暴干预，硬说是“利用历史研究进行反党”，遭到禁书毁版的厄运，作者也历尽磨难。作者在回顾中谈到不少问题，发人深醒。

## 江姐托孤

本文讲述了一个江姐托孤的故事，然而完全是真实的。这位江姐的患难之交，曾带着彭云背着“养私生子”的黑锅度日……

## 女诗人关露的苦难人生

关露，三十年代的女诗人，由于党的工作需要，深入敌营，扮演一个难堪的角色。此后，几十年被人误解，蒙受冤屈。1982年，她的冤案彻底平反后，她却悄然弃世了。

## 李立三在“文革”中为刘少奇作证

1967年初，刘少奇已是全国共讨之，全党共伐之的头号“叛徒、内奸、工贼”了。李立三处的境呢？与刘少奇的情况不相上下，同样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就是李立三公正地为刘少奇作证的真实背景。讲述这个事件的人，同时也提供了作证时的“原始记录”……

# 编读往来

《炎黄春秋》编辑部：

我是《炎黄春秋》的老读者，每期都要仔细阅读。今年贵刊进步明显，发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品都较详实，可读性强。尤其是第四期，多属上乘之作。这说明严肃负责，实事求是的作品，终会受到读者的认可和欢迎。比如《开国反腐第一案全景写真》，不仅写了刘青山、张子善犯罪的全过程，而且把各级组织对此案的处理决心与决定均作了详尽报道。刘、张二人在战争年代不愧是英雄，可进城之后的短时间内就变质了。读来令人惋惜，又令人愤慨。此文对目前在全国开展的反腐倡廉运动，尤其借鉴和教育意义。《省委书记——叛徒——烈士》一文，则对陈治平由革命者到叛徒，然后走上反蒋拥共的复杂人生之路，作了真实的介绍。一个人此时有功就是此时有功、彼时有过就是彼时有过。功过是非分明，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徐水、梦幻的天堂》一文，我们深感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假大空泛滥成灾以及欲速则不达，“超越阶段”的历史教训，后人当永志不忘。《最早为包产到户呼号的两个年轻人》，则讲述了两位平民百姓怎样忧国忧民，直言上书，为民请命而命运多舛的故事。使人感到，古往今来，说真话是多么不易！

总之，今年各期佳作着实不少。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书能兴邦，亦可乱世，不可掉以轻心。希望贵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精益求精，不断有力作问世。

顺作小诗一首，权当酬谢辛劳的作者和编辑们。

《炎黄春秋》在手，

可知历史风云。

严谨求实高雅，

读者良师益友。

江西省珠宝首饰进出口公司

朱秀生

# 炎黄春秋

1994/8 (总第 29 期)

# MU LU

特稿	英杰谱	求实篇	春秋笔	同心结
④ 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	③④ 李立三为刘少奇作证	⑤② 女诗人关露的苦难人生	②⑧ 康生是怎样扼杀历史学研究的	①① 张梦白与蒋纬国的师生情谊
.....	③⑧ 李立三的绝命书	①④ 「要吃米找万里」 民谣的来龙去脉	④⑧ 章士钊寻踪三格格 毛泽东感慨赞御妹	.....
.....	②③ 江姐托孤	.....	⑦⑤ 理想是顽固的——日伪南京警卫三师起义策划者钟血浪传奇	.....
.....	.....	.....	.....	.....
凌云	李思慎	尹骐	丁守和	张同新

### 顾问:

伍修权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征 冯其庸  
 张 锲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章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副总编: 刘家驹 杜卫东

理事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书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杨子建

责任校对: 张凯夫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 SSN1003-1770

社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编: 100802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出版日期: 每月 20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价: 3.20 元

# 目 录

时代潮	人海浪	古镜台	论谈窗	文萃园						
④2 笔魂 ——记书法家王明远	⑥6 感受超人 ——大气功师刘燕探秘	⑥0 民初五大总统后裔今何在 ——鲍国之	⑧3 「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乡亲相思债」 ——刘淮	⑦2 毕昇故里在英山 ——马民权	④1 我喜欢《炎黄春秋》 ——王景山	⑥4 陈立夫与中医学 ——程书惠 石林	②7 何应钦在台总当治丧委员会主任 ——程书惠 石林	⑥5 点睛传神 ——看张良仁先生的人物画 ——缪慧敏	⑧5 李登辉秘书雷秉章退休当算命先生 ——程书惠 石林	⑧2 齐燕铭遗札 ——吴泰昌

《炎黄春秋》1994年 第8期

## 要 目



- △一桩 60 年的迷案
- 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 △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
- △我和彭总在一起的日子
- △揭开甲午历史的黑匣子
- △我的军事外交官生活
- △张闻天在无锡的最后十个月
- △鄂豫皖战将许继慎之死
- △大难不死
- 公刘的右派生涯片断回忆
- △老舍为什么没领到诺贝尔文学奖
- △美国对中国核间谍大战
- △卢沟桥事变那一天
- △冲垮大清王朝的川汉铁路股票风潮

# 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

——邓小平访美安全警卫工作纪实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西方世界最后一个和我国建交的国家。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八天的正式访问。中美关系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开端。

我当时在公安部工作，奉命作为访美先遣组的负责人，先期赴美进行安排；随后又以特别助理（负责安全事务）的身分随邓访问了美国。十五个年头过去了，那紧张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人们不太明白，在庄严隆重的外交活动和热烈友好的欢呼声里，掩盖着另一种复杂的斗争：台湾和美国一小撮反华反共势力公开挑衅，秘密进行暗害活动；中美双方安全警卫人员则为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访问的成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和艰辛的努力。这是一场紧张和尖锐的斗争。

本文所要叙述的正是这个方面鲜为人知的史实。

## 访问前传来的警报

邓小平访美是一次历史性的成功的访问。美国政府出于国际国内的需

● 凌云

要，以及中美建交后在美国国内出现的对中国友好的新热潮，访问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重视和热烈欢迎，受到了相当于国家元首的礼遇。美国官方竭力宣传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国际舆论也认为，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然而，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无疑是一次重重的打击，对于美国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也是不能容忍、不肯甘心的。这方面反应之快出乎意料。中美《联合公报》公布后的数日内警报就不断传来。据我有关方面的信息：

——台湾一高级特务声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

——在美国的蒋方人员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企图暗害邓；

——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

——旅美的亲蒋组织和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令人感动的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炎黄同胞寄信给在大陆的亲友，要求及时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个盲动的美国极端分子组织，此次有计划乘邓访美时威胁我们副总理的安全”，希望中国政府“能确切地把握及安排，以确保我们邓副总理的安全……。”这封出于至诚的来信于1月20日即邓小平访美前八天由国务院办公厅转移到了我的手里。

对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一开始就给以极大关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拨正了航向，开启着我国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党心民心都关注着他这次的美国之行，希望访问成功，安全归来。警报的陆续传来，凡是知情的党内高级干部更是忧虑不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务院副总理耿飏、方毅、陈慕华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黄华、韩会龙、章文晋、伍修权、孔原、朱穆之、罗青长、凌云以及中央警卫局的负责干部等开了几次会，研究有关情况和应对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敌情严重，切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台湾特务机关的暗害活动，我们是领教过的，有过多次挫败它的成功经验，也有过惨痛的血的教训。1955年万隆会议时，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航空中爆炸事件，就是他们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场地工人安置的定时炸弹，企图杀害赴会的周恩来总理，幸亏周总理没有乘坐这架飞机，但我参加会议

的部分工作人员和去万隆采访的新闻记者却不幸遇难，损失惨重。1964年，台湾特务机关又阴谋乘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制造爆炸事件，谋杀刘少奇和西哈努克。这是一起未遂事件，在中柬双方合作下，人证俱获，事先击破了敌人图谋。现在警报又来了。“收买枪手”！应当作何估计呢？一种可能是故意放风恐吓；另一种是确有谋划和行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必须立足于第二种可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这是当时的决断。

美国社会情况复杂，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据当时了解，美国2亿人口，民间就有1.5亿支枪，每2分钟要响一枪，每24分钟就要打死一个人。美国暗杀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触目惊心，历届总统中就有：林肯、加菲尔、麦金莱、肯尼迪等四人遇刺身亡；有：杰克逊、T·罗斯福、F·D·罗斯福、杜鲁门和福特等五人遇刺幸免于难。暗杀重要政界人士的罪案也屡有发生，1968年4月黑人权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遭枪杀身亡就是一起震动美国社会的突出事件。我们与美国隔绝多年，对于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些都增加人们的焦虑和不安。

在一次会议上，耿飏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他说：邓小平的安危就是国家的安危，遇有情况，别人遇难可以，万万不能有他，一定要绝对保证安全。访美的活动安排，不仅要考虑工作需要，还要考虑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央常委决定派先遣组先期赴美进行安排。

## 先遣组赴美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长黄华将常委决定通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赵苍璧，而由凌云负责安全事务随邓小平出访，并先期去美打前站。

先遣组的组成人员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和专员唐龙彬，新闻司专员姚伟，中央警卫局处长滕和松，连我6人。中央电视台也派出陈汉元等三人与先遣组一同去美为摄制和播送电视节目作安排，到美后单独活动。

先遣组行前，对安全警卫有一个设想，要点是：1. 根据邓副总理的指示，在美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2. 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借手他人，由我们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3. 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组一行离开北京踏上了去美的旅途。途经东京、纽约，于当地时间1月12日晚上

到达华盛顿。先遣组受到我驻美联络处柴泽民主任等的热情接待。当晚就在柴的主持下，使馆党委和先遣组一起开会，传达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确保小平同志安全访问的重要指示，研究了有关情况。

据我驻美联络处的了解，在华盛顿和其他将去访问的城市，蒋帮和“台独”组织的“游行示威”已经具体化了。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服务处已发给蒋帮和“台独”组织许可证，许可自1月29日10时至18时在拉斐特公园和我联络处前“游行示威”。蒋帮扬言参加的将有2万人，估计可能有3至4千人，看来势在必行。另有消息说，蒋帮已拨发经费，收买流氓打手；不少蒋帮分子纷纷“南下”和“西行”（即南去亚特兰大和休斯敦，西去洛杉矶和西雅图，都是小平同志和方毅副总理将要访问的地方）纠集队伍，旅美亲蒋组织在纽约还成立了“联合支援中华民国行动委员会”。各派“台独”组织也在纷纷扰扰进行活动。

1月13日至17日先遣组与美方共同工作了五天。在华盛顿三天，一天是会谈，两天是现场考察。然后去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和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17日晚返回华盛顿，18日就离美经东京回国了。

先遣组与美方的会谈是在白宫举行的。上午大组谈。柴泽民主任和驻美联络处的同志和我们一起参加了会谈。美方由国务院礼宾司司长杜贝尔夫人主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助理奥克森伯格，联邦安全局（U·S·S·S·）负责贵宾安全的官员泰勒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官员参加。下午是小组谈，一个组继续谈日程和礼宾安排；一个组谈安全问题。由我和泰勒主谈。

会谈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美方承诺负责安全保证的问题。我们态度诚恳，表示信赖美方，相信他们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美方反应很明确。泰勒表示感谢中方对美方的信任，美方将对邓副总理这次访美的安全完全负责。泰勒还透露：卡特总统已下令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副总理的安全；整个安全工作将在安全局的统一计划和指挥下，组织警察、情报各方面力量来共同完成。

美方证实：台湾方面的人将于1月29日在华盛顿搞“游行示威”活动。泰勒说限于美国法律，他们无法制止，就连总统也不能制止，即使在白宫外面，只要不往里面冲，也无法干涉制止，但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之不能接近邓副总理，是可以做到的。泰勒说，根据美国的规定，游行队伍只能在距国宾馆500英尺以外的地方进行，到时你们可能会听到和望到，他不认为这会发生安全问题。我对泰勒说，“游行示威”是对中美

两国友好关系的挑衅，但我相信美国朋友会负责处理好安全问题。我强调说，中国有一句话：“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都是干的这个工作，都知道有时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害安全的事情，我想提醒美国朋友注意到这一点。泰勒表示，他们将会抓紧安全工作，发现什么可能发生的危险，会及时通知中方。

在会谈中，泰勒问我：代表团有多少安全人员？我告诉他：除我以外共7人，其中包括方毅副总理的一名警卫。这样少的安全人员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于想象的。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来中国访问，见之于名单的安全人员总有百数十人。事有凑巧，1月16日晚先遣组与美方人员同机由亚特兰大飞往休斯敦，我在机上得到一份当天的《亚特兰大日报》，载有一篇记者安妮·拜恩写的《卡特及其一家在“金尼与加比”餐厅》的文章，描写卡特一家在这个餐厅一顿意大利式午餐的现场警卫情况。文章引述饭馆经理的话说：“饭馆大概有50个特工人员。他们在房顶上，街上，街对面的房顶上，甚至在厕所里。”“还有大批的食物和药品局人员和警官们……”，还说到一些很具体的警卫措施。我把报纸送给泰勒看，问他事实是否这样？他看了文章说，基本上就是这样，是事实。我们与美国的安全警卫工作，差别是很大的。

会谈后，我们在华盛顿进行了两天的现场考察，除了白宫、国会、国务院、国宾馆，以及肯尼迪艺术中心等将列入访问计划的场所，双方就礼宾安排和现场的安全警卫部署进行具体协商，拟定方案。16日在亚特兰大，17日在休斯敦进行了同样的考察。美方派出了总统专机。杜贝尔夫人、奥克森伯格和泰勒等全程参加，并有联邦安全局的地方机构负责人参与。双方边看边议，在航行途中集中商谈，遇有需要请示的问题，美方立即与华盛顿白宫或国务院电话联系，及时解决。我们的日程安排很紧，由于美方态度友好，效率很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西雅图和洛杉矶（方毅副总理将去访问）两地，留待我驻美联络处派人会同美方去考察安排。

在华盛顿国宾馆现场考察时，泰勒和凯利向我们详细谈到了当年杜鲁门总统在这里遇刺的经过。杜鲁门因白宫住所正在修缮，一家人临时住到了国宾馆。宾馆对着白宫后门仅一马路之隔，是一所不甚起眼的临街红砖楼房，不大的一个正门就在数尺宽的人行道旁，门外门里都有武装警卫。每天早晨杜鲁门一定出来在马路上跑步。行刺的杀手正是摸准了他的行动规律，在宾馆附近突施袭击。门卫和随行的安全警卫人员全力卫护，展开一场枪战，杀手一死一伤，警卫人员也有两人



重伤，杜鲁门得免于难。经过这一次事件，他们对国宾馆的安全警卫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和加强措施，重点是防卫来自恐怖分子的突然袭击。我们详细考察了这里的安全设施，可以说是处处设防，如临大敌。深感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对付恐怖活动是保证安全的关键，一点也大意不得。

再说一件事。先遣组一到华盛顿就得悉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友协要在希尔顿饭店联合举行招待会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牵头的是杨振宁博士和美中友协会会长、一位美国友人，杨在纽约，这位友人在洛杉矶，实际主事的是在华盛顿的龙云的公子、龙绳文先生。他们出于同胞情谊和中美人民的友谊，热情很高，总想把规模搞得大一点，预定将有1200人左右参加，已经发出通知，每人只要缴纳30美金都可获许参加。我驻美联络处和先遣组却认为应当全力支持搞好这项活动，但对他们的做法有些不敢苟同，安全问题甚为可虑，应当提请组织者注意，通过协商，解决好这个问题。于是，约请杨振宁博士和那位美国友人于1月15日来华盛顿一叙，柴泽民和我同他们坦诚地谈了我们的意见，经过友好协商，商定：适当缩小招待会的规模，人数限定为500人，由联络处协同他们进行安排，有关安全问题应提请美方负责保证，所有参加人员也应当与美方合作，接受安全检查。就此，我们口头通报了美方。美方表示，计划的更改对安全有利，愿意负责安全保证。泰勒告诉我，他们将采取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在希尔顿饭店设置安全门进行安全检查，安排邓小平及少数陪同和警卫人员由单独的通道出入饭店，等等。后来当招待会举行时，场面极为热烈，又很有秩序，若干年后，里根总统恰恰在上面说到的这个通道出入口处的马路旁遇刺受了伤。看来安全防护要做到万无一失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事。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美国安全警卫人员在里根遇刺时的临场反应极为迅速有效，这证明他们说的，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都有应付的预案，否则恐怕是难于办到的。

先遣组于1月20日返回北京。21日耿飏召集会议听取汇报，并由先遣组写出关于访美安全工作安排情况的简报，印报中央常委。

1月23日，邓副总理召黄华外长、章文晋副外长和我以及外交部礼宾司卫永清司长在谈话。关于安全问题，他只说了几句话：简报已经看了，就照这样办；因为好多同志不放心，可以把简报批一下发给大家看看。随后他批发了简报。给我的印象，邓小平关注的是外交、政治、战略等大事，对安全问题，非常沉着冷静，给我们搞安全工作的人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1月24日举行全团会议。耿飏到会讲话，他非常细致地讲到了有关安全问题的一切细节，要求严密组织，严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又都是保卫员，动员大家从自身做起搞好安全保卫工作。

离开启程只有三、四天的时间了，华盛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华挑衅事件。我驻美联络处的临街玻璃窗门被砸碎了，门楣上的国徽被撬下了，联络处的名牌被涂洒上油漆。美国警察在五分钟内堵截抓获了肇事的歹徒，据报道是几个“美国革命共产党”分子。“这个‘党’，前身是1968年成立于旧金山的‘美国革命联盟’，1978年起反华面目日益露骨，贩卖‘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发表了大量反华文章，从制造反华舆论发展到搞反华活动了，破坏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在访问期间，我们还会看到它的丑恶表现。

## 紧张的八个昼夜

1月28日，邓小平乘中国民航专机离京赴美。同行的有方毅副总理和黄华外长等陪同人员20人，其余为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专机在上海机场稍事停留，美国派来的空军驾驶员和领航员二人登上飞机开始领航，径飞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格雷季。当地时间28日凌晨一时余抵达埃门多尔夫空军基地。阿拉斯加是远离美国本土的一个州，地处北美的西北角，气候寒冷，机场周围冰雪一片。我驻美联络处柴泽民主任和夫人，美驻华联络处伍德科克主任和夫人，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杜贝尔夫人，安全官泰勒和凯利等从华盛顿赶来迎接，并登上专机陪同到华盛顿。从安格雷季到华盛顿飞行约七小时。为期八天的正式访问开始了。

这次访问，在华盛顿共四天（1月28日至2月1日），然后相继访问了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三市。方毅还自休斯敦分道访问了洛杉矶市。

邓小平的到来，受到美国官方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1月28日14时左右，邓的专机在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以美副总统蒙代尔为首的政府高级高官到机场迎接；还有华侨代表200人列队欢迎。1月29日晚，在白官举行盛大国宴，接着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文艺晚会，卡特总统、蒙代尔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和他们的夫人，以及其他官员和社会人士二千多人参加。据说为欢迎贵宾举行这样规模的晚会在美国还是第一次。美国参众两院都友好接待了邓小平。参议院设午餐会，众议院设茶会，在华盛顿的议员差不多都来了，对议员们提出的问题，邓一一作了明晰的回答，议员们纷纷要求签名留念。1月31晚，邓

小平和夫人在我驻美联络处举行招待会，到来的人超出预期，大厅里挤得简直水泄不通，为邓致词作翻译的费斐女士几乎挤不上只有一尺高临时搭就的讲台。人人要求同邓碰杯，说几句说，抢拍个镜头，气氛之热烈感染了每一个人。乔治亚州是卡特的家乡，邓小平的来访引起极大轰动。美南部 17 个州的州长都赶来亚特兰大参加乔治亚州州长和夫人在州长府举行的晚宴，他们纷纷告诉邓：他那个州什么是世界第一，什么是美国第一，有什么大学，希望和中国做生意，交换留学生。在休斯敦，参观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几乎全体出动，看到不少在这里工作的华人。主人在西蒙顿市的野马野牛竞技场设晚餐，吃烤牛肉，观看骑牛骑马的竞技表演，轻松有趣，完全是美国西部风情。就在这里，邓小平结识了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先生，哈默兴起了同中国搞经济开发合作的念头，后来在山东省搞起了安太堡大型露天煤矿。邓小平把握这一切机会，同包括政经、新闻、科技的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做了大量工作，日程排得紧而又紧。邓小平魅力风靡美国。许多报纸都出了专刊，有的通栏中文标题写着：“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刊照片，登传记，介绍中国情况。传媒报道非常快捷。电视台每半小时就有一次电视新闻，据估计美国 2 亿人中差不多有上亿人看了有关邓小平访美的电视新闻。车队经过的地方，常有很多美国人在路口等着招手致意。这股邓小平旋风，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美国负责安全的官员对我说，这种热烈的场面对他们来说也是空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接待英国首相邱吉尔那一次以来再没有过的，是战后第一次。

但是，蚍蜉撼大树，一小撮敌对势力却一直在蠢蠢欲动。

人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是台湾国民党、“台独”和美国“革命共产党”等几股敌对势力策划的“游行示威”将如何出台表演。1月29日上午10时，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陪同人员先邓副总理到达那里，一眼就看见白宫对面(正是南草坪的正前方)拉斐特国家公园里旗帜、标语已经摆开了阵势，看不到人影，但隐约可以听到一点嚎叫声。参加仪式的中美双方人员谁都没有理会这个场面。欢迎仪式在两国国歌和 19 响礼炮声中准时开始了。这时我想到的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句话。下午，美方安全警卫人员陪我在国宾馆附近走了一趟，只见警方出动的人不少，“游行”队伍远隔在数百公尺以外。原来传言在华盛顿将集合起 2 万人的队伍，而据现场观察者反映，第一天台湾国民党的队伍顶多约有四五千人，来自自

美国东部的居多，主要是由台湾几个大学的留美同学会组织的，许多是花钱招来的。“台独”大约有三四百人。“美国革命共产党”人数较少，但活动很卖力。接着几天参与的人数就大大减少了，总共只有几百人在吵吵闹闹。他们拿着小旗一边摇晃，一边呼喊“口号”，终究成不了什么气候。美方的对付办法是依靠法律，依靠警力。法令规定，游行集会必须先登记，活动范围和集会场地的租用都须得到批准。

在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上，还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臂，大声呼叫。这时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美国 U·S·S·S 的安全警卫人员通称特工)立即上前掐住他们的脖子，架了出去。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在场的人们也都不动声色。处置这一突发事件前后只有三几分钟。当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在这样场合能够混进这样的人来捣乱，在今后几天的访问活动中能做到万无一失吗？！

第二天(1月30日)上午，我刚随邓小平的车队到白宫，泰勒邀我到白宫安全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去一叙。在那里见到不少人，其中一位华盛顿警方的负责人，还随同一位律师，他们是为解释昨天欢迎仪式上发生的事而来的。据告：按照美方的规矩，新闻记者参加仪式的采访是要事先登记的，这两人登记的是“工人报”记者，其实是“革命共产党”分子，事发后依法拘留了 24 小时并处以罚款后释放了。他们还通报：昨天傍晚白宫举行国宴的时候，“革命共产党”分子和“台独”分子聚在白宫外闹事，打伤十多名警察，警方当场拘捕了 20 多人。我感谢他们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同时提醒他们在今后几天的访问活动中一定要防范意外的突发事件，绝对保证邓副总理的安全。美方再一次作了承诺。泰勒对我说：“我们最讨厌的是‘革命共产党’分子。你别看台湾的人现在反对你们，过一个时候慢慢都会拥护你们的。”我笑着对他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可是我们共产党并不是你们这里的什么‘革命共产党’。”

2月1日，邓小平乘美总统专机离华盛顿飞抵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在桃树广场酒店下榻。抵达时约有数十人在旅馆旁的大街上集合，据称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约翰·伯奇协会”和某些宗教团体搞起来的。众议员、民主党人拉里·麦克唐纳是“协会”的成员，在现场发表了讲话。晚上在州长府晚宴时，也有少数美国人和华人在府外吵吵闹闹，对访问活动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中午，泰勒到我的房间来说：“亚特兰大市市长杰克逊先生在陪同邓小平阁下来旅馆的途中，邀请邓今天下午访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墓地。这是原先没有列入访问计划的，我们认为到那里去安全上有问题，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希望你能够施加影响，取消这个节目。”这是突如其来的问题，我踌躇了一阵子。我想，金牧师是黑人民权运动的著名领袖，1968年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在这个黑人众多的城市，由一位黑人市长邀请邓去访金的墓地，邓是不会推辞而且乐意去的，何况已经答应更不能说不去。但这又是美方第一次作为一个没有安全把握的难题提出来的。为什么不安全。泰勒不说，我不便追问，心里实在没有底。我对泰勒说：“既然是杰克逊市长提出的邀请，邓副总理接受，我方不能说不去，我也无法施加影响；去与不去应当由你们作出决定，如果去，你们必须对邓副总理的安全给以保证。”我要求一有决定尽速通知我。大约过了一点钟，泰勒又来了，高兴地说：“金的墓地可以去了，安全已经没有问题了。”“怎么变得这样快？”我问泰勒。他说，亚特兰大市的市政委员会刚才作出决定，在金牧师墓所在地区的居民从现在起一概不准出门上街，这个决定正在由电台广播。我要他立即陪我去墓地走一趟，到了那里，果然街区间静悄悄杳无一人，有一两个高楼顶上停有直升飞机在待命。原来那里是一个黑人居住区，墓地临一水塘，修缮得很整洁，看来一直受到黑人群众的崇敬和保护。回到住处，我把有关情况通知了负责随卫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邓在杰克逊市长和黄华外长等陪同下到金的墓地向这位黑人领袖默默致意，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美方安全官员原先之所以顾虑安全问题，到了墓地我就完全明白了。至于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出乎我的意外。

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敦访问。事先估计，反华势力将在这里搞起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合众社记者预料在邓下榻的赫亚特旅馆附近将有1000多人集结，这天实际达到的规模要小得多。有20名“革命共产党”分子在街上呼喊口号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访问车队去宇航中心时，路旁约有200多人集结，有华人也有美国人；在旅馆附近2日约有600人，3日减至150人左右集结在对面马路一侧，都是学生模样的年青人，大多是台湾国民党方面借口到南方旅游出钱从美国各地召来的。我走近他们的队伍，笑着看他们，他们也报我以微笑，并无敌意的表现。他们不了解新中国，是台湾国民党利用了年轻学子的幼稚。

出访期间的一次险情恰恰出现在这里。2月2日下午六时许，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市竞技场晚餐并观

看竞技表演。当他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我方的随卫人员在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我的位置又在他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把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人捉住了。邓小平在我方随卫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瞬息之间，化险为夷。事后，据美方告，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被拘捕后还有几个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这个三K党徒究竟想干什么，美方没有透露，我们也就不去深问了。我特意向凯利表示感谢，赞赏他的机警和果敢。他会汉语，当过水球队员，曾随福特总统访问过中国。他告诉我，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公安工作》。

当晚，我约请泰勒喝咖啡。把他索要的邓副总理的签名照片交给了他；我对他说：“鉴于今天发生的险情，还有三天的访问必须严密部署，确保安全。我们的要求是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泰勒笑了，说：“事情那能都是百分之百的呢。”我严肃地回答他：“对邓的安全绝不许有万一，一定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如果发现不安全的问题，希及时告我，实在不安全，有的地方可以考虑不去。”我说我们已是好朋友了，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够做到。第二天，美方的警卫部署显然升级了，动用了防暴队和大量的警察，一个个拿起了木棍子，还有催泪弹，高头大马的骑警封锁了路口，在旅馆周围和参观现场实际处于戒严状态。

2月5日，邓小平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飞经安格雷季、东京（在东京停留访问两天），于2月8日安全回到北京。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访问，对发展中美友好关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美国的 U·S·S·S·

这次随邓小平访问美国，使我对美国国家首脑和来访贵宾的安全警卫工作有一些表面的了解。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安全警卫工作的做法也有很大差别。

美国的安全警卫工作，体制上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它设有一个“联邦安全局”（U·S·S·S·），有的译作“秘密勤务局”，通常的称呼是“特工处”（我在本文中根据先遣组在美时的译称，一律作“联邦安全局”）。它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属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领导，这是历史发展形成的。早在19世纪中叶（1865年），为了对付伪币和偷税等犯罪活动在联邦财政部下设立了这个机构。以后美国多次发生总统被刺，依据美国法典第18条3056款，授权它执行对国家首脑等的

保护任务。法律规定由它保护的是以下九种人物：

1. 美国总统及其直系亲属；
2. 副总统及其直系亲属；
3. 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4. 当选总统和副总统；
5. 前总统及其夫人；
6. 活着而未再嫁的前总统遗孀；
7. 不满 16 岁的前总统的年幼子女；
8. 主要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9. 访美的著名外宾和出国执行特殊任务的美国官方代表。

对陪同国宾或贵宾来访的随同人员的保卫另由美国国务院的保卫机构负责。这是两个不同的机构，据说工作程序和方法也有所不同。

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人员既担负负币案件的刑事调查，又要执行“显要人物”的保卫，一身而二任，任务随时变换。联邦安全局在各州还设有它的常设分支机构。

美方对邓小平的安全警卫，按照他们通常保卫国宾的做法，自始至终由派出的一个小组负责。组长泰勒，副组长戴维·李。协调各方，统一计划，统一指挥。一般在某项活动开始前一小时，路线警卫，现场警卫都已布置完毕。警察就位，直升机或在待命或在上空巡逻；在“示威”队伍中还布有秘密特工及时了解动向，防止和处理突发事件。各个参观访问单位出面接待的人员事先早有安排，都佩有专制的徽标。美方人员和中方代表团人员以及对方的安全警卫人员各有不同的识别标志，访问结束，标志随即废弃不再使用。某些须要特别警戒的场合，为了防止和发现爆炸物，两小时前就率警犬勘察，查后立即封锁现场。

他们的问题是，动用的人力太大。这次邓在休斯敦访问，据说动用了 6000 人，自华盛顿至西雅图全程动用的人力达数万人，一行一动都形成一定时间一定地区或路段的戒严状态。财力的耗费也不小。美方安全官员告诉我，因为财力支绌，有些州接受下达的警卫任务已有困难，正在设法通过联邦立法来解决。安全警卫采取什么样的才式，决定于一个国家国情和各自历史形成的做法。我只是说说自己在当时的一些感想而已。

美国的安全警卫工作，重视技术装备的技术措施。他们有灵敏、畅通又保密的通信联络系统。高性能的无线话机人手一个，机上有编号有姓名，从机关，指挥中心到各个点和每个安全警卫人员都给联系起来了，得以及时下达指示，及时反映情况，保证行动的机动灵

活。

他们有现代化的检查和检验设备。即使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参加迎接国宾的人员，都得经过安全门接受检查。特别注意行李箱包的检查，这是保证航机安全的重要措施。

在美国，警犬在安全警卫中被普遍使用。一些活动现场都要提前几个小时使用警犬搜索检查，主要是防止爆炸物。警犬也用于一定部位起监视，岗哨作用。

因白宫安全警卫部门的好意，我参观了白宫的安全警卫设施。大概因为美国曾多次发生总统被刺事件，看来他们对总统的安全时刻处于戒备状态，我看了总统座车和随卫车，发现这些车按照安全警卫人的经验和需要，在结构和装备上不断有所改进。这些小改小革围绕一个目的：使安全警卫人员行动和操作方便，有利于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

我们遇到的美方安全警卫人员都很年轻，身体健壮，有高标准的人格，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严格训练，包括射击、拳术、驾驶、多种武器的使用、炸弹的识别和排除技术，等等，一个个都是多面手。某一个安全警卫人员今天驾驶来访国宾的座车，明天也许被派去侦破一起假钞，案件结束又可能去执行另一重要的警卫任务。他们执行任务很认真。泰勒是此行安全警卫的头头，几个大型宴会本来有他的席位，他都不入席，一直站在一个角落里警惕地观察、守卫着。这是美国人的敬业精神吧！

在访问期间，我们注意同对方安全警卫人员友好相处，通过协同工作，接触了解，相互增进了友谊。邓副总理给泰勒赠送签名照片，接见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深受感动，挠起大拇指对我说：“邓小平，伟大人物。”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还想说几句话：①尊重对方，将安全责任交予对方完全负责，是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安全警卫工作唯一可行的正确方针；②安全警卫工作要与礼宾工作紧密结合。这次与礼宾司司长卫永庆等协调配合，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不少是直接为安全服务的；③全团人员都是保卫员，也就是说安全警卫工作要走群众路线；④依靠对方负责安全警卫，同时必须组织我们自己的安全警卫力量，加强近身护卫，以确保安全。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这次访问，中央警卫局孙勇副局长以及他率领下的警卫干部，只有六七个人，他们忠于职守，默默无闻，日夜操劳，刻苦努力，对于保证安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

# 张梦白与蒋纬国的师生情谊

●张同新



由于课题研究的需要，我有幸在苏州大学访问了蒋纬国先生当年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梦白先生。

张教授生于1910年，原籍江苏常州，久居苏州。近年他虽然已经退休，但仍在教学第一线耕耘，依然精神饱满、老当益壮地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曾任民盟苏州大学总支部组委、政协苏州市委员会常委、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任东吴大学校友总会会长、苏州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他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前身），1930年毕业后留院任教，对世界史颇有研究。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苏州东吴大学原址改为江苏师范学院，梦白教授留校继续任教。1978年起，兼该校历史系副主任。1982年，江苏师范学院改为苏州大学，他继续执教，兼任许多学术团体的职务。60多年的杏坛春秋，使他的同窗、弟子遍布海内外。他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84年9月，他应美国康乃尔大学历史系的邀请，作为亨利·卢斯学者前往讲学与考察，并应邀访问10余所大学，作公开演讲20余次，受到好评，被誉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1985年，美国“斐陶斐荣誉学会”遴选他为会员。1992年冬，张教授接到“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通知，授予他1991—1992年度“国际名人”殊荣，以表彰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1993年4月收到正式证书。接着，该中心又给他寄来Men of Achievement证书，决定在Men of Achievement一书中，以“国际名人”载入他的传记，收入将于1993年冬季出版的该书第16卷。1993年5月，张教授又接到“美国传记协会”的通知，选定他为

500名具有影响的人士之一，将其传略及照片收入该协会定于1994年出版的第二集《五百有影响的著名人士》一书。现在，他正在担负着繁重的海内外联络工作，为振兴中华、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祖国的统一进程而努力工作。

这天，张教授在苏州大学民主党派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此后的几天中，张老又同我作了数次交谈。他虽然已83岁高龄，却耳聪目明，思路敏捷，走路稳健有力，精力充沛不亚于中年人。他阅历颇深，学识渊博，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他的心中，不仅装着一部东吴大学——苏州大学的沧桑演变史，而且装着一部中国与世界的近现代史。

## 与蒋纬国的师生情谊

张教授是蒋纬国先生的业师。提起往事，他浮想联翩。

那是1928年的事情。12岁的蒋纬国由养母姚冶诚带领来到苏州读书，因宅院没造好，母子暂住吴忠信先生家中。后来，在网狮园附近蔡贞坊7号的一幢二层楼房建成，姚冶诚带着蒋纬国及她的侄子，搬到这里居住。

蒋纬国在苏州读书，学名蒋建籍（其兄蒋经国，名建丰。丰，周文王的都城丰邑；籍，周武王建都镐京。蒋介石在溪口建造的蒋家住宅叫丰房，他的两个儿子便分别叫建丰、建籍），他先在上海读小学，后到苏州考进东吴大学附中。蒋纬国升入初中三年级时，世界史是必修课。刚毕业留校任教的张梦白先生第一次给蒋纬国上课。纬国升到高中三年时，世界史还是必修课。

张梦白先生第二次教他；纬国进入大学部，一年级时读理科，二年级读文科，而世界史依然是文科的必修课程。这样，张教授第三次给蒋纬国授课。东吴大学是一所著名的老校，教学组织严密，师生之间都很熟悉，张教授又三任蒋纬国的授课老师，情感非一般师生关系可比。张教授长纬国6岁，虽然已经事隔多年，但回忆当年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据张教授回忆，纬国在东吴读书时，与一般同学没有两样。尽管他身份特殊，却从不提起家庭的事情，学习、生活都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他学习努力，生活俭朴，酷爱体育，少年时加入过童子军。至今张教授还珍藏着纬国与他的童子军同学的合影照片。纬国热心公益，乐于服务，与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当时学校体育设施不足，计划募捐修建体育馆。纬国积极响应，以养母姚冶诚的名义捐献了1000元，促成了体育馆的建造，日本侵占苏州期间，这座体育馆成了侵华军的仓库，地板遭到严重破坏。现在早已修复如初，仍作苏州大学的体育馆。纬国尊敬师长，与同学团结友爱，在苏州度过了8年的读书生活。1936年他依父命离开东吴大学，赴德国学习军事。

抗日战争爆发，东吴大学内迁。蒋纬国结束在国外的学习生活，返回在军队中服役。在战争环境中，人各一方，他们师生间一直未能取得联系。抗战胜利后，蒋纬国不时到上海、苏州，他们彼此倾述各自在抗战期间艰难生活的情景。后来，在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中，蒋纬国到了台湾。他们分别40多年，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师生之情，终生不忘。张教授与蒋纬国先生虽然分处海峡两岸，却都有恢复联系的心愿。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来往人员的逐渐增多，恢复联系的条件成熟了。

1990年11月，赴台经商的俞国尧先生回乡探亲，张教授拜托他给蒋纬国带去苏州特产香木片1991年小挂历。纬国收到老师的礼物，得知老师的近况，心情激动，思绪万千。同年12月，蒋纬国给张教授回信，向老师汇报分别之后的生活情况，字里行间寄托着对老师的深情厚意。很快，鸿雁飞书，纬国接到了老师的复信。纬国见到与老师的联系已经接通，于1991年春，给老师寄来他的两幅近照：一幅是纬国的半身相，上款写：“梦白吾师赐存”；下款为“受业蒋建镛敬赠”。另一张是纬国先生的戎装之照；他是三星空军上将，64岁在台湾退役，70岁除役。他为试验一下自己70岁这一“从心所欲”年龄的体力状况，曾驾机重上蓝天。这幅照片是他在除退役之后飞行的纪念照。张教授复信致谢时，也寄去在校园内所摄影照。纬国先生迅即复函

称：“得手书，拜诵之余，悦如晤面，见玉照，得睹吾师奕奕神采，精神矍铄，快慰奚如”；又云：“吾师热忱于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令人感佩”，充分表达了学生对老师一生辛勤耕耘在培养人才的花园中，无限崇敬的情谊。期望师生能早日相见；张教授访台之后，师生间的情谊更有所增进。93年间纬国给老师的来信，情意格外恳切，信中说：“3月间，吾师于百忙之中，应邀跨海东来，参加此间东吴母校之校庆活动，具见对母校及在台校友之关爱，校友们也得重沐春风，叙阔契之情，引为人生快事。惜期间适逢纬国诸事丛铤，吾师行程紧凑，畅谈仍有意犹未尽之感”。信中还写道：“先生从求学至执教，在母校至70余载，诚难能可贵，亦杏坛美谈；吾师对母校之建树，不言而喻。化雨均沾，桃李天下，而今仍不懈为校友间之连系，热忱未减初衷，其恒诚不渝之精神，不由得令人敬佩与感激。师生情谊永恒，洵非虚话！”

提到蒋纬国先生在苏州的故居，张教授特别向我介绍，蔡贞坊已不见踪影，而那幢楼房还在，且已修饰一新，现在是南园宾馆的7号楼。张教授亲自陪同我到南园宾馆参观这幢楼房。宾馆公关部副经理王蕾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介绍说，这幢楼房仍保持原样，内部门厅也未改建，只是楼内的居室稍作改动。她诚恳地讲：“欢迎蒋纬国先生回来看看，我们一定在原屋热情接待。”她还把珍藏的这幢楼房的彩色照片送给我。张教授已经把这幅照片放大，准备寄给在台湾的蒋纬国先生。我想这幅照片一定能够引起蒋纬国先生对往事的许多回忆。

### 师生的共同心愿

张教授满怀深情地介绍了他去年3月应邀赴台湾访问的情景。

张教授此次赴台，是应台湾东吴大学的邀请，参加东吴大学的校庆活动。

原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从前美国在华创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东吴大学是其中之一。其办学宗旨为“注重学业，培养品格，树立优良学风，提倡服务精神”。这13所大学在台湾的校友，依然对母校念念不忘。于是，东吴大学的校友在台湾创办了东吴大学。现任校长是章孝慈先生。另外12所学校在台中合办了东海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继承老东吴的传统，每年3月举行校庆典礼，同时开运动会，以示发扬东吴的建校精神。1992年冬，章孝慈校长寄请柬给在苏州的东吴大学校友总会会长张梦白教授，邀请他赴台湾访问，参加1993年的校庆。张教授赴台后，不仅与阔别多年的学

生蒋纬国相聚，畅谈今昔，而且见到了台北东吴大学董事长王绍楮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李崇道先生等许多东吴老校友。故友相见，欢悦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3月13日，台湾东吴大学举行盛大的校庆典礼。张教授作为大陆东吴大学校友总会会长、老一辈教育家，被尊为上宾，坐在主席台上。当蒋纬国先生向大会介绍张教授时，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张教授起身，向参加大会的全体人员致谢。蒋纬国在校庆会上讲话，很简短，他说：“今天是母校的生日，让我们一起祝母校生日快乐！”于是，他指挥全场高唱，“祝你生日快乐”。14日，张教授观看了东吴大学的学生运动会，参加了他们的游园活动，亲身感受到台湾大学生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在以后的几天中，经过主人的周密安排，张教授由专人陪同，到各地参观访问。台湾大学生及各界同胞的勤奋、竞业、尊师、敬老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教授在台湾访问期间，蒋纬国先生十分亲切地同他几次欢叙交谈，倾述几十年的师生情谊。蒋纬国先生送给老师几种著作：一本是《宏中论》，认为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做人的根本之道，主张宏扬光大；一篇是《论中国之统一》提纲，主张采取务实步骤，加快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其中中心思想是：1. 主张一个中国。2. 让中国人都能过上好生活。3. 中国要有独立富强的国际地位，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另有中文本及中英文对照的书籍和文章。蒋纬国先生向张教授表示，他希望能有机会回到大陆，看看故乡，看看母校，会一会昔日的同窗故友，共叙手足之情。

蒋纬国于1940年由父亲主婚，娶孝感富豪石凤翔之女石静宜女士为妻，二人相敬如宾。纬国在给老师的信中曾介绍他的生活情况。1953年石静宜女士在台北病逝，他十分伤心，过了4年的单身生活。1957年幸与广东省籍的丘女士结婚。丘女士非常贤慧，他们生活

和谐，家庭美满。1962年，他们得子，取名“孝刚”。孝刚先在台北求学，后留学英、美，获学士、硕士学位，现在纽约任律师。他与北京籍的王女士结婚。王女士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知书达理，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张教授在与台湾的昔日同窗、学生及年轻一代的广泛交往中，深深体会到两岸同胞的骨肉之情。大家的共识是：海峡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应当齐心协力，共同建设国家。中国的统一与富强，帝国主义不高兴，他们总是企图阻挠我国的统一。台独势力没有国外势力的支持，是不会有作为的。他们在台湾人民中间拨弄是非，离间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之间的民族感情，是不得人心的。蒋纬国先生致力于团结全球炎黄子孙，主张四海同心，共兴中华。他时常提醒大家，要警惕外国势力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台湾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月刊》社社长吕士朋教授，在该刊158期上发表《为开创国家民族光明前途向海峡两岸领导当局进一言》的文章，对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个人意见，颇有见解。其中，力主两岸以“高峰会谈”的方式，选择黄帝陵为谈判地点，具体商谈国家统一问题，尤其特色，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张教授在台湾也亲眼看到纬国先生热心公益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台湾东吴大学新建一座综合大楼，其中有一座礼堂，纬国先生是建筑费用的捐款人之一，并为这座礼堂命名为“传贤堂”。学生的美德如初，老师感到分外欣慰。

张教授的台湾之行，会见了老朋友，结交了新朋友。他回到苏州大学不久，台湾东吴大学将他在台参加各项活动的照片，用精制的相册装帧好，给他寄来。张老拿出这本充满同胞手足之情的相册，向我介绍每一张照片的活动内容。随着张老的介绍，我深深感受到海峡两岸同胞的脉搏在一起跳动。

## 欢迎订阅《华夏文化》

《华夏文化》为普及性学术文化刊物（双月刊），全国公开发行，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主办，顾问为白寿彝、任继愈、李滔、张岱年、季羨林先生，主编张岂之。

本刊辟有“文化评论”、“炎黄文化”、“历史文化”、“山水文化”、“古典文学”、“文字书法”、“医药养生”、“文化百花园地”等栏目。欢迎社会各界

惠赐大作，以光篇幅。大作一般请勿超过4000字，请寄西安市太白路北段一号《华夏文化》编辑部张凯之收，邮编710069。

本刊于今年7月进入全国邮发系统。编辑部同时办理零售和订阅业务，购买者将书款汇至《华夏文化》杂志编辑部，立即奉寄本刊。联系人：张运华，电话：(029) 7215036 转 2982。

# “要吃米找万里”民谣 的来龙去脉

——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

● 吴象





编者按：

大跃进时期，安徽是受左倾错误折腾的重灾区，出现过“重新挑起讨饭篮子”“背井离乡”的惨景。1961年，安徽实行责任田，大范围成功。不久，却遭受无情打击，责任田被迫彻底“改正”。1977年6月，万里主持安徽工作，大胆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安徽农村重又“风调雨顺”，始有“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流传。

责任田的内容很简单，可是，它在安徽及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风雨却是非常复杂和惊心动魄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本文所要触及的深义。

## 受“左”倾错误折腾的重灾区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不是偶然的。在多方面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安徽是受左的错误折腾的重灾区；第二，六十年代初安徽全省范围内搞过“责任田”；第三，当时有一个勇于开拓、实事求是的省委领导班子。

安徽地处江淮，气候条件适宜农业发展。古代曾经是粮食集中产区之一。黄河夺淮后，大量泥沙淤塞了淮河及其众多的支流，形成淮河流域多灾的局面。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毛泽东毅然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随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治淮斗争。

但是，“左”的错误比之自然灾害为害尤烈，其造成的损失是遍及全国的。安徽可说是全国的重灾区，而凤阳又可说是安徽的缩影。1989年12月，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为《乡村三十年》的书。这本近百万字的专集，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与中共滁县地委在1981年共同商定的一项科研项目，是凤阳县建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录，材料记录了从1949年到1983年35年内在这个拥有46万人口、140万亩耕地的县份发生的多起大事、小事；记录了农民与干部、社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与演化；也记录了农村多种规章制度的安排与变迁。如此详实又如此系统，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历史上，凤阳县以出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身背花鼓走四方”而名闻遐迩，是个十年九荒的穷地方。《凤阳县志》称，人民“饥寒困苦，他处人

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直到新中国成立，凤阳人民才翻了身，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之后，第一次过上温饱不愁的日子。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解放初期那些虽然并不宽裕却充满希望与欢乐的日子，没有几年就重新被失望、痛苦所代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凤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跟着党进行过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左”的错误不仅未能使这些转化为积聚起来的社会主义财富，反而成为一股破坏力量，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大跃进”实际是对农业生产力的大破坏，“人民公社”也没有架起一步登天的“天梯”，而是使凤阳人民重新挑起了讨饭的篮子。

请看，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刮起来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风）多么猖獗：

共产风层层刮，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有些人昏头转向，说什么“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刮的范围无所不包，大的有劳力、耕畜、土地、机器，小的有锅、碗、瓢、勺，有的竟发展到拉牛、拖耙、扛犁子、调粮、集中家畜家禽、扣款扒房、并庄，乱来一通。

浮夸风，弄虚作假，前所未有的。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1.5亿斤，上报4.05亿斤；全县只有141.2万亩耕地，1960年春种就上报播种面积184.8万亩……造林方面浮夸更为突出，3年全县栽树13.2万亩，上报绿化荒山隙地72万亩。有的公社把社员私人的大树移栽到公路旁，有不少这边没活，那边也搞掉了。



干部强迫命令、搞瞎指挥及生活特殊化日益严重。无偿平调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经常加班加点，随意增加劳动强度，尤其是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的问题更多，进一步助长了某些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多吃多占，肆意压制、剥夺农民，终于实在办不下去而不得不予以解散。但是，“左”的指导思想未从根本上解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加码。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是紧密相联的。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反而用层层下压的办法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干部被斗得无法，只好带人去逼社员，造成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

“左”的错误导致“五风”猖獗，其直接结果是农业生产力的大倒退，大破坏。突出表现为：

- ①劳力减少，土地荒芜。
- ②耕畜死亡，农具残缺。
- ③产量下降，费用上升。

④饥荒外流，疾病死亡。1959—1960年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7.7%，最多的是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和闭经。人口死亡现象惊人，两年中共死亡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相当部分属于非正常死亡，出现了很多孤苦的老人和孤儿。更恶劣的是有些地方竟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3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这就是当年在安徽不少地方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的真实情景。在这种情况下，50年代中期曾在芜湖地区出现过的包产到户便以“责任田”的形式再次在农村中出现了。

## 责任田：大范围的成功试验与更严厉的无情打击

“责任田”得以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是同当时中共安徽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倡导与支持分不开的。

省委面对当时全省农村严峻的现实，认为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必须从改进经营管理体制、加强生产责任制入手。1960年底开始采取划小包产单位，实行包产到组、认真评工记分、超过底分奖励的办法，对恢复生产起了一定作用。省委进一步寻求更好的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途径。恰好这时发现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典型。

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叫刘庆兰的老农，73岁，儿子有肺病，人们劝他进养老院。他向公社党委提出，公家有困难，现在我还不能靠公家吃饭，要尽我的力量做事。1959年他带儿子进山，一面养病，一面开荒种地。第二年收了3300斤粮食，父子二人生活无虞，还交给队里1800斤粮食和60元现金。刘老汉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不然社员混工分，生产搞不好。这个建议引起了曾希圣的重视。

1961年2月14日，曾希圣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会议表示赞成，但又感到有风险，确定先在小范围内试点，遂选定合肥市郊蜀山公社井岗大队仅28户的南新庄生产队为试点单位。基本做法是：包产到户，按大小农活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称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简称“责任田”。实行后社员积极性高涨，普遍认为“有了奔头”。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南新庄试点经验，决定扩大试点。3月7日，曾希圣到广州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在华东组介绍了南新庄的做法，引起邻省的关注和议论。后来，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立即把毛主席的话转告省委，并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于是省委又通知各地、市、县委，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然而，3月28日，曾希圣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广州会议精神时，却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并让省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各地停止推行。但这时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实行责任田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耕畜、农具增加，庄稼种得足，管得细，长得好，一片丰收景象。责任田被农民誉为“救命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形势、活跃市场、改善城市供应，起了极为明显的积极作用。省委经研究后决定继续推行。7月24日，省委给党中央、毛主席、华东局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对“责任田”作了详细剖析，指出这个办法不是分田单干，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最后强调这个办法“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到10月中旬，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增加到84.4%。

但是，为时不久，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安徽代表有人在揭发安徽农村中刮“共产风”带来的严重问题时，指责推行



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接着，省委被中央改组，曾希圣和曾经积极推行责任田的省委其他负责人都受到批判，撤销和调离工作。

改组后的新省委多次举行会议，对责任田进行严厉批判，并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指出：“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是在农村中从1959年以来发生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情况下搞起来的。当时省委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用普遍推行‘责任田’的办法，来迎合一部分农民的单干倾向。”

报告接着指出：“包产到户势必分田到户，社员把分的包产田都看作私人财产，埋界石、插牌子，各人打各人的算盘。生产计划、农活安排就无法统一。”“至于分配，粮食分户收打，产品归户掌握，生产队要挨户摊交，而包产又普遍偏低，有些社员还瞒产少交，结果统一分配也无法保证。总之，包产到户造成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大量矛盾，助长了社员的私心，削弱了集体观念，使集体经济趋于瓦解。”

报告针对前一段时间认为“责任田”不是分田单干、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私心这三点，一一加以具体驳斥，上纲上线批判。

3月20日，新省委正式作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指出：“我省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责任

田’办法，与中央‘六十条’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办法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过来。”

决议下达，逐级传达贯彻，开展严厉批判。但是，责任田深得人心，“改正”责任田引起群众与干部思想上的困惑，多数人有抵触情绪，进展得并不顺利。到1962年8月，只有36595个生产队改了过来，仅占全省生产队数的12.2%。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三股黑风”，即“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批判包产到户，正是重提阶级斗争的导火线，成为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十三次会议进行传达贯彻。此后，责任田再一次受到更严厉的批判，不久即被全面改正。

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安徽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甘冒风险为责任田进行了大胆辩护。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关于保荐责任田

办法的报告》。这个报告以太湖县推行责任田前后的鲜明对比，肯定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反映农民热烈拥护责任田。他说，太湖县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荒、逃、饿、病、死”一字不漏，生产条件极差。在实行“责任田”后，一年之内而且还在遇到105天干旱以及后来遇到风灾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粮食总产比1960年增长了81%。“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这就是责任田好’。”

他还对责任田的优越性作了进一步分析。“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完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又说，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占90%以上。”毛泽东审阅钱让能的报告后，批给在北戴河开会的代表，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太湖籍的干部到太湖农村调查，调查者耳闻目睹家乡父老由于实行责任田而解决了温饱问题，转变了原来的怀疑态度，反过来赞成责任田。后来在反“右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钱让能和前往太湖调查的同志均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得到平反。

中共宿县符离区委也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列举了责任田的十大优越性。还说，“我们全体同志，经过反复讨论，觉得在当前很难找出比责任田办法更简便易行，更能有效增产，更容易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的办法。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责任田办法是个比较好的办法。”

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也引起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关注。1962年6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反映他在本月16日路经安徽滁县专区嘉山县管店公社，看了车站、邱郢两个生产队的情况。他说“这两个队土地都已分到户，由户包产，责任到田。问了几个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

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也曾派两位同志到安徽无为县了解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1962年5月7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派人来安徽当涂县和宿县进行调查，也肯定了责任田的优越性。后来邓子恢在北戴河会议上又向毛泽东推荐责任田，受到严厉的批判。

尽管安徽广大农民衷心拥护责任田，尽管从中央到基层有许多同志和党组织上书、争辩、提建议，责任田还是被迫彻底“改正”了。

## 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产为中心

1976年对新中国来说，是深沉悲痛与巨大希望交替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3位深受人民爱戴的领袖在短时间内相继逝世；4月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一次被打倒；7月唐山发生了24万多人丧生的特大地震。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全国人心惶惶，有大祸临头之感。出乎意料的是，10月初“四人帮”就被粉碎了。阳光终于冲散了乌云，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新中国得救了！”“中华振兴有望了！”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年动乱使中国元气大伤，国民经济濒于破产。但是，造成这场灾难的“左”倾错误，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并未因“四人帮”被粉碎而得到纠正。

1977年举行的党的十一大，尽管重新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但由于强调“抓纲治国”，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实际上仍然在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从而使广大农民的希望再一次落空，农业生产无法摆脱长时期低水平徘徊的困境。更加上“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运动特别积极，政策上“左”的偏差及强迫命令、瞎指挥特别严重，批判、斗争的气氛特别浓，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幅度特别大。1977年全省287238个生产队，只有10%能维持温饱，67%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大部分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有些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1977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安徽省委，万里出任第一书记。行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同他谈话，对派他去扭转安徽的严峻局面寄予厚望。

万里到安徽后，采取果断措施，雷厉风行地揭开了被“四人帮”代理人捂了8个月的盖子，迅速排除了派性干扰，整顿、安定了社会秩序。接着，他亲自下乡去搞调查研究，拨乱反正。

3个月内，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个地区的县、市和工矿农村。他痛切地感到，安徽是个农业省，而农村的问题却比城市的问题还严重得多。在不少村庄，他走进农民简陋的草房，看到的是土墙土炕，一根横在墙上的竹竿可以放下全家的衣物；在铁路线上，他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在大别山老区，他看到年迈的老人，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小屋



里，光着身子披着破棉袄，棉絮已快撕完，米缸露了底。这一切，使这位战争年代久经锻炼、素以临危不惧、冷静果敢著称的共产党员，竟压抑不住内心的感情，发出了深深叹息：“解放快30年了，没想到老百姓还这么穷！”

在此期间，他收到滁县地委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反映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歪曲篡改党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竭力散布“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的谬论和造成的恶果。他们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说成是“老一套”、“过时了”；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诬蔑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把社员按政策规定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攻击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把勤俭办社方针攻击为“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把开展集体的多种经营攻击为“金钱挂帅”等等。这样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弄得一些老干部不敢讲政策，新干部不敢学政策，讨论部署工作不研究政策，检查生产不过问政策，以致社、队经营管理混乱，多劳不能多得，分配无法兑现，社员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联系自己农村之行，他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滁县地区的情况是否带有普遍性？拨乱反正是否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入手更符合广大农民的要求？

为了摸准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省委又组织有关单位，作专题调查，解剖典型，分地区召开政策调查汇报会。在多方调查、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召开了省委

常委会议，核定并通过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后简称“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在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万里和与他同时调来安徽的省委第二、第三把手顾卓新、赵守一及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王光宇、省委秘书长袁振等领导核心，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共识。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四人帮”在农村的流毒和影响很深很广，要害是破坏了党的政策，不顾群众死活，使党严重脱离了群众。因此，从抓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入手，把揭批“四人帮”与解决农村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才能打开当前复杂、困难的局面，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尽管文件已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多次反复修改，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几位主要领导人仍不放心。他们又一同下乡邀集公社、大队、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代表开座谈会，亲自逐条宣讲，征求意见，边听、边记、边修改，使有关条文的提法更加妥贴、完善，然后，在11月中旬召开有地、市、县委和省直各部门第一把手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对草案进行认真讨论，反复修改，最后一致通过，方作为省委的正式文件下发各地执行。

文件一经与群众见面，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过去很少见过的盛况。有些大队通告一户派一个代表

到会，社员听说是讲政策，都争着来了。屋里坐不下，到场院里开会。有的听了一遍不过瘾，让宣讲人再讲一遍、两遍，高兴地说：“省委就像到我们院里看过一样，条条讲到了我们的心坎里。”

但是，七十年代后期仍然是盛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对多数干部来说，“左”的影响还十分顽固。有些人见了《规定》草案一直忐忑不安，怀疑省委是不是搞错了：“怎么以生产为中心，纲跑到哪里去了？！不怕批唯生产力论么？！”当时，北京正开着两个农业方面的会议。一个由各省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中心议题是如何大干快上，强调的是深入学大寨，大抓科学种田，加速农业机械化。另一个会，召集了部分省、区的一些处级干部，座谈农村情况，交流经验。反倒是他们反映的问题比较实际、深刻。大家认为农村形势严峻，浮夸、说假话之风盛行，农民生活贫困、温饱难保的面越来越大，有些名声远扬的典型实际上也是“高产穷队”。因此当务之急是调整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就是在这个会上，有人介绍了安徽的作法，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后来《人民日报》派记者去采写了长篇通讯——《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1978年2月3日在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文章加了编者按，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一组报道，对人们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从“四人帮”造成的混乱中清醒过来，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8年一开始，安徽省委就全神贯注狠抓《规定》的贯彻落实。2月15日，万里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大轰大嗡。问题看准了就解决。务必使今年全省生产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他说：“抓生产为什么老是扭扭捏捏？主要因为指导思想不明确，不清楚以什么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还干什么呢？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军队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哪个县委耽误了生产，把生产搞坏了，就要犯新的错误。今年秋后，哪个县再有农民外流讨饭的，就带到县委书记家里去吃饭。”但是，天不作美，1978年安徽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大部分地区河水断流，塘库干涸，人畜饮水紧张。春天旱象刚刚显露的时候，万里就巡视各地检查抗旱情况，督促制定抗旱规划。他说：“大旱，是对人的考验，是坏事也是好事。老天爷和我们对着干，把我们的部署搞乱了，怎么办呢？首先是午季<sup>①</sup>即将到手的粮食，要突击抢收，颗粒还家，口粮一定要留足，千方百计让老百姓有饭吃。”他动情地说：“我到定远一个公社调查，问农民有什么要求，回答是吃饱肚子。再问还有什么要求，他指指肚子，说‘少装点山芋干’。中国的农民太好了，他们的要求

就这么低，而这样简单的要求还没有实现。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

到了9月，安徽的农业基本上定局，估计全年比计划要减产几十亿斤。万里提出要正视现实，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荒。他在9月8日的常委会上说：“4500万人民一人一张嘴，一天得吃3顿饭，这足以看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减了产就是减了产，不正视不行，要实事求是，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人没有饭吃，安定团结就没有物质基础。”他说：“我同几位主要领导共同研究，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措施。一是‘水路不通走旱路’，除了水源确有保证的，都要下决心改种旱粮；二是‘借地渡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地可以借给社员扩种小麦，明年收购时不计统购，由生产队自己支配；三是放手发动群众多开荒，谁种谁收谁有；四是划一点菜地，要尽量保住老母猪，猪是一个肥源，也是群众收入的重要来源。”

本来，《省委六条》就使一些人忐忑不安，那么，“借地”就更让人心惊肉跳了。有人再三提出这样做违反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万里回答说：“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那还要你这一级领导干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根本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贯彻执行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也有个同各地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切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作教条，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照搬照套，或硬往下灌。这不是什么组织纪律性强，而是一种对革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六条》和“借地”使广大农民受到巨大鼓舞，抗灾的信心更强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依靠政策的力量，安徽战胜了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夺得了接近正常年景的收成，逃荒、外流的比往年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上上下下改革的劲头十足，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 大胆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

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万里就匆匆赶回合肥，1月3日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他说：“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反映了举国上下的要求，对党和

<sup>①</sup> 即夏季，安徽方言。

国家的历史发展有深远意义。20多年来，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是搞‘政治运动’，大家都是‘运动员’。去年我们搞‘以生产为中心’，很多人还想不通，心有余悸。这回中央正式决定了，合理合法了。今后衡量经济部门的党委领导得好还是不好，应该主要看它实行了先进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要领导思想上转好，也就是要解放思想。安徽抓农村经济政策，搞了《六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人民日报》报道了，但个别省不准转载，现在有些地方农民吃不饱，口粮只有200多斤。应当调整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可是有人批评农业搞不好，是‘学大寨’学歪了。当然，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学习，可是有人认为，大寨搞大队核算，你也应该从生产队核算过渡到大队核算；大寨没有自留地，记政治工分，你不跟着学也不行。《六条》里没有这几条，就说不学大寨。因此，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解决。”

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业文件，作为草案下发试行。文件肯定了联产计酬的作法，但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当时搞包产到户，仍然被目为单干复辟，冒天下之大不韪。

肥西县山南公社1978年秋种麦时，天太旱种不下去，有些村悄悄地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周围不少村竞相仿效。皖东风阳县、来安县也有类似情况。中央文件下达后，省直机关对此议论颇多，有些同志认为，肥西就在省会合肥附近，不是偏僻山区，担心这样明显违背中央规定，不制止、不处理恐怕出岔子。有的甚至质问：“省委想把群众引导到哪里去？！”省委得知后于2月2日派工作组去调查，7日召开常委会，听取工作组的汇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上午没有开完，下午又接着开。万里说：“同志们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光宇同志对当年‘责任田’的回顾，对人很有启发。有些同志对包产到户表示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完全可以理解。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有助于省委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做出正确的决定。现在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对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不宣传，不推广，不登报，秋后再总结。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

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

如果说肥西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是公开的、是省委认可和正式批准的，那么，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就是秘密的、瞒上不瞒下的。这个深受“饿、病、逃、荒、死”之苦的小岗村，因为底子太薄、人心太散、土地太瘦，实行包产到组后，取消了“大锅饭”，还有“二锅饭”，生产仍然搞不上去，于是秘密决定“包干到户”。1978年11月24日，在这个寒冬的夜晚，很难召集群众会的小岗，却在社员严立华家开了一次全体会议。20户社员除两户无人在家外，18户全部到齐。一盏破旧的马灯露出微弱的光亮，一张张兴奋的脸，一致严肃地举手通过了三条“规定”：（一）实行“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任何人向外透露；（二）交纳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留集体，不准任何人到时候装蒜；（三）万一走漏风声，严宏昌为此而蹲班房，全队社员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章程”写好后，个个赌咒发誓，永不反悔，按下了自己的手印。这18位农民是：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严国品、关有江、关有申、严家齐、严富昌、严学昌、韩国云、关有章、严家芝、关庭珠、严立坤、严立华、严立富、严美昌、严金昌。这件事后来被县委书记陈庭元了解到内情。但这位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县太爷”，也来了个“瞒上不瞒下”，才得以侥幸保存。这份有18个手印的“章程”，现在陈列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1979年春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安徽农村思想更加活跃，农民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创造性得到更多发挥，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突破性的新事物。特别是凤阳县的“大包干”最受欢迎，这个多灾多难的花鼓之乡，如今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气象。

但是，三中全会农业文件对包产到户的限制，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使许多农村干部思想上又动荡不安，甚至陷入惶恐之中。

——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不少乡村、路口、岗坡、田头，醒目地刷出了大标语，有些还用高分贝的大喇叭高声尖叫：“坚决抵制单干风！”“坚决反对复辟倒退！”“坚决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流毒！”……

——有个省的省报，甚至准备了十几个版，十几篇评论，扬言要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打排炮”，第一篇社论已经见报。

——3月上中旬，在北京召开有7个省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有人对安徽的包产到组表示怀疑，甚至

横加指责。

——3月15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地位,刊登出那篇中央某部长泡制的著名的读者来信和按语。于是,正当春耕大忙季节,又刮起了一股猛烈的纠偏风。

面对严峻的形势,省委及时向全省发出八条“代电”,要求各地、县不论实行什么责任制办法,都要坚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万里迫切需要了解农村的动向,特别是来自基层的信息。3月17日他赶到滁县地区,同地委书记王郁昭一起,先后跑了全椒、滁县、来安、天长、嘉山、定远6个县。到处说服惶惶不安的干部,他斩钉截铁地说:“什么是好办法?能使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孬办法。作为报纸,发表不同意见是可以的。报纸好比公共汽车,别人可以乘,你也可以乘。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也可以写。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就打退堂鼓。责任到人,什么时候都要有,就是全盘机械化了,也要分组,也要责任到人。公共汽车也要分组,不能今天开这个车,明天又开那个车。现在春耕大忙,责任制不能乱变,对生产不利。产量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

万里对滁县地委在风浪面前敢于独立负责地处理问题,敢于旗帜鲜明地维护群众利益表示满意。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位生产队长要求学习凤阳大包干的做法,即由队向组包产,以组核算,但上交指标到户,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社员称之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万里对群众这一创造公开表示赞许,当场批准让这个队试行。行前他同王郁昭作了一次持续到深夜的长谈,支持他在全地区范围内全面推广包括大包干在内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山南公社作为包产到户的试点,当时受到的压力很大,省委对此特别关切。4月中旬,王光宇来到山南,对一些愁眉苦脸的基层干部进行安慰,支持、鼓励他们试验下去。5月21日,万里又亲自到这个公社,同几位心神不安的公社干部促膝谈心。他说:“不用害怕,你们的试点是省委定的,是我点头表态的。好好把生产搞上去,秋后再总结。”

尽管如此,肥西县委有些领导人仍然思想不通,他们忧心忡忡地说:“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和国家?老牛要是会说话,也要告到中央。”7月,县委发出46号文件,决定纠正

包产到户。由于基层干部理直气壮的质问,由于农民采取罢耕罢收的办法相对抗,县委不得不在8月8日又发出了一个50号文件,改变了46号文件的“决定”。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后来说:“试验包产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抗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6、7月间,万里率安徽代表团应邀赴美访问,接着又访问了欧洲几个国家。在家的省委常委继续紧紧抓住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不放。滁县地区的大包干又有新发展,不少已由包到组变为包到户,成为包干到户。袁振去作了专题考察,并撰文阐述其重大意义。

经过一番风雨,安徽农村形势更好了。午季收成不错,秋禾长势旺盛,丰收在望。全省289000多个生产队,只有占0.5%的队没有建立责任制。95.5%实行责任制的生产队,不联产的队占38.4%;联产的队占61.1%。其中,包产到组的占22.9%;大包干到组的占16.9%;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占10%;采取其他联产形式的占11.3%。从经济效益看,农业生产非建立责任制不可,联产责任制又比不联产的效果好,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效果更好。

万里回省后,继续把精力放在农村,放在多种形式责任制的推广、完善和提高上。他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10月11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各级党委碰到新问题没有把握的,可提到常委会讨论。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也可以大胆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等。有的办法通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的就赶紧改。比如《省委六条》大部分都正确,但其中规定干部参加劳动‘一二三’(注:指学大寨时期昔阳县委规定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实际做不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也可能有错。因为包工而不联系产量,结果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他建议将滁县地区关于联产计酬的三个材料,发给大家参考,可以大胆试行。

万里研究农村工作对责任制思考得很多很多,他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自己的认识,再去教育干部提高认识。12月1日,他在省军区第六次党代会讲话时指出:“对包产到户到底应该怎么看,至少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用不着听见这四个字就头皮发麻。”“少数地方搞了包产到户,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如果说分田单干意味着集体经济瓦解,退到农民个体所有和个体经营的情况,那么,包产到户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12月 (下转 33 页)



# 江姐托孤

## ●知 先

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小说《红岩》、歌剧《江姐》，主要歌颂了一位划时代的英雄女性——江竹筠；而当年与她共同战斗、肝胆相照的好战友，为保护她的幼子而历尽艰辛、受尽委屈的王珍如却鲜为人知。如今，这位74岁的老人就住在长沙岳麓山下的两间红砖瓦房里，过着平静孤独的生活。物换星移，往事如烟，许许多多人生风雨，老人均已淡忘，唯独江姐和她的儿子彭云的形象，是那样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

### 初识江姐

194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成都西门外的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宿舍里，24岁的女会计王珍如正在津津有味地读一本叫“牛虻”的小说，忽听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眼前站着一位中等身材，面目端庄秀丽，年约20来岁，身着蓝士林布旗袍的女青年，说话和和气气。

“请问您，何理立在这吗？”

“她到城里亲戚家去了，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

“我们是老同学，几年没有见面了，还是想等她回来。”

文静、礼貌，王珍如对她颇有好感，热情地安排她洗漱、吃饭睡觉。第二天何理立回来，王珍如才知道她就是她经常提到过的同窗好友江竹筠。这以后，她们之间就有了交往，每当周末，三人便在一起娱乐。

江竹筠原名竹君，江姐则是她的一个表妹对她的称呼，以后便成了她的代名。她同丈夫彭咏梧（松涛，重庆市委委员，华莹山游击队政委）是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结下深厚情谊的，他的公开职业是重庆中央信托局中级职员，薪水虽不算低，但收入大多做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连自己身患肺病的医药费也没有留出，

但两口子感情很好，在紧张危险的工作中互相体贴，相濡以沫。新婚燕尔后的小家庭生活没有过多久，江姐即奉命去成都开展工作。

她原打算通过老同学何理立的关系在驿运处找份差事，站稳脚跟，不料驿运处的头目是个国民党特务，对新老职员政治上控制甚严，因而未能如愿，不过她觉得能结识王珍如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姐姐，心里还是很高兴。王珍如，1940年在金堂县参加地下党，曾怀着满腔激情想投奔延安解放区，但是眼前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势把她留住了。在驿运处，她曾通过种种合法身份与手段，同特务分子郑显忠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利用自己当时享有财务检查监督权，对郑伪造发票、贪污公款的行为进行揭露，终于迫使这家伙灰溜溜地滚蛋了。这些情况，江姐都做过详细了解，所以她对王珍如更加信任。

王珍如对江姐的言行自然也很关注，她1939年入党，是地下组织的基层领导人之一，至于她来成都是否直接领导自己的工作还不清楚。根据地下党的纪律，党员大多是单线联系，没有特别的指示，决不可以暴露身份。所以她只能心照不宣。

### 特殊任务——考大学

一天，江竹筠提着行李箱，进门就说：“两位姐姐，妹妹告辞了。”脸上流露出一丝惜别之情，“怎么，要上哪？”“很远很远的地方。”“干什么去？”见她不便直言，二人便不再问，可眼圈早就红了。江姐见状又忙安慰说：“不要难过，半年之后还会在这里见面，你们等着吧。”

其实江竹筠此行并不多远，只是暂时把自己封闭



■王珍如与江姐的儿子彭云

起来，与外界隔绝，因为她接到市委指示，要她想尽一切办法考取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

她住在一个熟悉的老师的阁楼里，足不出户，闭门攻读，经过半年焚膏继晷的努力，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川大，选择了农学系病虫害专业。不用说，这天晚上，姐妹三人见面是何等的高兴。

## 征途漫漫

1946年初，国民党突然撕毁“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连续制造了“校场口事件”和“沧白堂事件”，大肆搜捕，关押革命人士与爱国知识分子，使和平民主运动遭到极大的破坏，此时，正怀身孕的江竹筠全身心投入到反对国民党镇压革命群众的斗争中，为营救战友四处募捐筹款。王珍如除了把自己的薪水大部分交给竹筠外，也同她一起向社会发起募捐，一天晚上8点多钟，江竹筠跑来王珍如处取了募捐款后，立即又要返回学校，王珍如拉住她说：“这么晚了，你还没吃饭，又带着身孕要走十几里路，那怎么行，还是在这里住一宿吧。”江姐说：“好多被关押的同志等着治病营救，他们的家属等米下锅呢。”一转眼便消失在苍茫暮色之中。

不久，江竹筠通知王珍如说：“理立已调到重庆三联书店去了，那里工作吃紧，急需补充人力，你就辞掉这里的工作也去三联书店吧，报完到，再去找四哥（江姐爱人彭咏梧），告诉他我在川大已经上了黑名单，不过，我会妥善处置，不要为我担心。”这时，江竹筠已临近分娩，王珍如劝她一同回重庆，临产时也好有个照应。她摇摇头说：“我这里的工作脱不开身，再说咏梧和你的工作那样忙，我不能影响你们。”她托同学租了一

间民房，儿子彭云就在那里降生了，这天是1946年4月18日。

重庆三联书店是地下党秘密联络点之一，专营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国民党经常有特务在这里监视。这里不仅工作紧张，生活也极艰苦，每天只供三餐糙米饭，没有任何补贴。这和王珍如在驿运处的生活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里的薪水，每月有十几块大洋，可以养活三四人，而如今，自己一个也吃不饱肚子。然而，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再苦也是心甘情愿的。

这年6月1日，重庆上空阴去密布，国民党组织上千名受蒙

蔽的群众，进行反革命游行示威，几百名军警宪特混杂其中，大肆查封捣毁进步书店报社。三联书店经理仲伙元（地下党员）被逮捕，职工失业，各奔东西。王珍如当时正患虐疾，贫病交加，不得不暂时回老家金堂县去休养。

比起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山城重庆，农村到底平静多了。虽然地主武装横行乡里，却从没有找王珍如甚么麻烦。她的身体恢复很快。她总是挂念着城里的姐妹。听说竹筠已回到了重庆，但不知现在情况如何，孩子长得怎么样，老彭的肺病好了没有？她想：竹筠现在多么需要一个帮手啊，哪怕能帮助照顾一下孩子也好嘛。

她来到重庆，首先去了三联书店，老远就看见一个好大的“封”字，她不敢再往前走，因为附近站了好几个戴墨镜的便衣狗子。一辆宪兵队的警车，打她身边呼啸而过，扬起一阵尘土纸屑。她回过身来向大门口走去，见许多市民在捡传单，她也拾起一张，看那刻写的字迹，她认得是江竹筠的笔体。“一定是她，我要设法找到她。”正要走，有人拍了一下她的肩膀，旋即把一张纸条塞到她手里，那上写着：“速去成都天府煤矿公司职工子弟学校报到——筠”。她睁大眼睛找那人时，早已不见踪影。

天府煤矿公司职工子弟校又名“天府小学”。王珍如报到时，正逢暑假，暂无事，可薪水照发。她还是打算去重庆看望江姐，于是买了几斤奶粉，几件童装，还有两盒盘尼西林片。正要动身，却收到江姐一封急信，要她速去重庆一趟，这本来是一件正合心意的事，可她心里反而不踏实了，难道发生了什么事？

## 战前托孤

她照着信里所说的地址，来到“中央信托局”的一间单间宿舍里，一进屋，情况就有点异常，老彭和竹筠正在整理行装，一岁多点的云儿坐在一张铺在地上的软牛皮上，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走进屋来的陌生人，江竹筠有点难以启齿地对王珍如说：“珍姐，我同咏梧马上就要去川东开辟武装革命根据地。”说到这里，王珍如高兴地接过话茬：“那好，我也去一个，我做梦都想上前线，同敌人拼个刺刀见红。”江姐笑着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她此刻的心情。“不过，这是组织上早就作了决定的。我们已经接到了正式通知。只是，我们一走，云儿无人照顾，我同老彭想了很久，只有托付给你最放心……”看着竹筠两口子那期望的目光，王珍如心里立刻像重锤一样敲击着：天下哪有不痛爱自己儿子的父母，而他们夫妇为了革命，忍痛割爱上前线，这是一多么令人可敬的行动；她们既然能够放心地把仅1岁零4个月的爱子托付给一个未婚女子抚养，我王珍如有什么可说！再说，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啊，于是，她抓住江姐的手，毅然点了一下头，江姐眼圈立刻红了，抱起孩子发疯般地亲着。

临别那天，三人抱着云儿到商店买了一件旧军毯改做的大衣和军帽，大衣很长，几乎拖地上，江姐说，好让他多穿几年。接着他们又在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江姐夫妇这才把云儿“母子”送上汽车站。老彭睁着一双因熬夜太多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即将分离的幼子，江姐含着眼泪嘱咐王珍如说：“珍姐，万一我们此去不再回来，云儿就是你的亲生儿子。”王珍如用手绢擦干她的眼泪，“等你们胜利回来，我一定交给你们一个聪明伶俐、健康活泼的儿子。”车要走了，一直听话的云儿忽然哇的一声，伸着小手要妈妈。江姐迅速扭过头去，用劲把王珍如推上汽车，车开了好远，夫妻俩还站在路边不忍离去。

## 背着养“私生子”的黑锅度日

一个20多岁的未婚女子，忽然抱着儿子回天府小学，自然会引来一些人的疑问。“这孩子是你的什么人？”“儿子呗。”“儿子？听说你还没有结婚，哪来的儿子。”王珍如只是笑笑，她不作答。其实她为这事想了很久，怎么说也经不起盘查追问，不如干脆说是自己的儿子，顶多只是个“私生子”了事，人家要骂就骂吧，

“私生子”又怎么样呢。

“双十”节那天，她怕江姐夫妇挂念，抱着云儿去北培照相馆照了张像，回来时，听到身后有人指指戳戳：“大姑娘养私生子还有脸抱出来。”“让这样的坏女人教书当老师，真是坑人子弟。”王珍如听了两眼发花，头脑嗡嗡作响，也不知道怎样回宿舍去的。

清早，她去市面上买回猪肝鸡蛋，把孩子喂饱了，上课时就把他抱到附近一位好心的奶奶家去“寄存”，云儿也非常听话，从不吵闹，“母子”两配合得很默契。

不久，私生子的消息传到了总校，一个职员告诉她：学校有规定，职员不准带家属住校，不听劝告一律开除。王珍如虽然害怕，却也只能硬着头皮过下去。

一天，云儿拿着一个苹果，被隔壁一个三岁多的孩



■江姐、彭咏梧与儿子彭云合影

子抢去了。他不哭也不闹，等那孩子不注意时，走上去用劲一推，把他推倒在地，捡起那只苹果就走，那孩的母亲不分清红皂白，点着云儿的脑门骂道：“有娘没爹的野种，还敢欺负人！”刚从食堂买饭回来的王珍如见状，忙一边赔不是，一边抱起云儿进屋，“母子”同时流着委屈的眼泪。

寒假前夕，江姐偷偷来到学校，云儿长高了，那件拖地的大衣齐小腿了，带上军帽，样子很威武，王珍如把她推向江姐：“看看像不像他爸爸的神气。”边说边把他娘俩让进里屋，关上门后对云儿说：“快叫妈妈。”云儿看着两个妈妈，不知所措，于是三个人抱作一团，各自倾诉衷肠。江姐说：“珍姐，为了云儿，你受了许多委屈，还要担惊受怕地过日子，我和老彭真是过意不去，我这次来，是想把孩子接走，暂时寄养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是我照顾不周？”“不，你为云儿，为我

们付出的太多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不过我预感到这样下去你和孩子都很危险，再说，重庆那边工作很吃紧，组织上需要你去完成新的任务。”正说到这里，江姐忽觉有人在窗外往里瞧，忙使眼色让王珍如先出去，王珍如一眼就认出那是上次被云儿推倒的那孩子的妈妈，这女人虽不是特务，可为了报复也存在一定的危险，便把情况同江姐说了，江姐决定马上离开，过几天再来接孩子。

果然，第二天王珍如就听到有人议论：“那孩子同昨天来的那个女人长得一模一样，说不准是她的孩子。”“听说那女的是川大的学生，胆子大得很。”“看样子像个共产党……”不论说的人是否有心，王珍如都意识到情况严重，她只好格外小心，一有风吹草动，就把云儿抱出去避风，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一个大雾蒙蒙的早晨，江姐再次来到王珍如住处，抱起睡梦中的儿子。两人绕小道来到河边，上了一只载货的轮船。云儿一走，王珍如忽觉一阵心酸，眼泪止不住簌簌地流，多么苦命的乖孩子啊，愿你母子此去一路顺风。

王珍如没有想到，当她回到学校时，便接到一纸除名通知：

“职员王珍如违犯校规，败坏校风……予以除名。”

王珍如脑袋嗡地一下，几乎站立不稳，但她旋即镇定下来，把“通知”撕得粉碎，进屋卷起行李，就坐上了去重庆的汽车。

此时的重庆，军警横行，特务密如蛛网，王珍如一路受到盘查，她都巧妙地对付过去了。她到原先约定过的地方去找组织，却总是接不上头，看着天色已晚，她感到一种“不知今夜落谁家”的恐惧。

她先是找到一家饭店当帮工，继而又到杂货铺扫仓库，靠打工糊口，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饱尝失业飘流的痛苦。

远在川东前线的江姐，为王珍如的处境忧心如焚。她通过各种关系，终于为她找到了一份兼职家庭教师差事，主人姓徐，是西南航空公司的副经理。

## 情系挺进报

江姐常从前线潜回重庆，筹办军需物资，向地下市委汇报川东情况。工作紧张且充满危险，但她每次办完事情之后，都没有忘记步行十几里路到市郊来看望王珍如。一次，她来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没有来得及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叫，进门就问王珍如：有什么吃的没有，此时王珍如也有点饥肠辘辘，就同江姐一起外出，谁知，当时市面萧条，跑了几条街竟没有找到一点吃

食，回来只好用白开水充饥，度过了一个难耐的饥饿之夜，第二天天一亮，江姐就风尘仆仆地走了。

“你不是说过有新的任务等着我吗？”江姐再次来时，王珍如问，“为什么还不分配工作？”

“我这不是给你带任务来了吗！”江姐从布口袋里面拿出一扎信件，上面写着：“重庆警备司令阁下亲展”，“重庆宪兵总队司令×××启”，以及各种军政机关头目。王珍如不解，江姐说，这是地下党和华莹山游击队寄给他们的传单和挺进报，它比炮弹的威力还大，弄得敌人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接着便同她讲了具体投寄办法，王珍如听完就要出门，江姐忙拖住她，“还是我们一起去，邮局有我们的内线和联络暗号，我们需要如此如此……”

茫茫大雾给山城百姓带来诸多不便，但也给地下工作者创造了有利条件，江姐与王珍如各人拿着一袋信件，在大雾掩护下，一路小心朝江边的一个邮局走去，透过渐渐散去的朝雾，可以看见二楼的晒台上，一位老妈妈正在晾衣服，中间一块白色五幅布很显眼，江姐这才放心地走了进去，把邮件递进窗口，出门时两人相视一笑，各奔东西。

这以后，王珍如也可以单独执行任务了，她感到生活从来没有这么的充实过。

江竹筠最后一次来到王珍如处已是1948年的初春，王珍如见她眼睛红肿，脸色难看，忙问她是不是病了，江姐很沉痛地告诉她：“四哥牺牲了，他是在掩护最后一批战士撤退时不幸中弹的。”听到这里，王珍如早抑制不住溢出的眼泪，江姐却没有哭，她说：“咏梧是好样的，我为有这样一战友和丈夫感到骄傲。”王珍如还想继续安慰她几句，她却却说，“现在没有时间悲伤，快去寄挺进报吧。”

1948年6月，王珍如获悉江姐在去万县开辟武装革命根据地途中，由于叛徒出卖落入特务头子徐鹏飞手中，在共和国诞生那年的11月14日，高呼“新中国万岁”的口号从容赴难。

## 脱离虎口

江姐被捕入狱之后，王珍如曾悲痛万分，但这时她最担心的莫过于孩子彭云了，他仍是四处为家，过着飘流不定的生活，起初，他由一位地下党员的夫人陈曦抚养，随后陈然（成岗）的妈妈与何理立的妈妈先后把他带去各自的乡下，最后才由一位叫么姐的养母收留，当时，么姐带着彭云生活困难，生活费靠地下党的同志偷偷接济。1948年下半年，王珍如被组织安插到重庆胜大厦电影部当会计，住在重庆女青年会宿舍，当她知道

么姐母子的情况后，便想法把他们从乡下接到自己身边，安排到女青年会办的托儿所，“母子”同住在宿舍的一个单间，这样，王珍如便有幸再度与彭云生活在一起，用自己的薪水来供养彭云“母子”，直到重庆解放。

这期间，王珍如利用会计工作的有利条件，一方面妥善收转各地给党组织寄来的活动经费，同时根据地下党的指示，通过敌人内部线索、或带着有关信件，奔走于与我党有各种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敌特大小头目中，去寻找被关押的同志的下落，再配合党组织设法营救他们出狱。她多次化装成“犯人”家属去几个国民党的重点监狱探监，从这些“犯人”嘴里打听到了仲秋元、屈楚等一批重要干部的下落，随后他们离开了监狱，但是，离开监狱并不等于脱离了危险，敌人有可能重新逮捕他们，必须设法让他们迅速脱离虎口重庆，转移到党中央指示的地方去。当时重庆水陆交通均派重兵把守，只有飞机每日一班飞香港，不是国民党高级要人，休想购到机票，地下党为此绞尽脑汁，无计可施。王珍如忽然想到了什么，“我去试试”，她一转身出了门，径直来到她原先做家庭教师的主人家里。

其实，王在徐家当家庭教师每周只去两个下午时间，同徐经理见面次数很少，通过半年多的观察，发现这位副经理虽然在政治上是个中立派，但对国民党的

腐败专横、镇压民主人士非常不满，而对于被关押的爱国志士却寄与同情。她对王珍如的人品性格非常敬重，曾许诺过有事愿意帮她的忙。今天，到了这种时候，她顾不得许多，决心去碰碰运气，不料这位副经理对她的来意已很清楚，没等王珍如编造完“理由”，就爽快地答应了她明早飞香港的5张机票。

1949年9月，王珍如随我党的一批包括乔冠华在内的重要领导干部离开重庆飞抵香港，1950年春应召回国，同丈夫南下湖南，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至1980年离休。30年人生风雨、坎坷春秋，使她身心倍感憔悴，幸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暖了她的心田，尽管工资、住房等应受的老干部待遇不尽如人意，但她却说：我一想起竹筠、咏梧，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连命都舍得，我如今还有什么不满足啊。

#### 〔附记〕

彭咏梧与江姐的儿子彭云，由养母么姐抚养至解放以后，政府供给他们“母子”生活，后又一直供彭云上学，60年代，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北京从事军事科学研究，后又赴美深造，成了一名学有所长的科技专家，他已有一个幸福的家，孩子既将中学毕业，妻子是杨开慧烈士表妹的女儿。

## 何应钦在台总当治丧委员会主任

●翟书惠 石林

何应钦，贵州兴义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领导过长城抗日作战，兵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又与侵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卖国的《何梅协定》。西安事变时，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任他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应钦在台湾是被授了一个空衔，对蒋介石的战略问题，既不能“顾”，也不能“问”，尸位素餐，坐吃俸禄，是把他养起来了。只有在台北集会庆典时，被通知率领所有的一级、二级上将衔的顾问们，穿着金星闪闪的军装，随班进退，作为庆典会场的一种摆设而已。

他的业余职务要比他的“公职”繁忙得多，如“世界道德重整会中国分会会长”、“中日文经协会理事会”、“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席”等等。他干得最起劲的，莫过于当“治丧委员会主任”了。凡属“党国大员”死人的丧事，丧者家属总找何应钦当治丧委员会主任，已经成为台湾流行的一

种“生死哀荣”的象征。流风所及，民间的一些大户人家，也千方百计找关系，请何应钦挂名为治丧委员会主任。有人开玩笑说：“敬公（何应钦字敬之），如果你开一家葬仪公司，出租名字当治丧委员会主任，保证生意滚滚上门，做也做不完。”

何应钦在台湾，足迹出现最多的地方是殡仪馆。凡有大丧事的场面，总可以看到他。有时像歌星赶场一样，祭罢第一馆，赶往第二馆，祭罢第一厅，赶往第二厅，忙得不亦乐乎！

可能是何应钦当治丧委员会主任太多的原因，他最怕死。凡是跟何应钦认识的人，在他九十五岁生日以后，都知道他最忌讳、最不高兴听的一句话是：“祝你长命百岁”。因为从九十五岁到一百岁，只有1800天，来日苦多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使他十分不快：“这不等于我最多只能活1800天吗？”所以大家互相告诫，见了何，只能说：“敬公气色越来越好，身子骨越来越硬朗。”绝不能说：“您老长命百岁！”否则，你会惹来怒目相向的尴尬。

# 康生是怎样扼杀历史学研究的

回忆拙著《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的遭遇

● 丁守和

编者按 一本颇有影响的好书,由于坏人康生的粗暴干预,硬说是“利用历史研究进行反党”,遭到禁书毁版的厄运,作者也历尽磨难。作者在深切的回顾中谈到许多问题,发人深省。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研究任何问题,包括历史和文化,都必须从事实出发,既不能忘记基本历史联系,不能割断历史,又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不能忘记时间、地点、条件。无论研究什么,一定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然这是很难的。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要再版,我写了一个简短的后记。略云:“本书初版于1963年。这次再版作了一些补充修改。主要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增加了有关周恩来当时的思想和活动,有关朱德及邓中夏、恽代英、彭湃等的革命活动。其他地方也增加了一些资料和分析。若干地方的段落作了调整,或文字上的修改与订正。这样做是力图能够更符合实际些。”

这本书从初版到再版,其间曾经遭受到禁书毁版的厄运,作者自然也经历了一番磨难的历程。再版时本想谈谈个中的情形,但因为当时忙于写两篇文章,又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会议的某些准备工作,所以对本书作了些补充修改之后,在后记中也只是匆忙写了这么几句话,应付了事。但总觉得本书被扼杀的问题应当作一交代,有些朋友也问起此事及有关问题,故现在写了这篇回忆性的东西,了此公案。读者或许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或可供思考的问题。

## 艰辛的写作历程

还是从头谈起,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时,研究室的同志收集了许多近现代杂志和报纸副刊,而且品类很多,有不少是很珍贵的。大家议论可以编写一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既是熟悉资料,又是研究工作,可供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参考。经与人民出版社联系,他们同意出版。于是1957年便开始工作。次年6月,第一集已看校样,第二集也大部分完稿,第三集有的也开始了。我同副局长姜椿芳谈到这些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想在此基础上写一本研究著作。他认为期刊介绍搞得不错,从研究资料入手,很扎实,也很有用处。他同意写本书,还说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你们对这个时期的情况和思想潮流最熟悉,掌握材料又多,应该进行深入研究,写成一本著作。不然,只是给别人提供资料,自己不利用,那不好。他对我们的工作一向很是支持和鼓励的。

我认为姜椿芳的意见很好,与大家研究后便决定写这本书。经过仔细考虑,我拟定了具体写作提纲。经商量,我从前面写,殷叙彝写成期刊介绍第二集的工作后,从后面写。并确定期刊介绍完成后,其他同志收集有关五四时期社团和旅欧勤工俭学的资料,准备先整理和编辑史料集,再进行研究和写作。我即开始写作本书,因为殷叙彝在第三集又花不少时间,所以主要是我写的,并通改全稿。第二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写完后,《历史研究》来组稿,便将这部分让他们拿去。因全文太

长，他们把后面三节即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反帝爱国思想的发展、从文化运动到群众运动，在该刊1959年4月号发表，并加编者说明。反映很好。同年6月或7月，我将全书定稿后，即送人民出版社审阅。

这本书，首先这是一部专著，不是专史，偏重于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分析。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是纵横交错，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相结合，既有历史叙述，而较多的是分析论说和对各种思潮的剖析，亦有前因后果的勾划。再有，由于本书是在期刊介绍基础上写的，掌握的资料很丰富，并经过筛选，引文多而不繁，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说在写作中是动了不少脑筋，用过一番功夫的。

1959年7、8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中央主席，对当时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而尖锐的意见，受到批判，彭德怀同其他几位同志被定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不久就在全党发动了一场“反右倾”运动。我当时并没有什么右倾言论，虽然在参观徐水的共产主义试验时也有过怀疑，却没有说什么，还担任领导小组的成员。但因为同情一位受批判的同志，想帮他过关，向他谈过一些有关他的情况，被揭发出来，受到批斗。次年春，下放安徽省肥西县（属合肥市）义城公社巢湖大队劳动锻炼。那本是鱼米之乡，可是在公共食堂吃饭既未见到鱼，在稀粥里也很少有米，不少人浮肿，妇女断经不育。“大跃进”的后果已有明显反映，但却不能说的。有时到合肥开会或休息，那里有一条包河，并开辟了包公公园，曾去看过，据说包拯出生在那里。包拯以刚直不阿，能为民申冤著称，有不少包公戏流传，很受人民喜欢。然而正直敢言、为民请命的彭老总，却因上书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受到那样不公正的对待和处理。历史真是曲折复杂，变幻莫测。

1960年底劳动归来后，问我有什么意见，我答非所问地说了句“没有什么”，意思是说劳动一年身体还可以。不久我调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当时黎澍接任《历史研究》主编，要我负责编辑部工作。到七千人大会后，要为“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处理的绝大部分人平反，而唯有不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平反。编译局通知我说，对我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已予纠正平反。其实也无所谓，在那样的时代，整人挨整总是不断发生，人们也正是在整人挨整的“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等运动中生活着，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颠簸着，谁又能免？常说秉性难移，我这人总爱说点直正话，讲点直正理，爱同情弱者，有点好打抱不平，因而也就难免得罪人。好在自已并不想做什么官，故尚能安然自

若。

在此期间，我曾询问出版社，这本书是否还准备出版？副社长范用回答说，还准备出，并要我仔细看看，修改补充都可以。书名原为《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后改为《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建议改为《伟大的开端——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我认为很好，只是字多了些，就用副题作书名，商议后就这样定了。我在近代史所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了些材料，对全书作了较多补充修改或改写，并且全稿打字，送有关同志审阅和提意见。黎澍看后认为还可以，也收到别人的意见，反映都不错。出版社的薛德震、刘元彦二位又审阅全稿，认为本书对许多问题研究较深，有见地，也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我将各方面的意见仔细考虑后，又斟酌修改，就交稿了。以后范用告诉我，出版社领导研究了这本书，大家都觉得不错，认为其中研究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有关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传播、党的成立和党史上许多重要人物等，过去有的论著虽然谈到，但都很简略，本书第一次系统论述这些问题，这是好的；而另一方面因涉及问题多，还有领袖人物以及被批判的人物等，是否有把握，觉得拿不准。为慎重起见，确定用三联书店（当时为人民出版社副牌，偏重学术方面）的名义出版。我自认为还是有把握的，但觉得他们如此小心谨慎，也就不便说什么，由他们处理就是了。

## 一位“首长”批示造成的厄运

本书于1963年6月出版，第一次印刷7千多册，很快销完。一般反映都比较好，尤其高校现代史和思想史教师认为很有帮助。然而一年后却出了问题，厄运来临。

1964年9月或10月，范用找我谈话，告诉我这本书出了问题，一位首先作了批示，认为错误很严重，指示出版社将该书毁版，并通知各地图书馆撤架，不得外借。当时他告诉我的问题有三：一是引用了中共一大纲领的材料，这份材料只供内部参考，公开使用是错误的；二是湖南《大公报》上所载《怎样做去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一文，署名“泽人”，本书把它作为毛泽东的文章引用，是错误的；三是抬高叛徒陈独秀，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并把他说成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很有贡献，更是错误。这“首长”是谁，他没有说，我也不便于问。他要我就这三个问题写份书面材料，作出说明，并作些检讨交给出版社。

回来后，我慎重考虑了这些问题，并拿出书来仔细看看指出问题的地方。我反复思考，总觉得这些并不是

什么大问题，第一条至多是个纪律问题；第二条至多是没有把作者搞清楚；第三条，我没有抬高陈独秀，就其当时的具体情况看，我是有意压低了。因而我没有作检查，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写了个说明材料，当然也笼统承认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

中共一大纲领，是我在编译局工作时，可能是1957年或58年从中央档案馆借来的铅印件，当时曾告诉我是内部材料。但是后来看到几本有关党史和革命史的著作，都提到或使用过，我以为已经公开，所以也没有请示报告，就擅自使用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湖南《大公报》1920年所载泽人的文章，是编译局研究室一位同志从湖南历史所照相来的，该所并明确告诉他，他们经过考证是毛主席的。此文的基本思想是启发工人觉悟，建立真正的劳工团体，自己的问题自己去解决。就当时来说，思想水平是较高的。联系到毛泽东当时的其他文章，是一脉相承的，有些语句也差不多，而且有些发表的论文或书也认为是毛泽东的而提到或引用，因此我也引用了。这是学风上不严谨不慎重，犯了错误，必须引以为戒。

关于陈独秀的评价问题，在新文化运动部分我基本上是如实写的。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指的前期。《新青年》1915年创刊，主要是陈独秀负责，也以他的文章为多。鲁迅到1918年5月才开始在《新青年》发文章，而且主要是文学方面的。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斗争的部分，讲到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敌对思想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等。但也着重指出或批评了他在宣传中的错误思想，如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等。对他的批判和正面的论述在篇幅上也差不多。因此我没有故意抬高陈独秀，而是有意多作了些批判。自然也有犯了错误之类词句。

这个说明性的材料基本上是这些意思。我写好后抄了两份，一份送出版社，一份交给近代史研究所党组织。所里一位副所长兼书记看后说，这只是说明了些情况，不像是检查。我说事情本来是这样的，我怎么检查呢。送出版社的，据说转到上面去了，结果如何，没有消息。

### 两篇文章被扣发

1964年10月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安排各所研究人员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近代史所的人去甘肃张掖。黎澎因为发表《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被认为是鼓吹“成名成家”、“白专道路”的

资产阶级思想而受到批判，要他下去“锻炼”，《历史研究》无人负责。学部指定成立个三人小组负责，我是其中之一。并规定每期目录和重要文章要送中宣部科学处审阅。我当时不愿意留下，要求下去锻炼。这时田家英向所里提出，要借调我参加他负责的《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第五册（现代史）的写作。所里通知我参加这项工作，《历史研究》的事也要做。我几次找所领导，找刘大年，也找过学部副主任刘导生，要求参加社教，均未同意。只得留下来。

参加《中国史稿》第五册工作的地点，在西郊马列主义研究院（西颐宾馆北馆），我也住在那里。与奚原、洪廷彦等一起搞，都是熟人。我写第一章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写两万多字。字数不多，但要求概括性强，包含内容要多，主要是叙述，也要有适当的分析和议论。大概是1965年7月或8月，我负责的部分写完，奚原等都看过，提些意见，我又作了修改，并打印出来，我准备回所里。这时奚原要调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主任领导，他要与田家英告辞，邀我同往。我们一起到中海田的办公室。田家英对奚原几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说以后还应联系，也谈到当时的社教问题等，最后谈到我写的稿子他已看过，还可以，他希望我留下搞二战时期的。这样我继续留在那里，主要是看有关文件和材料，思考问题，并拟各章的提纲，为写稿作准备，直到“文革”前不久。

在这期间，我仍然经常审阅《历史研究》的稿件，大概两周要回所看看，商谈组稿和发稿等问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文艺和学术刊物上已发表不少批判文章，《历史研究》也要组织这类稿件。当时报纸上正批判周谷城在美学方面的“无冲突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编辑部便出题目要我写一篇批评周谷城历史观的文章。我是不愿写的，但一再催我一定要写，没办法，只得找来周谷老30年代以来写的《中国通史》两册、《世界通史》三册、《中国政治史》，以及《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进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中国近代经济史导论》等专著看看，也找来他那几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史学、美学和艺术的论文翻翻。因为限定的时间紧，要在1965年第一期发。我便找宁可商量合写，我写前面两节，请他写后一节。洪廷彦是周谷老的学生和女婿，也同他商量，他也提些意见。题目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大杂烩》，还有点名的副题。写好后即交给编辑部，清样出来后送中宣部科学处，不久接到通知，不发此文，原因未说。但显然不是文章的问题，而是认为作者有问题，宁可说可能是他写的历史主义文章受到批判，我说八成是我的《传播》一书的问题。



也没有去深究，不发表就算了。“文革”以后则庆幸当时没有发表，不然怎么向周谷老交代呢！

196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编辑部又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实在推不过，也只有勉强为之。同周奚原等商量后，我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文，约3万字。杜月凯、洪廷彦等都看过。这时黎澍已回京，也送他看了，他认为可以，要我再送田家英看看，田看后认为写得不错，可以发表。当时听说有几位大手笔为林彪起草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也找来校样看过，那主要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总结论述。我着重于学术，自认为没有问题，便发稿了。编辑部有的同志提出这次是否改个笔名，免得送审时麻烦。我说“是祸躲不过”，不发就算了。果然排出后送审，又被抽下来（此文1980年收入我的《中国现代史论集》）。这就很清楚，是本书的问题，不许发表我的文章，很可能要公开批判。我当时不到40岁，还有些气盛，便去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也找过于光远，他当时管科学处。我向他们反映了两篇文章的事，主要是谈了《传播》一书的问题。他们也问了一些情况，我作了回答或说明，自然也流露某些不满的情绪，记得曾说什么何必拿我开刀。他们要我不要紧张，可以先不写文章，暂时回避一下。在这以后倒也无事，我仍然是读书或看资料，思考写书的问题。同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12月发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政治形势愈来愈紧，回所的时间也愈多了。

### 那位“首长”原来是康生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6月3日发表《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研究》。黎澍首当其冲，从6月5日起即不断批斗，我自然要陪斗，也曾戴高帽子挂黑帮牌子“示众”，让来往行人和围观者观赏，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的中国文明！

可能是1968年，有些人不知从哪里找到1964年那位“首长”对本书的“指示”。这时才知道，原来这位“首长”就是鼎鼎大名的康生，专门陷害人的，那时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他说这本书的要害是吹捧陈独秀，为大叛徒辩护，是利用历史研究进行反党。这也不是偶然的。早在1938年，陈独秀出狱不久，曾想去延安，正在商谈，康生即公开说陈独秀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陈立即澄清。康生是不会忘记这件事的。因而当他听说本书对陈独秀五四时期基本上作了正面评价

时，立即作了这个“指示”。记得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时，他就捏造说刘景范（刘志丹之弟）的夫人李建彤写的《刘志丹》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为高岗翻案，并由此追查习仲勋、贾托夫、刘景范等人，硬说他们是黑后台，被批判斗争，撤职查办，遭受长期迫害。1964年又说我这本书是利用历史研究反党，为叛徒辩护，幸亏我没有任何后台！这时他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他的批示被翻腾出来，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从此，大会小会对我的批斗接连不断。我只是说明情况，即使有错误，也是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我没有反党，也不可能反党。但上纲不断升级，最后定为吹捧陈独秀，抬高李大钊，贬低毛主席，是大本毒草。还说毛主席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你却说是陈独秀，这既是贬低鲁迅，也是反对毛主席。并说这是“康老”定的案，你翻不了。我极力说明我没有贬低毛主席，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接着是陈独秀，由于他长期主编《新青年》的影响，因而他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也说受到他们的影响，这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西行漫记》中都有记载。可是我在写马克思主义宣传还是把毛泽东放在陈独秀的前面写，这怎么是贬低呢？我对在批判中说李大钊只是“民主派”也很不同意，并作过说明。至于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事实，鲁迅也说他的作品是“遵命文学”。鲁迅是主将要在二十年代中期后，特别是三十年代。这从鲁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的。我的解释自然是无用，反而说我是“耍花招”，书中讲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将，就是错误，是为叛徒辩护，为叛徒翻案。所以只有“认罪”，才给出路。

人民出版社的一派人也开车来抓我去批斗，并将我家里存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五四运动文选》《李大钊选集》及本书全部抄走，把我关在那里的五层楼上。第二天上午进行批斗，康生的“指示”用大字抄写贴在会场正面的墙上，周边还有“打倒”、“坦白”、“交代”、“认罪”之类的标语，以壮声威。出版社的领导王子野、范用陪斗。对我一直是喷气式批判，有时也问一两句，我略作回答，随即是“不老实”、“打倒”的狂喊声，把头擦得更低了。下午有几个人同我谈话，要我交代“罪行”，特别是要我交代审阅过本书稿的薛德震、刘元彦的有关问题，一定要问他们说过什么，出过什么主意等。我只能据实回答，反复说明如有错误，那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与他们无关，他们的意见都是好的，如书名就是按他们的意见改的等。晚上有一位穿绿上衣的人来送饭，说我不老实，态度不好，打了我几个

耳光。我很气愤，问他为什么打人，这样随便打人，我不吃饭了，请他把饭拿走，于是我绝起食来。关了几天没有什么口供，未能挖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我又不吃饭，最后又批斗一次，便把我送回来了。又算过了一关。

以后在所里，或劳动、或学习，特别是在所里集体住的那段时间，每天还要向领袖“早请示，晚汇报，请罪”，像佛教徒或基督教徒那样表示忏悔。1970年春到学部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劳动，当过木工，也下地劳动，同样有批斗、且挨过打。在劳动中，有时到息县或上蔡县的县城拉东西，也曾到街上或周围转转看看。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两地曾是息国和蔡国的都城。京剧《四进士》的故事就发生在上蔡县，县府道台都是贪赃枉法，官官相护，造成冤案，宋士杰打抱不平，巡按大人清廉、公正，才平了反。所以人们总喜欢清官，爱看清官戏，把希望寄托于“青天清官”为民作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仍然有那么些官员徇私枉法，贪污腐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也就难怪人们仍然希望有“为民作主”的“清官”了。

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他说的那一套什么“紧跟”、“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三忠于，四无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原来都是假的，唯有“权”才是真的。按照他的说法，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而他却在抢班夺权中失败了，弄了个粉身碎骨。林彪的自我爆炸，开始惊醒处于蒙昧状态中的人们。次年夏，我们回到北京。这时松多了，尽管还要学习，但已经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工作。1973年分到民国史研究室工作，具体搞什么没有说。我曾想写一部三卷本的抗日战争史，在1965年我写有关文章时就想过，中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进行过那么多反侵略战争，都失败了，只有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很值得研究。把我的想法同黎澍谈过，他很支持。我看了几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材料，又经过反复思考，写出较详细的提纲。后来有人不同意而作罢。1975年5月，又到《历史研究》杂志工作。

本来《历史研究》在“文革”开始就停刊了。可能是1973年，毛泽东说现在没有学术刊物，应恢复几种。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长，他听到后便从高校抽调一些历史教师筹备，于1974年恢复了《历史研究》，但为表示与过去无关，另请人写了刊名。编辑部开始在前门饭店，后在和平宾馆。1975年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后，又转回到学部，仍由黎澍主编。我们去后又在那里工作两年。黎澍对新题写的刊名很不满意，便让人从鲁迅遗墨中集了“历史研究”四字作刊名，至“四人帮”倒台

后才恢复郭沫若在创刊时的题名。当时“文革”仍在继续，因而《历史研究》也实在难办。因为要写《大寨史》，我和另两位同志曾访问过陈永贵副总理，在他的宽大住处听他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作了记录。回来后便根据一些书面材料和谈话记录，整理了一篇社史发表。又要写朝阳师院校史，这是毛远新抓的典型，自应表扬。曾去辽宁省朝阳市去访问，同那位“上大学，管大学”的“王大学”谈过。这位不识字或很少识字、因为上了大学改名王大学的人，声言要“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真不知要改造成什么样子！而我们这些臭老九还得去接受他的“再教育”，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听他述说，然后写了篇“校史”，加以推广。这决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亲身经历的实事，或者说是在蒙昧状态中所作的蠢事。这样在《历史研究》又工作两年多时间，后因老伴去世，便回到所里。

### 此案的平反与事后的思考

1978年8月间，范用通知我到人民出版社去一趟。经过这样一番灾难，老朋友多年不见，很是高兴。他告诉我出版社研究决定，《传播》一书没有问题，是本好书，要为其平反，准备明年五四运动60周年时再版出书。并说原来的纸型已被销毁，要重新排版，可根据情况作些修改补充，要我考虑，最好能把稿子快些改好交来付排，明年4月印出来。另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五四运动文选》、《李大钊选集》等也要重印，也要看看，改些错字。自然也谈到“文革”中的往事。他说你吃了不少苦头，我们也陪了绑，那都是康生陷害的，这个人坏透了。事情已经过去，不要再去想它。他的意见很对，我很感谢。

再版出书，这当然是好事，但也未免思考些问题。就以这本书来说，从1958年到1963年，用了几年的时间，不知修改了多少次才完成的。本书有两个明显特点，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资料丰富，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因而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既有纵的论述，也有横的剖析，纵横交错，安排有序，对五四新文化的运动的兴起、发展、变化和影响，对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斗争，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对当时众多人物的言论和活动作了评论，是这方面最早的学术著作。初版印7千多册，再版印8万多册，据说后来又有加印。著名史学家金冲及几次谈到，他到干校去时带两本书，其中就有这一本。著名史学家陈旭麓教授也说过，他仔细读过这本书，的确写得相当好，说我当时大概30岁，写出这样大题材的著作，而且井然有序，也真不容易。曾参加过少年

中国学会的老科学家杨钟健、曾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朱务善、施存统等看后也多称赞。认为对他们回顾往事很有启发。著名台湾学者陈鼓应也几次说，他在台湾时就偷偷读过这本书，很受启发和影响。他第一次到北京就通过出版社邀我吃饭座谈。有的同志说，凡是讲课或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或现代思想史，差不多都读过或参考过这本书，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在相识后也谈到在大学读过此书。可是它却经历了如此一番折腾，这对研究问题和发展学术有什么益处呢？

当然本书有缺点或错误。但决不是像康生或“文革”中所批判的那样，而是某些地方还不够实事求是，或者说也曾受到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所以我在考虑修改时，首先想到：要实事求是。这次修改或变动较多的，是与“文革”中的批判持相反的观点的。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宣传，首先是分析李大钊、陈独秀的言论思想活动和影响，然后研究在他们影响下，青年一代如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的成长和贡献，并且分析了一些老同盟会员中的思想转变等。修改补充后增加5万多字。然而修改后也不是没有问题。如对陈独秀，初版中有“叛徒”二字，这次改为“背叛”，仔细想想仍不够确切，而后在他文中又写为“背离”，表明认识在深入。其实主要应该是分析事实，而不是进行宣判。按实际情况，他可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派。又如对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潮，初版主要是批判，基本否定，把办教育只看作是培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奴才等，而没有看到这些思潮在当时的进步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在修改时只是删了某些偏激的话，或加了些限制词，基本思想还是没有变。又如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是立足于批判，因而否定多于肯定，那也不是实事求是。不仅他提倡白话文应充分肯定，宣传易卜生主义对冲击封建束缚，提倡个性解放有积极意义，就是他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也自有他的道理。对改良主义也是一概否定，实际上改良就是变革进步嘛。不应把一般改良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改

良主义或取消主义混为一谈，而应当具体分析。

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研究任何问题，也包括历史和思想文化问题，都不能从原则或定义出发，而只能从事实出发，既不能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不能割断历史，又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不要忘记时间、地点、条件，一句话，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的说，就是应该继承和发扬五四时代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把我们的学术研究推向前进，使我们国家的思想文化繁荣发展。

前几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见到林京跃，他现在也在做研究工作，“文革”前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当年《历史研究》的目录和要审阅的稿件就是送给他的，要抽下我那时写的两篇文章，不让发表，也是他通知的。多年不见，这次同他谈起这本书的问题，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不记得是哪里提出该书公开使用“一大”文件的问题，康生看到后便让他那个理论小组的人查阅该书，整材料，找了几个问题，他作批示，把问题说的很严重，上纲很高。那个材料在一个内部刊物上登出来，并通知该书不许借阅，要追查，看样子要大搞一下，也许要公开批判，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又无声息了。我说大概是因为我是小人物，没有什么油水，又没有后台，可能是不值得吧！他也笑了。

历史发展总是复杂的，人生道路也是曲折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关键还是要进步。一笑泯前事，光阴无虚度。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学术部门也是这样的。在科学上或学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顶峰。愿与同仁及青年朋友共勉。

（本文收入作者《学海求索路》，将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洛松）

（上接22页）25日他在省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并说：“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1980年1月2日至11日，安徽召开了有县委第一把手参加的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这次会议采取发扬民主、敞开思想、专题讨论、集思广益的方式进行，经过热烈争辩取得一致认识，为全省推行以

大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

现在，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实践证明，农村改革是广大农民自身的迫切要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农民在实践中的创造；但是这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坚强，直接影响农民的创造是得到保护还是遭受摧残，是生长、成功还是夭折、失败。一个县如此，一个省如此，全国也是如此。

“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仅68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为给李立三公公开反昭雪，1980年3月20日党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了有千多人参加的追悼会。追悼会由彭真同志主持，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参加，王震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充分肯定李立三同志一生的功绩。指出：“几十年，李立三同志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区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斗，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努力钻研党的方针政策，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悼词突出指出了李立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表现，对李立三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宁折不曲、坚持党性原则和高尚风格，作了充分肯定。悼词指出：李立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正地为许多同志的历史作证，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对共同战斗的同志和朋友诚恳真挚、热情亲切，对待下级关怀爱护，平易近人。”党中央对李立三同志的这一段评语，是对李立三的“盖棺论定”，也是李立三一生的最大追求。

党中央对李立三的这一评语是怎么得来的？其根据何在呢？现将我所了解的情况介绍如下：

党中央的评语，主要是根据1967年1月23日李立三在接见“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总站”林海如、王小华的一篇谈话而作出的。这篇谈话记录，是在李立三被迫害致死后，我在“交代”李立三的所谓“罪行”时，整理呈报“华北局军管小组”而保存下来的。

自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和6月1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这一年时期内，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群众造反组织，出于不同的动机，多次找到李立三，要求李立三为他们单位的“走资派”的历史作证。李立三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看风使舵或徇私报复，这集中体现在他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的一篇谈话证词。事情

的原委是这样的：

1967年1月22日晚，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我的宿舍与他相邻）转告我说：“立三同志来电话通知，明天下午两点，他要在东方饭店（华北局招待所）接待外调人员，要你去参加作记录。”

第二天下午，我骑自行车准时到达“东方饭店”，才知道是华北局机关群众造反组织“一联”总部的头头×××，带领着“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总站”的林海如、王小华（都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要求李立三谈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实际上是企图要求李立三证实刘少奇是“叛徒”。根据调查人的提问，李立三全面介绍了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刘少奇先后在一起工作过三个阶段的情况。最后结论是：“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

# 李立三在“文 刘少奇

刘少奇有什么大的问题。”现将这次谈话的纪录稿全文刊出：

谈话记录

时间：1967年1月23日下午

地点：北京 东方饭店

被调查人：李立三

调查人：林海如、王小华（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总站、西安交通大学学生）

陪同人：×××（华北局机关群众造反组织“一联”总部负责人）

记录：李思慎

林海如：你工作时间长，有一段与刘少奇一起工作，请你谈些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我国搞修正主义，现在的罪行要清算，历史上的

罪行也要清算。他不但没有过社会主义关，民主革命的关也没有好好过来。请你谈谈对刘少奇的看法。

另外，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广州、武汉，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都谈谈。

李立三：1922年我与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过。

1921年10月，我从法国回来。在法国有共产主义小组，我回来就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我是被法国押送回来的，有104人（里昂事件），其中有陈毅等。有些同志已经牺牲了。回来在广东接上关系后，去上海。中央介绍我到湖南与（毛）主席接见。那时（毛）主席到了湘区党委任书记，在安源。（毛）主席可能是八、九月到过安源，他认识了安源几个老工人，有铁路上的，有矿上的。当时安源煤矿有13000人。他认识的工人。

# “革”中为 作证

●李思慎

（毛）主席要我到安源做工人运动。我是1921年11月左右去安源的。开始办平民学校（工人子弟），后来搞工人业余学校。

1922年5月1日成立路矿工人俱乐部。

1922年7月，（毛）主席第二次到安源。这时加入俱乐部的人很多。参加罢工的人很多。（毛）主席这次到安源时，我回家去了。（毛）主席给我写信，要我立即返回安源。我回去了。当时，工人提出要求发给欠发工资。

1922年9月快要举行大罢工时，（毛）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

罢工期间，因为刘少奇初到，认识他的人少，认识我的人多，工人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焕觉，是把我

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这个电影的缺点是没有讲毛主席的指导，我曾为此在报上发表文章。（毛）主席派我们去，要我们去做工人的工作，取得合法斗争。（毛）主席回到长沙，还给我写了信，提出“哀兵必胜”，指导我们。我们按（毛）主席的思想提口号。安源罢工的胜利，应该是毛主席思想指导的胜利。电影没有反映这个问题。

林：拍电影，刘少奇知道吗？

李：拍电影，刘少奇是否知道？我不清楚。拍电影前我是不知道的。电影公开上演前，《北京日报》要我写影评，我批评了这一点。

罢工一个星期就胜利了。

1923年“二七大罢工”，（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弯弓待发之势。所以“二七”大罢工时，安源只提出了些要求，威胁矿上，支持“二七罢工”，但没有罢工。“二七罢工”受到镇压，但安源没有受到镇压。武汉受到的镇压大，武汉的同志不能继续在那里工作下去。党中央把武汉的同志调到安源，把我调到武汉去工作。那是1923年3月左右。在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的第一个老婆叫贺宝珍。

我在武汉做秘密工作。1924年1月我去广州参加国（民党）共（产党）合作代表大会。会后，我到上海工作，搞工人运动。上海的党组织有五、六十个党员。其中只有两个党员是工人。我去也是用安源的办法，先搞平民学校，办工人俱乐部。不到一年时间，就发生“二月罢工”。

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罢工。5月15日工人顾正红被打死，5月30日上海大罢工，示威游行，被打死几十个人。6月1日全市大罢工、大罢市、大罢课，成立总工会，我是工会委员长，后来刘少奇调来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有工商学联合会。我是代表工人去的。工会的具体工作，刘少奇作的多，我作的少。

林：刘少奇是从哪里到上海的，是从安源？

李：可能是从安源去的，或者从湖南去的。他可能是六月去的。九月，敌人要抓我，中央要我离开上海。开始到北京，后来到河南，以后又到苏联去开会。

这段时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

北伐军打到武汉（1926年9月--10月间）时，成

立全国总工会。我到武汉不久，刘少奇就去了。当时，全总主要负责人是苏兆征，因为他是工人，实际是我在那里负责。

1927年7月底，我离开武汉，去参加南昌起义。我是和（周）总理一块去的。刘少奇没有参加起义。他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是否参加了武汉的“八·七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反对陈独秀，有共产国际的人参加）？

那次收回英租界（注：指1927年1月初，李立三在武汉亲自指挥群众收回武汉、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因为英国人打伤一个三轮车工人。当时10万人的大会示威，我是总指挥，陈独秀、张国焘亲自签字，要我负责不要进入租界。我执行中央的指示，布置纠察队阻止群众。但是，有一个地方没有注意到，群众冲进去，占领了租界，提出收回租界。陈独秀、张国焘反对，我支持群众的意见，通过苏联领事馆，通过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提出收回租界，结果把租界收回了。对这件事，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大问题。

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的问题。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到了上海。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中央派我去作广东省委书记。我还没有到职，起义就失败了。我去收拾残局，先到香港（广东省委在香港）。这段时间没有与刘少奇在一起。

1928年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瞿秋白参加了，我们一起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没有参加。这时不知他在哪里，记不清了。

“六大”开完，派我、向忠发、周恩来我们三个回国。向忠发是主要负责人，我和周恩来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派有项英回来。这时刘少奇在哪里，记不得了。

1928—1930年5月，是正确路线，革命是发展了。“立三路线”是盲动主义，是反毛主席的，批判主席思想是农民意识。彭德怀打长沙，几天后退回来。主席去打也没有打下来。还有其他地方都失败了。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我的错误。会后，共产国际调我去莫斯科。我是1930年底到莫斯科的。去了看到刘少奇也在莫斯科，他可能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是何时去的，不知道。我去时，他找我谈过一次话，批评“立三路线”。

三中全会有（周）总理参加，瞿秋白是从莫斯科派回来的，王明也参加了。

王：当时是你负责中央？

李：名义上是向忠发负责，实际上是我负责。

我到莫斯科后不久，刘少奇就回国，可能是1932年。后来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反三中全会，说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

我在1930年底到1946年初这十五年与刘少奇没有见过面。



一九八〇年三月，在李立三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与李莎握手

上述全篇谈话，涉及从1922年到1946年长达20多年时间，李立三先后三次与刘少奇在一起共事，他都看不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无论从当时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处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作证，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本文作者李思慎（右一）和立三同志（左二）在一起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无不对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在那“无法无天”的时日，首先从被调查对象刘少奇来说，已经是大祸临头，每况愈下，死无葬身之地。众所周知，就在“文革”运动开始不久，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次日就宣布在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迫使其于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作公开检查。在从8月1日开始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向全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是在炮打刘少奇这个司令部。8月12日闭幕时，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织调整，刘少奇的排位由原来的第二位后移到第八位，公开了刘少奇在中国党内地位的下降。随之，毛泽东倡导并支持红卫兵全国大串连，从8月18日起，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把所谓的“61人叛徒集团”抛出来，责令“彭真专案小组”进行调查，伙同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等到处支持学校红卫兵批斗这批党员。在全国组成“揪叛徒联络总站”。8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造反派将其部长安子文以“大叛徒”之罪名揪出来示众。8月21日《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非常清楚，这里说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的

这个“任何人”，指的就是刘少奇。这是对刘少奇不点名的点名。从8月24日起《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在首都铺天盖地。

在10月8日到28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邓进行了“20天的彻底批判”。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造反派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10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300多人，要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要对刘、邓进行彻底的斗争。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人给刘少奇、邓小平贴出了一大批大字报，天安门前出现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12月25日，时值严冬，北风呼啸，清华大学5000多人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刘、邓的誓师大会”，高呼“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在社论的鼓舞下，北京的20多所高等院校集合了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的游行集会，宣读了刘少奇的20大罪状。同日晨六时，中南海里几个人，叫开刘少奇家里的大门，在院墙上贴了很多大标语，在地上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1月中旬，戚本禹公开讲话，肯定“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还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随之，所谓的薄一波等61名“叛徒集团”的大曝光，刘少奇这个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已经成为“全国

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头号目标。李立三对刘少奇的处境是一清二楚的，造反派期望李立三对刘少奇作一个什么样的证词，全是不言而喻的了。李立三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把自己打扮成“革命派”。李立三的行动，使取证人大失所望。

再从李立三本人的处境来看，与刘少奇的情况并不相上下，同样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李立三身兼二职：一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一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分管工业的书记。

据后来所知，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中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反党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就在这个会上，中央一位负责人李××在对彭真同志的揭发批判发言中谈到：李立三在1946年原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上，提出“改组司令部”，伙同彭真反对过林彪。李立三没有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有人在会议上对他的揭发这个情况一无所知。可是，时过不久，即大祸临头。1966年6月4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便函通知李立三：“据（李）雪峰同志传达，停止你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由此，这位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连任第5、6、7、8届中央委员，曾任第5、6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李立三的现行职务和工作权利，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向他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就凭华北局办公厅一页手写的便条就被彻底剥夺了。尽管李立三多次给中央写信提出申诉，总也没有得到回复。

李立三对于中央停止他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的真实原因始终不得而知，还以为是由于在华北局工作期间，工作中有什么错误所致。因此，通过华北局办公厅把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华北局派往内蒙的工作组调回北京复职。8月4日我与李立三见面时，他说：“我已接到通知，停止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全面展开，考虑到在华北局工作中一定有缺点错误。这段工作主要是你跟着我的，请你回

来，希望你能帮助我回忆检查在华北局期间工作中的错误。”

李立三身为八届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让他参加自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从8月8日起，华北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一次揭发批判高潮，李立三首当其冲成为被集中攻击的目标。10月在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进行批斗、作检查。

1967年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一举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掀起一股强大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继上海夺权之后，1月14日山西省的党政大权也被造反派夺去。在其影响下，华北局机关的造反组织，也都开足马力要夺取华北局机关的大权，李立三更是处在被打倒之列。

当时，我所在单位的造反组织负责人，多次找我谈话，要求我一定要与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划清界线。其标志就是要公开发表“造反”声明，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立三当秘书，不再为李立三服务。否则，就要考虑取消我的“造反派”资格。在我尚未下定决心、左右为难之际，李立三多次派他的司机来找我，要求我送文件给他看。其实，在当时那个混乱时期，并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可看，只不过是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之类。尽管如此，但对李立三来说，能不能继续看到这样的“内部资料”，已经不是小事，对于它的得失，确实是一种政治待遇的标志，关系极为重要。此时，我要司机转告李立三，“我的处境困难，要他不要找我。”由于我暂时中断了给李立三送文件的服务，也就中断了与李立三的直接联系。所以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李立三通过刘谦找我的局面。

李立三是在这样一种自身难保的关键时刻，不畏强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正地为许多同志的历史作证，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李立三同志这种高风亮节，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 李立三的绝命书

曾任党的领导人，为党作了许多工作，但也犯过路线错误的李立三同志，“文革”时期大遭劫难，被江青一伙诬为“特务”、“里通外国”。他难忍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最后走上绝路。自杀前，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绝命信：“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

……”

●天 风

经历过时代烈火的焚烧和政治斗争千锤百击的李立三，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惊得目



瞪口呆。他本能地感觉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运动，将是他一生最险恶的一道难关。一种不祥的预兆开始笼罩在他的头上。

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66年6月4日，华北局办公厅仅凭一纸手写便条就剥夺了他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的权利。

1966年10月，华北局机关造反派勒令李立三向机关群众作检查，交代和批判自己来华北局前后的所有“严重错误”。李立三被迫在群众大会上作了检查。

此时，造反派虽想对他大动干戈，但又看他不过是只“死老虎”并非名副其实的“当权派”，便没有太大兴趣触动他。

时至1967年初，“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疯狂活动愈演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都受到了批判。李立三更是在劫难逃。

首先，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大肆制造谣言、捏造罪名，要点名揪斗李立三。

接着，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梅河口会议问题，说当时李立三与彭真一起反对“林副主席”。

尤为荒唐的是，叶群竟无中生有地说，李立三曾反对并企图谋害过林彪。

当时康生曾对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烧一烧。”

不久，戚本禹在一次接见“造反派”头头们的会议上公开叫嚣：“李立三不是‘死老虎’，他的问题大得很……李立三是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

于是，“李立三里通外国”的大字报即刻出现在机关院内的墙上。继而勒令他交待充当外国“特务”，“出卖国家机密”罪行的大字报纷纷贴了出来。一夜之间李立三的苏籍妻子李莎，也变成“特务上司”。

要把李立三打成“苏修特务”，对于康生之流来说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即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不久，康生就写过一封信、说李立三和彭德怀一样也是里通外国的。毛泽东不相信，问他有没有实据，并说：“没有证据，不要轻易给一个人下结论。”后来，又有人告状，说李立三反对三面红旗，要求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当年同为工人运动领袖的刘少奇很同情李立三，曾对毛泽东说：“李立三在工业部的工作可能有错误，但是不能再批，再批就爬不起来了，让他自己检查一下吧！”

1959年的一关这样过来了，1967年这一关却十分难过：

各种各样的批斗会接踵而来，李立三却坚贞不屈。

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强迫李立三交待“里通外国”的“罪行”。李立三大义凛然，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坚持真理，修正误谈。”尔后，李立三面对口号如雷的造反派、高声说道：“我李立三犯过严重错误，什么时候都可以检讨，并且愿意改正。但是，反党和卖国的事情，我是绝没有干过的。”

在某大学组织的一次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几个造反派头头挥舞着拳头，指着他的鼻子，让他交代“罪行”。

“李立三，你为何还不低头认罪？”

“我没有罪。”

“你从三十年代就反党反毛主席，你还不承认？”

“那些错误我早就检查过了，那不是反党反毛主席。”

“你还嘴硬，你没有反党反毛主席，那你为何里通外国，做苏修特务？”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是苏修特务。”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是去学习的。”

“胡说，你和特务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时候勾结上的。”

“她不是特务上司……”

……

李立三义正词严，据理力争。

几个红卫兵把一大张白纸摊在李立三面前，逼他承认自己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李立三毫不犹豫，挽了挽袖子，挥笔写道：

我们完全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弄得清清楚楚，事实会证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决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李立三 五月卅一日

6月5日，由全国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发表了一份公告，公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劳……”

这骇人听闻的罪名，自然把李立三推向了深渊。

批斗不断升级。“从喷气式飞机”、挂牌子、游街、

所有“文革”中用过的办法都用上了。所有能罗织的罪名都拉来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最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向长沙各学校发出了“二十八草生”的征友启事。罗章龙是毛泽东征得的第一个朋友。听说罗章龙还有一位好友叫柳隆之（李立三原名），毛泽东就让罗章龙把李立三介绍给他。罗章龙欣然同意，安排毛泽东与李立三在一个星期天上午于定五台省立图书馆会面。毛泽东比李立三大六岁，见多识广，又正值壮怀激烈之年。两个人见面后，毛泽东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自己的一通宏论。从生活到事业，从政治到人生，从为人之道到国家前途，谈得头头是道。但是，李立三没有表态。是他年龄小，阅历少，初到长沙，对生活、人生及国家大事还未形成成熟的看法，还是他的见识不够广博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对毛泽东的雄心壮志不够理解，不能与之一拍即合，不得而知。结果是清楚的：李立三与毛泽东第一次晤面，是以李立三不发表意见而结束的。多年之后，毛泽东与李立三都成了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常在一起共事。当回忆起初次见面的情景时，毛泽东诙谐地说：“当年我的一个征友启事，只得了三个半朋友，李立三就是那个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半个朋友’。”全国解放后，有时两人开会见面，毛泽东还常拿“半个朋友”与李立三开玩笑。李立三也曾一度为“半个朋友”这个雅称欣喜过、自豪过。但不曾料到，“文革”期间，这“半个朋友”的雅称，竟成了造反派攻击李立三的口实。

造反派断章取义，曲解了“半个朋友”的原义，把李立三说成“开始就不是全心全意的”，“开始就埋下了一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就此，造反派对毛泽东这“半个朋友”展开了疯狂批斗。

他们迫使李立三拧着胳膊在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辱骂声、喊打声如雷贯耳。更有甚者，唾沫吐在脸上，动辄拳打脚踢。

李立三心力交瘁，有口难辩。长时间的轮番批斗，使他几度昏厥，瘫软在地上。

李立三痛苦不堪。他不但因自己遭受迫害而痛苦，更使他难过和心疼的是他的那位“异国之妻”。因为当时，在批斗李立三的同时，李莎也受到了连累，挂上了“特务上司”的牌子。

6月18日晚，妻子李莎几次劝李立三早点休息，但李立三坐在书桌前，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这时，造反派突然闯进了屋子。他还没来得及同家人说句话，就被揪住衣领拖走了。

李立三被关进了三里河一所私设的牢房里。

20日，在阴谋家的策划下，造反派同台批斗了李立三和他的夫人李莎。批斗之程度空前激烈。

李立三与李莎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同台批斗，竟是夫妻二人最后一次见面，竟是他们患难与共几十年最后的诀别。

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将随身携带的安眠药倒在上手，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吞下安眠药之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笔信：

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犯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当看管人员发现李立三时，他已失去了知觉，他静静地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香烟。他们立刻找车送他去医院，然而，行至半途，李立三就停止了呼吸。

他的遗体孤零零地放在那间牢房里，由一块白布裹着，上面写着：“服毒者李明”（李明是李立三早年用过的名字）。

火化单上也有“李明”的字样。

就在李立三自杀的当天，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突然被捕了。阴谋的制造者还说，李立三之死，是奉他的“特务上司”李莎之命，自杀灭口的。并说是20日的那次同台批斗时，李莎向李立三下达了这个命令。

时至1975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终于认定，李立三是“苏修特务分子”，将他永远开除党籍。同时，李莎从狱中放出来，流放到山西运城。

乌云遮不住太阳。1980年，李立三的问题被党中央重新审查，彻底推翻了阴谋家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不久，党中央就为李立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追悼会上，摆在灵台上的骨灰盒里，只装有李立三生前的一副老花镜。因为他的骨灰早已无处可寻了。

然而，李立三这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那一生光明磊落、坚贞不渝、粉身碎骨为清白的高尚品格，将永远照亮人间。

## 我喜欢《炎黄春秋》

● 王景山

我喜欢《炎黄春秋》。

我把“炎黄”想像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把“春秋”理解为悠久历史的指代。因此我读《炎黄春秋》，就如读一页页中华民族的历史，包括已成历史的昨天，以及亦将成为历史的今天。这里面有我们成功的篇章，也有我们失误的段落；有我们大步向前的记录，也有我们徘徊和倒退的足迹；许多人物、事件使我们自豪不已，扬眉吐气，也有一些人物、事件让我们感到羞愧，不免扼腕叹息。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原本就是汗水、血水、泪水的交织。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以为都是不应离开我们的历史，也不可能离开我们的历史的。汉代的哲学家、史学家荀悦在《申鉴》中早就说过：“君子有三鉴：“鉴乎古，鉴乎人，鉴乎镜”。唐太宗李世民更说得清楚：“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鲁迅则强调：“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未来，洞若观火”。他七十年前的一句话竟就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而说，那句话是：“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毛泽东则一再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因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炎黄春秋》以发表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作品为主，开辟了“春秋笔”、“古今谈”、“他山石”、“古镜台”、“群言堂”、“求实篇”、“英杰谱”、“人海浪”、“时代风”、“殒星篇”等栏目，我想这是她品位高而又深受读者欢迎的根本原因。

然而治史不易。过去评论人物，有所谓“胆识”之说。我以为治史亦如此，要

有“史胆”，“史识”。所谓“史胆”，就是敢于发掘历史真相，敢于直面历史事实，敢于秉笔直书，敢讲真话，不做瞒和骗的蠢事；所谓“史识”，就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既十分注意主流和九个指头，也不忽视支流和一个指头，在左转弯的迷雾中寻找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求得真实，求得真理。要而言之，史胆就是唯物论，史识就是辩证法，两者的结合便是我们一日不可或缺的“实事求是”。

我国过去的正史，常常多所隐瞒，鲁迅称之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教条，长期干扰着史实的记载和历史研究，董狐笔因此难能可贵。这种情况，即使在革命阵营有时也在所难免。《炎黄春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禁忌，甚至对革命领袖和革命进程中的某些重大失误，也提供了一些过去因种种原因而鲜为人知的内情和背景材料，因而使人耳目一新。

鲁迅曾慨叹过去中国所谓正史，“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因此他一再提倡读野史、杂记、笔记，“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炎黄春秋》不好直接比作、指为“野史”，但确也具有了鲁迅心目中“野史”的可贵、可取之处。

人们当然有权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但历史却是不容掩盖、歪曲和伪造的。例如，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总共不过四个寒暑，其间波澜起伏，左右着中国的进程，但云谲波诡，华袞俨然，即使是身历当年那一段不平凡的时光的，又有几人能察其底细，明其真相呢？然而，底细难察，真相不明，总结经验教训云云，又从何谈起？不过如果把在《炎黄春秋》上刊出的《徐水，梦幻的天堂》、《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胡开明并非“胡”开明》、《最早为

包产到户呼吁的两个年青人》、《关于庐山会议的“庐山真面目”》；《“刮单干风”的曾希圣沉浮记》等文，放在一起读读，大概就可以察其底细，明其真相，有何经验值得总结，有何教训应该吸取，也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曾经经历过假、大、空话满天飞而不准、不能、或者也不敢讲真话的年代。时至今日，“假、大、空”的歪风并未完全绝迹，而讲真话的主张也仍能遭到非议。但时代毕竟不同，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认识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在《炎黄春秋》中看到了以《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为代表的一批掷地有声的文章，作者群包括了（以文章刊出先后为序）李锐、师哲、温济泽、凌云、萧克、李之琰、莫文骅、李德生、伍修权等，他们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动态和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不管是他们自己的回忆录还是别人写的访问记，应该说都提供了宝贵的无可替代的第一手材料。而另有若干力求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历史学家和纪实文学作者，或是勇敢地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或是生动地留下了现世界的真实情景。

我之喜欢《炎黄春秋》还在于它的严肃性和通俗性的结合，严肃而不严厉，通俗而不媚俗，这就使它具有了高度思想性，厚重史料性、渊博知识性和雅俗共赏的可读性等多方面的特色。

当然，不能说《炎黄春秋》毫无瑕疵，有的文章重厚不足，信息含量不大，有的文章文字上尚欠琢磨，有的文章间有错误，在编排、校对方面，也都有待改进。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而《炎黄春秋》一旦发现所刊文章存在失实、失误时，却不惮及时发表更正补充，坦诚以对历史，坦诚以对读者，这也就弥足珍贵令人钦佩了。

1994. 4. 16 北京首都师大

# 笔魂

——记书法家王明远

●张飙

“柔性定胜刚性立，一枝还引万枝生？”我问。

“不，不是……”他沉吟着摇摇头。

我又问：“那么，风吹鼙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他又摇摇头：“不，也不是……”我仍然穷追不舍：“那么，少年说剑气横斗，长夜读书声满天？”

这次他不再说话，可还是沉吟着摇摇头……

这是我和书法家王明远的对话，我想让他说一说他在写字写得最得意时的感觉——通常人们管这种感觉叫“灵感”，文人们却叫这种感觉作“魂”——谁知他却说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于是我便把我觉得可能的感觉用诗句说出来，可他又犹犹豫豫不肯表态……

这不太像他的为人。这位在东北大平原上长大的汉子，从一见面给我的印象就是直率、豪爽。我还记得1983年刚刚认识他时，我和同事一起到他家去，大热的天，家里没有水喝，倒有两箱啤酒。一面开瓶，他一面大声说：“来吧，以酒当水这是我们松江人的性格！”

就这样嘴对着瓶子，他咕嘟喝了一瓶。然后就执钩回腕，笔剑毫飞，大书了“大道自然”四个字。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看他写字，就像平原看驰马、山间观湍流，胸中回荡着一股劲力。等那字一挂起来，又觉得心内抑塞一扫而空，尽存磊落豪气。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所以我才问他，可不可以把这幅字送给我。他挥了挥手，说：“给你！不单是这一幅，这屋子里的字，只要你看得上，想要哪幅，尽管拿走！”

或许就是因为我喜欢他的这种豪爽劲，才和他的接触多了起来。而接触一多，就更感到他的直率。他心



里从来是藏不住话的。可是今天，一说到笔魂，这样一个直率豪爽的男子，也变得吞吞吐吐的了！

难道真的是“千钧墨意随风走，一抹笔魂无处寻”？

我之所以找他讨论“笔魂”的问题，是因为昨天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我遇见了他。

或许，在1993年3月一个普通的春日召开的这个发布会，和在北京每天都要召开的几十甚至上百个新闻发布会相比，今天在西交民巷50号全国记协召开的发布会显得不很正规。是的，没有“大领导”来祝贺和一本正经的讲话，来的大多数是我国书画界的知名人士，不少人在兴奋地议论，更有不少书法家、画家们自发地泼墨挥毫起来。

是的，虽然会场没有布置得富丽堂皇，但说的事却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秦文研究所的专家们，历经十载艰辛抢救国宝，踏破铁鞋，读书万卷，集补重书了濒于泯灭的秦代七碑！

我没有想到，经两千多年风雨消磨和战乱兵灾已经被毁灭殆尽、仅有《琅琊台石刻》尚存13行字的秦代碑刻，竟能在今人的手里恢复全貌！我更没有想到，主持这项浩大工程的这位老太太，竟是一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也是这位老太太，按秦碑刻石的笔意和大小重新书写了碑文，并拓印成了七卷巨著！

就在我仔细端详着这位叫李文放的书法家的时候，王明远很得意地对我说：“她是我的恩师。”

我一下子记起来，刚才李文放宣布过，今天的会是东方文化发展总公司协助开的，而王明远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啊！

当然，王明远还有一些“职务”。比如说，他还是



东方书画院的院长，是一些协会的“顾问”。但是他最得意的还是他的书法，每次见了我都要说一通他的书法又有变化、又有进步之类。他也确实有的可说。远的不提了，就说近的，刚刚在中央电视台放过的电视剧《古船·女人·网》就是他题的片名。今年的“两会”期间和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放的《异军突起》、《共和国之春》、《广西春潮》，也都是他题的片名。在书法界，他是年轻一代里的佼佼者。

不过，我不知道他还有这样一位恩师。

是为了报恩师的情，还是为了秦代的字，还是两者都有才赞助这样一个活动呢？

“好像是，又好像都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的灵感、你的激情、你的风格、你的生命，有时会在一个时刻一起迸发出来？对，你有。啊，你写文章的时候有，你叫它什么？文魂。那是不是我写字的时候这种感觉应当叫笔魂呢？对，参加像秦碑这样的事情，有时好像就摸到了‘笔魂’……”

然而，等晚上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却又说不出“笔魂”的感觉了！

“没关系，说不了笔魂，就说说恩师吧。”我说。

他看看我，竟说了一句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

我是吃松花江的水长大的——

是的，我是吃松花江的水长大的，所以，我永远不能忘怀，也是恩情最大的恩师就是松花江。我从她的身上学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好的，我可以慢慢说。

人都说，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自己的父母，这话再正确不过了。无论是做人还是写字，我爸爸都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记得还是我9岁那年加入了少先队，1946年就入了党，解放后一直在肇源县委工作的父亲对我的奖励是给了我一本颜真卿的《多宝塔》字帖。现在想起来，也许父亲并不是希望我成为一个书法家，而只是让我“学字先学人”。记得当时他讲了许多道理，我印象最深的是说颜真卿的字“宁朴无华，宁拙无巧”，自然流畅，就像松花江的流水，该大时大，该急时急，不用遮掩，不用做作。你和我的不少朋友都说过我“有东北人的豪气，待人诚恳”，我想这是不是从小父亲就教我“真诚”的原因呢？

当然，从松花江上领悟到的绝不只是这一点。

也许我这人天生就和书法有缘，我自从一见到那本颜真卿的《多宝塔》，就再也放不下了。所以，我的童年记忆里，没有弹玻璃球、打山雀、掏鸟窝的欢乐，却有着不少瀚墨里的愉快。是的，每写一个字都能够感到一种快感。真的，有时字写得轻灵飞动，会让我有鹰翔长空的感觉；有时笔势盘屈直下，又让我有一种虎凌群山的感受，也许，这种感觉还很幼稚，但它却足以成为一个10岁的少年在书法的大海里遨游的动力了。

你别急，马上就要说到松花江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过，父亲教我练书法，竟成了他在“文革”中的“罪状”之一。我不会忘记造反派给父亲的“上纲上线”：时代前进了，别人都用钢笔写字，你却教你儿子用毛笔写字，这是地地道道的倒退！有些事，我们的后代也许永远也想不通。比如说，造反派问我父亲是什么地方入党

的，我父亲说，是在高粱地里，马上就被说成是“对党的诬蔑”，因为“入党是极其严肃的事情，怎么会在高粱地里”？

我不知道中国还会有那种愚昧、残忍和蛮不讲理的黑暗时光。当然我是希望永远不会再有。我父亲是被他们活活折磨死的。我和妈妈被赶到松花江边的农村去“改造”。

笔和墨都被抄走了，字是写不成了。没事，我就到松花江边看着江水出神。有一天，我光着脚在沙滩上走，看到了自己在沙滩上留下的脚印，不由得大骂自己是个笨蛋。这沙滩能够留下脚印，就能够留下字迹啊！当年岳飞不就是用沙子练字的吗？

耳边是松花江松涛般的水声，眼前是从远处奔来、又向远处奔去的滔滔江水，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说，是不是更能把自然和字结合起来？你还记得我给你写的第一幅字吗？记得？对，是“大道自然”。应该说，对这四个字的理解，我是从松花江边练字时开始的。对，我在1984年时给你写过一幅“松涛”，你还说那里面有一股天地自然的真气，我想，那就是松花江的神韵！

是的，沙子是不要钱的，当笔用的枯枝也不要钱。而且，在干沙上写字，笔容易发飘，要想使笔力凝重，必须凝神静气，在湿沙上写字，笔又容易滞涩，要想使笔力灵转，又必须驭气自如。我虽然不提倡大家都用纸笔去沙滩上写字，但我自己在沙滩上的练习，却给我一生的字打下了很好的基本功……

说到这里，王明远打住了话头，看着墙上挂着的他的条幅“笔墨千秋”出神。这幅字笔法精纯，气韵空灵，瘦劲处履险如夷，清虚时神采飘逸。或许，这字里就听得见松花江的滔滔江水声？

我不禁心里一动，难道“笔魂者，自然也？”

王明远没置可否。他又说起了童年。

他说的这件事我过去听他说过。那就是那年的冬天，松花江结冰了，连沙滩都冻硬了。小小的王明远来到江边，字却练不成了。他站在凛冽的北风里，望着满天纷纷扬扬的大雪，失望的泪珠大滴大滴地从脸上滚落……

第二天，明远早上一醒来就愣住了：炕桌上有一碗墨汁和一块玻璃板！

妈妈慈祥的面容上挂着一丝倦容。为了这“墨汁”，妈妈几乎一夜没睡。他把锅底灰刮下来，用水细心地调成墨汁——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调稀了，没颜色，调稠了，写不开。望着妈妈那红红的眼睛，明远一下子扑到妈妈怀里：“好妈妈……”

明远高兴了，可妈妈却背过脸悄悄擦掉了眼泪。有谁能真正理解母亲的心呢？她的丈夫因为教儿子学毛笔字被说成了“复旧”，最后被折磨致死，可她看到了儿子对书法的酷爱后却又忍不住给儿子提供学字的条件。这是一个“伟大”能形容的情感吗？

可是，还缺一支笔呀！

家里唯一的老母鸡下了第一个蛋，妈妈就把还热着的鸡蛋放在了明远的手中。

明远飞快地来到供销社，把卖鸡蛋得的6分钱交给售货员大姐。可是，最便宜的毛笔也要7分钱一支！

难道还得等到老母鸡下第二个蛋才能有笔写字吗？明远痴痴地望着文具柜。好心的售货员大姐已经是多少次看到这个瘦瘦的孩子眼巴巴地来看着毛笔发呆，她叹口气，摸了摸明远的头，替他垫上了一分钱。

“那是我生平用过的最便宜的一支笔，也是我平生得来最艰难的一支笔！现在还有谁能想到，一分钱有时能成为人向自己的理想前进的障碍呢？又有谁想得到，一位母亲的爱心，一位不知名的大姐的爱心，有时会成为人前进的动力呢？”

这回轮到我有有些发呆了，难道追踪笔魂的路，也要落入“一切都是因为有了爱”的俗套吗？我赶紧转变话题，说，你说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说到你的恩师李文放的身上呢？

王明远竟笑了：没想到，你还这么性急。好的，就说说李文放老师吧——

说李文放是我的恩师，首先是因为她发现了我，并把我调入了北京。

说起来，那还是1979年的事。当时，我的户口落在了在石油战线工作的姐姐家里，于是就随着姐姐到大庆、到湖北、到大港，又到了北京的燕山。我这个人只要喜欢上一件事，就决不会放手，所以到了燕山，我就鼓动成立了燕山区美术书法协会，这是北京第一个类似的协会，我是协会的秘书长。当时爱好书法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我几乎每天要出去讲课，主要是到中学讲。正在这时，中国书法协会筹备组成立，李文放老师负责筹备组的工作，她发现了我是个这方面的“人才”，于是就想办法把我调入了北京，就在中国书协筹备组工作。到了书协，我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书法学校，当时名誉校长是著名诗人艾青，校长是李文放老师，我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

是的，你说得对，李文放老师不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在我见到李文放老师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定的书法水平了——否则，李老师也不会调我了。

水平从哪里来的？你问的这个问题说简单也很简单：练出来的。但说复杂也复杂，因为从松花江到燕山，我的书法道路是很漫长的。

当然可以详细说说。自然也 and 一般人学书法一样，我也是从“临帖”开始练的。临柳公权的，临王羲之的，临欧阳询的……

当然得都临。临得越多越好。因为个人的体都是不一样的，临多了就可以把大家的优点都学到了。柳公权的字肩架严谨，力透纸背；欧阳询的字清眸丰颊，神采秀发；王羲之的字道媚劲健，千变万化而又出于自然……

你问当时哪里有这些字帖？这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过我。说起来或许真的是因为我和书法有缘。那还是在大港油田的时候，我虽然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每月的工资只留下7元钱吃饭，其余的都买成纸墨来练字，可没人指点进步就不快，这成了我最大的苦恼。有一次人家和我说天津有一个姓程的老书法家，我高兴坏了，就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去求教。

不用说当时的详情，程老对我也是恩重如山，他不仅把我当成他的唯一弟子，还把他珍藏了多年的字帖都给了我。有《九成宫》，有《金钢经》，有《兰亭序》，有《蜀素》……这不仅是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非同小可的啊！

是的，我在那个时期是拼命临帖。《金钢经》临了300遍，《兰亭序》临了900遍，米芾的《蜀素》，究竟临了多少遍，我也记不清了。

临了手头有的字帖，我还是不满足，可当时也确实找不到更多的字帖了。偶然听人说，西安的碑林有1000多块石碑，每一块都是书法艺术的精华，我又高兴坏了。于是把几个月的工资攒下来作了路费，一个人到西安去住了一个月。

那真是祖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啊！碑林里不仅有书法，还有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还有华夏古国文化的源流。我一块一块石碑地看，一块一块石碑地揣摩，有时在一块石碑前能呆上整整半天。我觉得，从这些石碑上，我看到了松花江的流水，看到了东北的平原，看到了西北的黄土，看到了秦岭的苍松，看到了古人的倔强，看到了今人的刚强……

西安之行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觉得，我的字就是在碑林里升华了的，也就是在碑林里，我体会到了书法艺术原来是和日月山川、风云雷电一样，能够沟通古今万古亘存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字就有了“灵气”，就有了情感，我的一切就都能够很自然地通过

字流露出来了！

真的是这样。字就是人，人就是字。它的真正意义是说，当你把自己的生命和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字就真正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时，别人上街游行庆祝，我在家里一气写了74幅“大快人心”的条幅。我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我没有流泪也没有欢呼，而是一气写了50幅“笔意风云”的条幅……

正好，王明远家的墙上就有一幅“笔意风云”。其中特别是那个“风”字，左撇粗拙拄地，力道千钧，看到这样的笔划，让我觉得即使在松花江的沙滩上，它也可以立得很坚牢；右勾却一飞直上云天，让我感到这人的志向直凌九霄。接着笔向回一收，涂成了风内的“虫”字，又给人以正在奋力挣脱桎梏之感。这不就是“生命在字中的体现”么？

我似乎隐隐感到了“笔魂”的存在：笔魂，其实就是人的灵魂的“墨化”啊！

但王明远却仍没有表示可否。他只是讲着自己的恩师——

原谅我说得太远了。我要说的是，我不仅向李文放老师学了她的著名的“飞白篆书”，她更从书法和人的关系上给我上了很生动的课。

话头是从一次和日本人的书法“联谊”引出来的。我刚到北京不久，日本的一个书法代表团来华访问，并提出来和中国的书法家“联谊”。当时“文革”结束没有多久，许多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书法家还没回到北京。而学书法的年轻人更是寥寥。正好我在书协工作，就被叫去参加了。

哪里是“联谊会”啊！我看有些像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擂台赛”。

你别笑，真的。那些日本人不知叽里哇啦说了些什么，然后是中国人也鼓掌，日本人也鼓掌。接着，案子上就铺上了纸，摆上了笔。怪得很，日本人的老头一个也不出面，让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出来表演写字。那小伙子开始还很谦虚，一边嘴里叽里哇啦，一边向四周鞠躬。可一拿起笔来，他就大不一样了。只见他拿着笔先不写字，而是蹲成马步运气，运完了气，“啊”地大叫一声，然后饱蘸墨汁，用全身之力在纸上一点，接着运笔如飞，写完了，把笔往桌上一拍，“啊，啊”地大叫着在屋子里跑了两圈！

别说是写字，就是在运动场上，运动员们也就是这样的气概了！咱们中国的书法家那里公开写字的机会

都很少，就是写，也是暗中运气，没有谁大叫着写字的。当时被日本这个小伙子一闹腾，我们都愣了！是啊，谁见过这样的阵势？

那日本人又四面鞠躬下去了之后，场子可就冷了。按理是该中国人表演了，可我看来来的书法家们都是年纪很大的。不要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写过字，就是他们上去了，气势上压倒日本人，也是“以大欺小”，人家也会说中国书法后继无人啊！

没有别的话说，只能是我上了。因为我最年轻。

现在想想有些可笑，我也像日本人那样，给大家鞠躬后来了个马步蹲裆，“啊”地大叫一声开始写字！而且我想我叫起来一定比他高昂，我是在松花江上叫过的！

笔走龙蛇，我越写越觉得全身气力充盈，写到最后一点的时候，我只觉得全身的力气都到了手上，不禁把笔重重地往桌子上一顿。你说奇不奇怪？那笔的毛竟然四散叉开，一支笔竟然稳稳地直立在了纸上！

这一次我没有大叫，而全场的人——包括日本人——都鼓起掌来！

你知道吗，后来一些日本人还来问我是不是练过气功！

更让我感动的是，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一些老书法家竟大加赞扬，而且提高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的高度！

李文放老师也和我议论过这件事。她的夸奖之词我就不多说了，我印象深的是她说的古人的事——不是说的忠臣，而是说的一个书法自成大家的“降臣”。

说起来你肯定是知道的，元代成就最高的书画家、诗人是赵孟頫。对，此人正草隶篆无一不精，据说能“日书万字”。看他的字，用笔绝劲，仙风道骨，看他的画，有人怀疑“决非凡品”。可是对这样一个冠绝一时的大书法家、画家，当时的人是如何评价的呢？并不是到处都有人追着“签名”，相反，当时的人就对他大加讥讽。

那原因很简单，他这位宋太祖赵匡胤的11世孙，竟然投降了元朝。虽然他在元朝的官作到了“翰林学士承旨”、“魏国公”，可是连他的儿子都抬不起头来。赵孟頫的儿子赵仲穆擅长画兰，有位叫张雨的道士就在他画的兰上题了一首诗：“滋兰九畹空多种，何以墨池三两花。近日国香零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赵仲穆看了这首诗，羞愧得从此终身不敢画兰！

李老师还讲了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人——一个叫杨维桢的书法家。杨维桢的字运笔清劲，矫杰横发，跌宕奇纵。此人是元朝的官，是个大才子，朱元璋统一了全

国后，网罗英贤，闻杨维桢之名，派人逼他出来做官。杨维桢作了一首诗，把那些投降了明朝的人比做朝秦暮楚、追欢买笑的娼妓。还说：“如果要强迫我，我就跳海去死！”

所以杨维桢很为后人仰慕！

李文放老师总结说，一个人的书法再好，人品不好，也得不到人们的尊敬！或许书法造诣会因人而异，但是人品的高下却不会因为书法的好坏而改变！无论是今人看来还是古人看来，元朝和明朝都是中国的。赵孟頫和杨维桢都是作的元朝的官。但是赵孟頫是从宋朝投降到元朝的，杨维桢却是元朝的官不肯投降明朝的。说到这里就很明白了，人们不是因为他在哪朝当官而是看的他们的为人，看他们是不是有自己的人格。就是因此，现代的人也尊敬杨维桢而看不上赵孟頫，说明忠贞不贰永远是受人们尊敬的！所以，学字先得学做人……

这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够我受用一生！

看得出来，王明远很有些激动。是对恩师的激情，还是对书法体验？

我也有些激动。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今天，一切东西都可以拿去卖钱，书法作品更是其中的“俏货”。可在一个公司的董事长的眼里，它居然不仅还保持着艺术的高尚，还和人的气节、人的品格、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难道不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么？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真的“笔魂”！

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写写他。

在决定了写他的那一刻，他的许多事情又涌出了我的脑海。而这些事情，又毫无例外地和我心目中的“笔魂”结合在一起——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为亚运会的“义卖”。

1987年6月9日，王明远在北京琉璃厂槐荫山房为第11届亚运会举办书法义卖展。这可以说是惊人之举，因为在书法界，他是第一个为亚运会义卖的。那天我也在场，其热闹景象我至今记忆犹新。展厅的楼上楼下都挤满了人，记者、领导、书法界的朋友们都交口称赞。我记得，宋任穷为义展剪彩后，还当场题了“无私奉献”的赞词。著名诗人艾青也当场题词“笔端爱国心”。

不过，我印象深，不是因为来的领导多（杨成武、包尔汉等都来了，吕正操将军还题了词），也不是因为义展开幕仅一小时，就有10件书法作品售出，王明远当场把卖得的一万元人民币交给了亚运会组委会的同志。我印象深的是义展之前他的准备工作。



是的，义展时，挂出了60多件他的作品。可是为了这次义展，他写的却绝不只这么多。有的作品是他原来的得意之作，可他感到为亚运会义卖，原有的作品还不够。于是他又苦苦构思，挥笔创作。而且，他决不因义展就敷衍了事，相反，他更一丝不苟。一幅“雅静风神”，他写了40多幅才选中了一幅，一幅“风烟入画”，他足足写了50多张！一幅“笑为苍穹剑胆气，傲然大地吟心诗”，写了不知道多少张！

这是怎样的认真啊！

我不只一次和王明远探讨过他的认真精神的来源。他呢，仍然说是“恩师的影响”。比如说李文放老师在编撰《中华篆文大字典》，没有人给经费，反而要她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给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发工资。积蓄不够了，她就卖字。她为了重刻秦碑而写的篆字，每一幅都要写上十几稿。再比如，后来王明远拜了著名书法家王遐举为师，王老第一步就教他“写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并说，写什么字应该用什么墨、什么笔，一点都不准含糊。王遐老自己就是一个认真的典范……

这认真，不正是那“笔魂”的体现吗？

我想，把字和人结合起来，把字品和人品结合起来，这正是王明远成功的秘诀。

是的，没有这一点，他从1980年起就在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办的书法展能每次都一卖而光吗？

没有这一点，国际大厦能在1985年就请他题写那每个字都2米见方的楼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能请他题写公司名（至今保险公司都是用的他的题名）吗？

我想，追踪笔魂的终点已经到了。所以我把我对笔魂的理解说了。然而，王明远却说：“对，字和人的精神、人的品格、人的气节……不过，我还是觉得少点什么。”

还少什么呢？

他说——

你还记得我办的另一件事——我主办的“首届中国书画百家大展”吗？

对，你的记忆没错，是在1989年的4月在历史博物馆开展的。对，也是盛况空前。开展的第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18位，艺术家来了500多人，企业家来了1000多人。参展的作品都是当今中国最有名气的人的佳作。黄苗子、费新我等人都参加了。那年的8月，中央电视台还为这次大展放了一个专题片，叫《墨海大观》。许多书画界人士现在都还记得那次大展，说明它是很有影响的。

当然。当这样一个活动看起来好像容易，做起来可

是充满艰辛。就说收集这360件作品吧，现在想想都觉得难。要知道，360件作品件件都是珍品啊！我得给这些著名的书画家们一个人一个人的发信，请求他们参加，有些作品是用快件寄来的，有些就得我们去取。在天津北京的还好办，上海南京也得去啊。收集了作品，还得一件件裱装，还得好好保存——这些作品不少都价值连城，损坏一点都不行！

是的，筹备工作是硬着头皮做下来的。整整筹备了一年。

一年啊！正因为筹备的时候长，开展那天我才那么激动。对，我是讲了，这次大展是文化系统团结的大会。有人说我口气太大了，怎么能不大呢？我办这件事就是想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贡献力量嘛！

你看过我那首我最得意的诗吧？对，就是在大展后写的。在我写的300多首诗里，我最“孤芳自赏”的就是这首绝句：

直念沧桑向天说，华夏荣辱我有责。沉浮堪笑生平曲，瀚墨天涯大风歌。

好诗！我又一次赞叹。刚叫完好，我忽然心里一动，哦，他刚才说的笔魂里缺的一点东西我找到了，那就是“华夏荣辱我有责”！

这一次，王明远首肯了。是的，一个书法家，唯有把练自己的字力和培养自己高尚品格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字的神韵和民族的精神结合起来、把自己的书法事业和祖国的兴衰结合起来，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

这才是真正的“笔魂”啊！

告别了王明远，已是月到中天。此刻，看看月亮中的阴影，竟觉得那也是一幅书法。那可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嫦娥在亘古以来无以比拟的寂寞中写出的天书？

王明远永远不会寂寞，我想。因为他一直在现实里，从来没有想过把书法放进“象牙塔”。有时他为此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然而他对书法的爱却始终矢志不渝。我相信，他的书法还会进步，因为——

松花江的滔滔流水

父亲的“学字先学人”的教诲

妈妈为他调好“墨汁”时的热泪

不知名的大姐抚摸着他的头时的叹气

李文放老师讲赵孟頫、杨维桢时的庄严神情

为亚运会义展时人们的称赞与尊敬

这一切将会永存他的心中，也会融化在他的字中。

章毛  
士泽  
钊东  
寻感  
踪慨  
三赞  
格御  
格妹

●  
刘  
蓬

1955年元旦，中共中央办公厅像往常一样，收到了由各处呈送毛泽东主席批阅的文件。在众多的公文里，有一份材料显得与众不同，十分显眼。它是由当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送来的，其中除章士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及章士钊题《满宫残照记》两首诗外，还有一年轻女子19岁时的西洋婚纱照和一张26岁时的满族旗装照。随后是这个女子用毛笔恭恭敬正写了十几页的自述。照片上的女子十分漂亮，字也写得清秀端庄。两张照片背后，章士钊早有二首题诗：

“寿阳公主正华年，头拂宫纱薄似蝉。

捧到额黄成八字，已含幽怨在眉先。”

“初见云仙婀娜姿，芙蓉头上挽青丝。

只今宋玉虽无恙，未预高唐梦觉时。”

在白底素花，十分雅致的信笺上，章士钊对毛泽东说：

“润公主席座右，今日是乙未元旦，物转星移，无所致祝，特献一满洲女子之自述册子，备公作太平广记观，为几余谘虑之助，并贻一诗于后；入春春意满江湖，举国喁喁望汉酺（指解放台湾），谁是旧时王谢燕，衡书献作朝发图。按此册为该女子自撰自书，以文字论似亦女知识分子中之佼佼者。况益以身为满人零落，不偶之境遇乎唯。公优于提振，不胜大愿之肃敬，敬春礼，章士钊谨呈。汉铜洗文，丁未元春”。

章士钊和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昌济是至交。经杨先生介绍，毛泽东在1919年就认识了章士钊。建国后，两人交往仍多，关系甚为



深厚，或互通书信，谈古论今，或题诗赠诗，每遇可读之书，也往往彼此赠阅，如老友一般，这次章士钊又给毛泽东写信，推荐可读之物，自是情理之中。但这位美丽的满洲女子，被章士钊称为“女知识分子中之佼佼者”、却“身为满人零落”，要毛泽东考虑“优予提振”的是谁呢？章士钊为什么会在《满宫残照记》上题诗？这个女子的自述又为什么会到章士钊手中，由章士钊送交毛泽东呢？

## 闲逛书摊，章士钊偶得《满宫残照记》

身为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对满清宫廷历史尤感兴趣，从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到《苏报》主编，他一直注意收集珍藏各种晚清历史记本。1954年的一天，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到旧书摊上买书，偶然见到一本名叫《满宫残照记》的书，书很残破，内容却很有趣，是一位叫秦翰才的老先生，把所能收集到的一切大小残余伪满宫廷材料编辑成册，形成一本伪满宫廷笔记，其中所收大多是皇室家庭信件及生活实录。章士钊以前从未见过此书，这次见了，真是如获至宝。他浏览了一遍，内里一个叫余韞颖写的信，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些信都发自日本，是寄给她的哥哥，当时在伪满洲国做“皇帝”的溥仪的。写信人并未因为对方的特殊身份而诚惶诚恐，相反，信写得天真顽皮，流亮轻松，很是优美，在满篇晚清遗老遗少们的八股之中，这十几封信读来别有一番情趣。

章士钊见其文采，很是欣赏这位有才情的女子。欣赏之余，又有好奇。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满宫残照记》。回到家来随即题诗两首：

“虜廷琐屑出天伦，小别腾意戏谑影，风趣略同杨妹子，文才老逊性情真。”

“白山残照掠影京，密记金銮有恨声，天意不怜三格格，思令飞弹打流莺。”

题词完毕，章士钊决意访求其人。溥仪是否有一个人称“三格格”的妹妹？现在又身在何处？状况如何？这些都无从知晓。于是章士钊就去找溥仪的七叔戴涛询问。戴涛说，溥仪确实有一亲胞妹姓金名韞颖，人称“三格格”，最近才从东北迁回北京，和她的婆母住在北京北兵马司十号，生活情况甚为恶劣。

章士钊闻言，执意要见一见三格格。不几天，戴涛就带着金韞颖来到了章士钊的寓所。只见这位三格格，却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妇女，衣着简朴，风华已失。言谈举止中虽平和谦逊，却无神采可言。章士钊深深感到，眼前的这位妇女已然失去了三格格在《满宫残照记》的书信中流露的那一份神采！世事变迁，几十年

的磨难与困苦，早已使他英华销蚀殆尽。章士钊感叹不已，想到国家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各族人民正团结建设国家，各项政策理应落实。“满洲国”虽已消亡，但其族类犹存，妇女恭弱，实在可悯。国家应该给他们以一定的安置。章士钊对金韞颖说，你写一份自述吧，由我呈送给毛主席看看。过了些日子，金韞颖真的写好了自述，又送至章士钊家。章士钊马上转呈了毛泽东。此时，已是1955年元旦了。于是，这位昔日御妹的少女英姿和今日的生活就这样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

## 昔日御妹的风华岁月

金韞颖，1913年出生于北京紫禁城，由于爱新觉罗家族自醇亲王戴洋起就改姓金，所以韞颖还有两个字号，一个是其父戴洋为她取的蕊秀，一个是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为其题赠的莉莉。由于她排行第三，所以宫里人通称她为“三格格”。

三格格出生时已是民国二年，虽然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已建立起来，但在高墙围绕的紫禁城内，满清皇室依在，封建体统依存。皇帝的尊号不仅没有废，中华民国还需以对待外国君主之礼对待满清皇室，每年还要拨给清皇室400万两黄金供其使用。清皇室仍旧拥有各种办事机构，宗人府、内务府、护卫军等一应俱全，遗老遗少们也每日进朝，从宫中领取奉禄。三格格天性娇柔温文，而且生得美丽聪颖，生在深宫，身边虽有成群的宫女和奶妈照料，童年却非常的落寞，宫门不让出，更不知上学是怎样一回事，她曾回忆说：“我幼年的时候，在王府里过着与世界隔绝的生活，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憋气，那真是不幸的童年，寂寞的童年啊！”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包围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溥仪只得迁居天津张园，十多岁的三格格也走出了紫禁城来到了天津。走出宫门，她天真的性格显露了出来，每日和溥仪及兄弟姊妹学习日语和英语，其它时间则打网球游戏，她和溥仪同为瓜尔佳氏所生，深得溥仪喜欢。

19岁那年由溥仪指定亲事，三格格与前清大臣荣源的二儿子、也就是婉蓉皇后的弟弟润麒订婚。润麒与溥仪私交很密，由于姐姐婉蓉皇后的原因，润麒很小就进宫与溥仪一起读书玩耍。他性格开朗，敢做敢当，是溥仪的心腹之人。溥仪把他几个姊妹中最漂亮贤淑也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嫁给润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31年在天津闲居6年的溥仪在日本军警的秘密保护下出逃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三格格和润麒的婚礼也就迁到长春举行。婚后不到一月，溥仪便派溥杰和润麒去日本学习军事，三格格韞颖也随之来到日本。三格

格一到日本，日本皇室上下便把她包围起来，极力拉拢，不仅要她担任妇女会的名誉会长，而且裕仁天皇的弟媳也特邀她去寓所让她教中文，一教就是半年多。对此，韞颖初时还可以应酬，后来就越来越感到束缚和压抑，便时常提笔写信给溥仪，一来一往，信件便逐日增多起来。溥仪很喜欢读韞颖的信，这是因为韞颖不仅文笔出色，而且她的信与别的兄妹不同，时时流露出她天真直爽的个性，很能使在日本人和满清遗老包围中的溥仪得到片刻欢乐。溥仪把这些信件装订成册保存起来，章士钊看到的《满宫残照记》中的十余封信，就是韞颖在这一段时期写的。

在日本生活的不快与所受的束缚，终使韞颖感到厌倦，两年后，韞颖回长春探亲，就再也不肯回日本去了，润麒也从日本回国，在伪满高等军事学校任中校教官，他们便在长春住了下来。但日本人并未因此而放弃拉拢，韞颖又被推举为日满妇女会的名誉总裁，每日依旧被一群日本人及满清妇人包围，嘻戏玩乐，她的享乐日子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直到溥仪的复辟美梦终于彻底破灭。

1945年，日本战败，韞颖在惊慌中随着皇族家眷苍惶逃至大栗子沟躲藏，不几日，东北解放。做为三人格的韞颖，对解放军心存疑惑，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将是什么？政治上她以往从不过问，只知玩乐和哺养三个孩子，现在丈夫在逃亡途中下落不明，自己又该如何支撑今后的生活呢？这一年，韞颖32岁。

## 从御妹到平民

金韞颖还年轻，她感到清皇室的垂败已是定局。只有重新做人一条路，在新的社会中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普通平民。历经内心的几番斗争和思虑，她在与解放军的交往当中，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感受说了出来。为表达她的决心，她又把随身携带的十几箱金银珠宝全部上交，只留下随身的几件换洗衣服，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通化。

过惯了一掷千金生活的皇族御妹，虽决心自食其力，可是谈何容易。她会做什么？又从何做起？韞颖脑海中一片茫然，但生活总要继续下去。丈夫随溥仪逃走的时候，连面都没来得及见，更不要说把她们托付给谁了，一家几口要糊口，只有依靠自己。韞颖脱下她穿了几十年的华贵旗袍，摘下了金银首饰，换上了普通的蓝布短衫，在街上支起一个香烟摊，兼收一些穷户人家的破衣破鞋，开始了她坦然却是艰苦的生活。

开头几日，这位皇家御妹总也张不开口叫卖，就连跟她在一起的老妈子也觉得脸上不好看，不肯跟她一

起上街。但脸面毕竟拗不过吃穿的需求，她终于张开口，喊出了第一声。但这种温饱的日子并没过多久。谁让她在日本人手下做过妇女会的会长呢？一日，临江来了两个民兵找到韞颖，叫她们全家速到临江报到。韞颖心中诧异，但还是拉家带口地去了，她猜想自己很可能是做为斗争对象被叫来的，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为她们安排住处，准备菜饭，但韞颖的心里七上八下，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她表面平静，却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难道刚刚开始的平民生活也要成为一种奢望吗？果然，轰轰烈烈的批斗会，经过几天的准备，终于开始了，批斗大会上，在人山人海的震天口号声中，每日提心吊胆的金韞颖反到平静了许多。大会主席要她讲述自己以前的经历，她便本着不说谎的本性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从紫禁城讲到天津、日本和东北的生活……，她尽可能讲得详细而具体，也就自己所能认识到的觉悟对自己进行了批判。在讲述的过程中，她发现会场逐渐地安静了下来，没有了喧闹和嘈杂，人们也不像当初那样磨拳擦掌，情绪激昂了。当她讲完，等待别人批判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质问，也没有人反驳她。会场一片沉默，大会也在沉默中结束了。

经过了几天的焦虑和不安，此时的韞颖真是惊喜交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的坦诚会使众人在平静中慢慢离去，她对未来的生活增添了一分信心。会一结束，农会主席便留韞颖吃了一顿饭，虽然还是没有让韞颖一家回通化的意思，但韞颖终归放下了提着的心，半个月后，她们一家重又回到了通化，接着过她艰苦却又平凡的生活。

生活的磨练使韞颖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三人格，变成一个沿街叫卖香烟的粗壮女人。这其中的酸甜苦辣除了自己又有谁知呢？丈夫无下落，小儿子宗光在外兜售香烟时偏偏又被一架冰床撞倒在地，腰骨受了重伤，无钱看医生也无钱买足够的营养品，宗光的病就此拖了下来，年复一年，儿子的腰骨伤转成了骨结核，卧床不起。韞颖受到如此打击，心如刀绞，但每日还得和平时一样上街买烟以支撑全家的生活。

正在此时，有一个姓孙的男人出现在韞颖身边，他自称是伪满政府孙大臣的儿子，对韞颖一家深表同情，时常送大米给韞颖及孩子。韞颖过意不去，劝他不要再送大米，如有可能，给她们一家几口一点粗食，她倒是愿意接受。孙某却说，不要客气，他还要带韞颖去沈阳找她的丈夫润麒，只是不能带孩子去，韞颖大为惊奇，她对孙某说她不能离开孩子，况且一人与他出去实不方便，即使润麒身在沈阳狱中，也不一定不会被允许见家属。两人争来争去，最后不欢而散。万没想到事情过去

不久，孙某的面目便被识破，原来他是国民党潜藏下来的特务，如果韞颖那时稍有犹豫，真不知会落入怎样的圈套，回想起来，她且惧且喜。心中凛然。

1949年，北京解放了。四年通化的流离生活终于结束了，她被政府告之迁回北京。韞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几年艰苦生活的磨炼，已使她对生活有了一些勇气和感悟，现在孤独的生活即将结束，她又可以回到北京和亲人团聚，终于可以看见父亲、叔叔、兄弟姐妹了。

旧地重游，亲人相见已是两鬓斑白。每个人都有相见不相识的感觉。拉扯着三个孩子的韞颖，同婆母住在一起，像往日一样辛勤地操劳着，婆母年老体衰，经济上也不充裕，她不仅要照顾卧床不起的孩子，又承担起照顾婆母生活起居的重负。

1951年，韞颖的父亲载沣去世，韞颖分得了一点遗产，靠几间旧房的租金勉强度日，从那时起，她开始参加街道工作，由于她识文断字，大家便推举她当了居民组长，治保主任。当她给大家读报，看到大家投来信任的目光时，她感到非常的充实，金韞颖的觉悟提高了，思想进步了。她说：“我着手工作时，止于随着大众，屡进屡退，并不知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意义，对于群众，不晓得从何处接触，更是缺乏联系。1952年，我的思想开始有了些转变，我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和任务的重大，我并认识到党和毛主席对老百姓的深切关怀，国家大事也来和老百姓商量。在旧社会里，政府抱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一切政事，都唯恐老百姓知道：我们妇女，更加一层被人歧视，不用说国家大事，即在家庭里面也没什么地位。若就我们满洲特权封建家庭来说，女孩子更什么都谈不上。于今真是人民作主当家了，男女也平权了，少数民族，都随之而翻身了，我虽十年转徙，未老先衰，深自庆幸，终得参入追求幸福的行列中了。”

一次一个早年和韞颖很要好的女伴来北京看她，见她生活如此窘困，很为她惋惜。韞颖却表示：今日所苦，是工作做得不好，决不是房子住的欠佳。依我看来，我睡在北兵马司的腌脏窝巢中比摄政王府里的千金绣阁来得香甜，我在街上仆仆奔驰，比听王府老妈子娓娓讲述鬼怪故事来得有味，我无颓废之思，一息尚存，此老不容稍懈。

这就是金韞颖在自述里对毛泽东讲述的自己的曲折经历。金韞颖由一个奢侈浮华的三格格，在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变迁与磨难中，终于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斗转星移，毛泽东感慨赞御妹

金韞颖的自述叙说的是怎样不同凡响的一段经历！从御妹到平民，其中的艰辛远非文字所能尽说。章士钊呈送金韞颖的自述，说是“略公作太平广记观”，实际上，毛泽东的感慨又何止于此。

1913年，正当满清皇室上下为皇族新添了一个三格格而额手称庆的时候，毛泽东，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正在千里之外的湘江之畔苦苦求学，农家孩子是无法想像皇室的奢华的，朝廷的没落也是迟迟才被那边的农民知道。然而，历史的潮流奔腾向前，大浪淘沙，没落了皇帝、没落了改良派梁启超、康有为，却把中国共产党人推上了峰顶浪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提笔在金韞颖的自述后写道：“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他批示送周恩来阅，考虑是否酌予处理。

在金韞颖之后，毛泽东又和末代皇族人员多有接触。1962年，溥仪出狱后，毛泽东在丰泽园设家宴宴请他。他对陪同的章士钊、程潜、仇鳌说到这位“宣统皇帝”：“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席间他又指着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份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由章士钊呈送毛泽东的金韞颖的材料，也许是毛泽东接触满清末代皇室人员最早的一次。毛泽东批文后不久，金韞颖就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1956年，经毛泽东批准，金韞颖还和七叔载涛等人到战犯管理所去看望溥仪。

1961年旧历除夕，周恩来在中南海也进行了一次家宴。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准确地称呼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溥仪、载涛、溥杰、溥任、韞和、韞颖、韞嫔、韞馨、韞娱、韞欢，席间，周总理询问起韞颖那个有病的孩子的身体情况，韞颖说：“孩子到北京后，睡了四年石膏床，最近戴上了正骨架，已经可以站立，以后还是可以上学的。”周总理对她提起：“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一事，当时是毛主席交给我，由我交给下边办的。”韞颖听说心中不胜感激，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她的哥哥溥仪在旁说：“谁能料到，这个娇慵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原来，溥仪刚出狱时去看她，竟见韞颖在区政协办起了京剧组，唱起《凤还巢》《四郎探母》等传统剧目，已经十分在行。这是他难以想象的，却是他能够理解的。

毛泽东对金韞颖和溥仪兄妹二人的改造是满意的。他说过，从其中可以见得，人是可以改变的。



“像她这样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坎坷曲折离奇的身世的人，在中国妇女界是少有的，在中国文艺界更是少有的。”

——诗人许幸之在悼念关露座谈会上的发言

**她在冤案彻底平反后悄然弃世，她死得寂寞凄凉。她的死引起了社会和文坛的震动**

1982年12月5日，一个寒风凛冽、大地冰封的日子。

北京城内一条普通的小街上，一幢陈旧的机关宿舍的一间只有10平米的小屋里，居住着一位疾病缠身、孤独寂寞的老妇人。她满头灰白头发，一脸憔悴疲惫不堪神态，仿佛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已经耗尽了体力，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这天是星期日，请来照应她的保姆按例未来上班，一个经常来帮她整理文稿的朋友也回去忙自己的家务了。当夕阳西下临近黄昏时分，她目光呆滞无望地凝视了一下周围的一切，然后慢慢地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小的药瓶，拧开瓶盖，朝手心里倒出了其中所有的白色小药片，然后果决地放入口中，顺手端起半杯温水喝了一大口，猛地将药片全部吞咽下去。接着，她便平静地在自己那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躺下，盖上薄被，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去。她从此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位在寂寞和凄楚中自杀身亡的老妇人名叫关露，死时年75岁。她住的这幢房子是聚集着许多文化精英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宿舍。她的党的关系和行政编制都在作协，但作协机关的大多数人对于她的情况却知之甚少。只听说她曾经是一位左翼诗人，后来又曾经是活跃于沦陷区文化界的女作家。而对于她的具体情况则并不清楚。关于她的传

# 女诗人关露 的苦难人生

——一个三十年代的  
左翼作家的遭遇

●尹 骐

闻虽然不少，但又总是被蒙上了层层迷雾，带有许多神秘色彩。因为她的一生经历及其遭遇确实是极为特殊的。

令人困惑而又喟叹的是，就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即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专门为她发了一个文件：《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明确指出：“关露同志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1939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1942年春由组织派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公安部1957年2月《对关露的审查结果与处理意见的报告》；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什么她在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又会采取如此轻生自弃的行动呢？

关露生前可能没有想到，她的死引起了社会和文坛的一次不小的震动，和她在生前备受冷落、倍感寂寞和凄凉的境况形成了强烈反差。文化部和作协不仅为她举行了庄重的悼念仪式，而且特别为她召开了一个规模不小、规格不低、有数十位名流参加的座谈会。一些文化界的领导和资深的老战士都作了积极热情的发言。

夏衍说：“关露服从组织决定，为了革命的需要，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为革命立了功；她是一位值得尊敬和纪念的好同志。”

王炳南说：“她由于党的工作需要，深入敌营。但外界不了解她的真实情况。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她是一个忠诚的战士，为党作了许多工作。”

杨沫说：“她为人朴实，性格直爽，没有心眼儿。她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她自己从来不说。她把一生贡献给了党，蒙受这么多委屈，对党没有一点怨言。”

丁玲说：“她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有点傻，总是牺牲自己。她的心灵负了伤，孑然一身，没有亲人，她是很寂寞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姜椿芳说：“她一生不幸，受尽苦难，最后在她的枕边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可见她晚景的孤独和凄凉。”

周扬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但直到她生命结束，方被人提起，才受到表扬。这也是一个教训。”

关露生前的好友之一许幸之的书面发言具有总结性：“关露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女诗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党员，坚强勇敢的好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降伏敌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虽身败名裂而在所不计，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像她这样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坎坷曲折离奇的身世的人，在中国妇女界是少有的，在中国文艺界更是少有的。”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梅益、蒋锡金、严辰等又在几家影响很大的报刊上发表了深切怀念和热情讴歌关露生平业绩的诗文，读了也令人感动。

**她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她放弃自己的文学志趣，转入隐蔽战线去扮演一个“难堪”的角色**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8岁那年，她父亲不幸逝

世。刚过而立之年的母亲从此便独立谋生，依靠做小学教员的微薄收入抚育幼小的关露和比关露小两岁的妹妹。关露15岁那年，她的母亲又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从此关露和她的妹妹便完全成了孤儿。

依靠年迈的外婆和境况并不很好的二姨的照顾，关露努力上进，用功读书，几经曲折，终于在1928年考取了中央大学。入学的头二年，关露念的是文学系，系统地学习了文学知识和理论，阅读了大量名著，奠定了厚实的文学功底。后来受宗白华先生影响，又转到哲学系去学哲学和美学。在此期间，她经同学钟潜九的引介，结识了当时已在南京文坛初露头角的张天翼、欧阳山以及途径南京滞留的胡风等人。她同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自己也在这时开始了创作实践，写了一些短诗和短篇小说。她还被邀参加由欧阳山主编的文学刊物《幼稚周刊》的编辑工作，由此步入了文学圈内。

1931年夏，关露离开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到上海去闯世界。她一面担任家庭教师自谋生计，一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久，钟潜九、张天翼、欧阳山等也相继到了上海，参加左翼文学运动。钟潜九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正秘密参与工人运动。在钟的鼓动引导下，关露也投入了工人运动，深入工厂，访问棚户区，办夜校，和工人们一起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不久，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她的积极热情的表现引起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关注。1932年春，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党的事业，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去战斗，无私无畏地贡献出了她的一切。

题图照片：关露（右立者）与友人



### ■青年时代的关露

此后，关露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工人群众的斗争，一面加入左翼文艺运动行列，在文化战线上为革命做贡献。她先后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过任钧、蒲风等组织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参与编辑《新诗歌》的刊物。在此期间，她的诗歌创作成绩引人注目，先后发表了《马达响了》《绸厂女工》《悲剧之夜》《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等作品。她为影片《十字街头》写作的主题歌词《春天里》更是一首格调清新、充满激情、洋溢着乐观奋进精神的优秀之作，经音乐家贺绿汀谱曲后被广泛流传，脍炙人口。她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关露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和执著的追求，并已被证明有着多方面的才华。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她是可以在这方面获得更多更大成就的。

但是，做为一个已经决心献身于党的事业的战士，后来却不得放弃自己对文学的志趣，走上了党为她安排的另一条充满艰险、曲折的

道路。

1937年“8·13”事变后，上海的进步文化人纷纷撤离上海，或向大后方转移，或奔赴抗战前线工作。关露则根据党的安排留了下来。起初，她和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撤离的进步文化人士继续在“孤岛”上坚持进步文化活动，和蒋锡金、许幸之等组织“诗歌座谈会”，编《诗人丝刊》，创作为抗战服务的作品。但不久，党组织就决定调她去担负一项特殊的任务，要她在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上去扮演一个在一切公开场合使她“难堪”、因而也是很难演好的角色。

1939年秋后的一天，上海地下党负责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秘密约见关露。他给关露看了一份从大后方打来的由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署名的密电，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小廖即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南方局要关露去找小廖干什么，电报没有任何提示，按地下党工作规则，关露不能多问。她只有服从。

数天后，关露乘轮船赴香港。到港后，她先在一家旅馆住下，然后就按刘少文提供的地址去找廖承志。不巧廖当日外出不在住所，她便留下短信，告知她已到港和自己的住处。第二天下午，就有两位风度翩翩的男子到旅馆来找她。刚一坐下，其中一位稍胖的首先对关露说：“我就是廖承志，请你到香港来，是要你接受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具体工作和应当注意的问题（他指了一下同行的另一位戴眼镜的男子），由这位潘汉年同志给你布置和交代。他是从延安来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关露过去和廖承志、潘汉年没有见过面，所以陌生。但潘汉年对关露虽

是第一次见面，却并不陌生。作为情报部门负责人，潘汉年对关露已有充分了解。把她调来担负特殊的情报工作，正是他和中共南方局联系磋商的结果。具体原因是：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叛变，再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目的李士群，因不想在汉奸这条危险的路上走入绝境，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联系，做一点于抗日有利的东西，为自己留一点退路；而中共情报机关在获悉李士群的这一动向后，也决定从抗战大局出发，因势利导，对李士群进行争取策反工作。李士群希望中共方面能派曾经经营救过、有恩于他的中共党员胡绣凤担任和他的联络任务。只因胡绣凤当时远在大后方且另有任务，中共情报机关便决定调胡绣凤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过来往的关露代替胡绣凤去担任和李的联络工作。中共南方局正是根据情报部的建议才电令关露赴港接受任务的。潘汉年知道关露已是入党多年经过锻炼的干部，便开门见山地对她说：

“组织上要派你到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联络工作。你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和见到许多情况，他也可能主动向你透露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

接着，潘汉年便简要地向关露介绍了李士群的一些情况和所以要派她去担负此项任务的原因。这才使关露心里有了点底。她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没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便恳请组织上对她今后的工作再作些指示。

潘汉年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稍顷，潘又补充说：“以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用辩护，一



辩护就糟了。”

关露沉重地点头：“我不辩护就是了。”

潘汉年最后交代说：“你在香港稍事休息就尽快回上海去。以后，我会派人专门和你联系的。”

一个星期后，关露就回到了上海。对于即将担负的工作，她既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又有一些忐忑不安。这不单是因为她没有做情报工作的经验，深入敌巢稍有不慎便会遭致严重后果，还因为她在心理上今后将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同汉奸特务头子频繁交往，必将遭受世人的冷眼。同原先进步文化界的朋友中断联系，退出他们共同组织起来的的活动，更使她难堪。

她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地下党的吴成方同志就根据上级指示和关露接上关系，要她尽快到李士群那里去开展工作。

关露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她克服各种困难，坚定沉着，勇敢机智，很好地完成了既定任务。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妇的频繁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敌伪方面的情况。李士群既知道关露和他往来的使命，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有时就故意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信息，通过关露向中共表示某种求得谅解的姿态。从关露这条线传递出来的情报资料，对于潘汉年领导的敌后情报机构来说当然都是很有用的。关露的工作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

### 她牺牲自己“左翼作家”的名誉，忍辱负重去扮演“文化汉奸”的角色

1942年春的一天，吴成方代表组织通知关露：她以后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进行联络搜集情报了。李士群那边组织上已另外安排了人。

关露听说自己以后可以不必再去和李士群周旋了，顿感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卸去了一块重压的石头。她当即向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成方说，这个愿望是好的。但上海现在仍需要她留下来坚持。情报工作也是直接为抗战服务的。组织上还将派她去担负新的可能是更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安下心来。

果然在几天之后，吴成方就又通知关露：组织上已决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释说，这个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刊名叫《女声》。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她曾受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们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通过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设法找到日共党员，再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一听要她去担任这样的新工作，心里不禁又是一惊。这比和李士群往来应酬是更加公开化地为日本人做事了。实际上就是要她公开去参加汉奸文化活动。她当然不想去担当文化汉奸这人人唾弃的恶名。但她又不能反对组织的决定，便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吴成方看她似乎心存疑虑，就又补充解释说：

“我们要利用敌人提供的条件巧妙地去同敌人作斗争。穿上敌人的衣服去干革命工作。你在那里要认真工作，尽力当好编辑，取得人家的信任，不能暴露自己，要耐心坚持，守住阵地，等待机会。”

关露觉得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当此非常的战争年代，她不能因顾惜自己的声誉而拒绝去承担革命重任。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工作需要应是无条件的。她想，只要党组织理解

自己、信任自己，即使受些委屈也就在所不计了。

《女声》为综合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照例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三名中国编辑分别负责编各自的栏目。关露担任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自己的职务：既不让公开为虎作伥的汉奸言论出现，又不能触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只有多编一些自己并无兴趣的风花雪月之类的文章。做这样违反自己心愿的文字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苦事。

关露在这里曾经努力通过佐藤和通过组稿活动等去接近日本的左派作者。不幸在两次刚刚获得些许进展时，她所接近的两位日本左派人士都先后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之中一个被捕，一个被送回日本去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关露除了通过杂志社和佐藤本人侧面了解到一些一般性的日本方面的情报资料外，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日共党员，自然也就未能得到更重要的收获。她有些着急，但也只能遵照吴成方的指示，继续坚守阵地，耐心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出现了。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所谓第二届“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是日本当局拉拢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领的殖民地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日本本土以外的参加者大都是由日方人士推荐才被邀请的。在会议筹备期间，关露曾同吴成方谈过这件事，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是会看到和听到许多有用情况的。因此，当佐藤俊子要派关露代表《女声》去参加大会时，关露便答应了。虽然这是又一次在世人面前公开亮出了汉奸文人的身份，但为了革命的需要，她只能忍辱负重让世人责骂。

在日本期间,除参加大会外,关露利用佐藤或佐藤朋友介绍的线索,访问了若干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以及普通的日本国民。又到东京以外的一些地方去实地考察了一番,处处留心了解日本社会和各方面真实情况。回国之前,她就以《海岛风光》这一不会被人注意的题目,用日记的形式记述了她在日本所耳闻目睹的一切。回国后,她将这些具有情报价值的文字全部交给了吴成方,从而使这些材料在对日抗战的宣传和对日本实际问题的研究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遗憾的是,关露在《女声》工作的约三年时间里,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日本时,都没有能够和真正的日共党员直接联系上。因此,她的工作也就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当然,这是无可奈何的。正如吴成方事先分析的那样,得到怎样的收获,不光取决于我们主观上的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好的机会。

关露始终没有放弃离开上海敌伪旋涡转移到延安和革命根据地去的打算。1943年秋,她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凤写信,用暗语表示她想去根据地的愿望。信上说:“非常想念母亲,舅舅让我们去看望母亲,不知母亲意见如何?”胡绣凤当即将姐姐的心愿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邓颖超汇报。不久,邓就让人转告胡绣凤,说延安已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上海仍要关露留在那里工作。胡绣凤只好给姐姐关露回信说:“母亲不要你来,希望你留在上海照顾弟妹。”关露想直接通过上层关系调离上海,结果上面仍是尊重了上海地下党的意见。关露去根据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她被人误解,又深感委屈,更在感情生活上受到了沉重的一击**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了,紧接着,惩办汉奸问题很快提上了历史的日程。从1939年秋后起,关露有近七年时间和敌伪汉奸的圈子有过密切联系。她和李士群的频繁往来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她在日本官办的刊物任职以及去日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又都是曾经见诸报刊的。“汉奸文人”或“文化汉奸”的帽子客观上已经无情地扣到了她的头上。一个曾经是有点名气的左翼作家,一个至今仍是单身一人生活的弱女子,面对这顶耻辱的政治帽子,关露在心理上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更叫人担心的是,逮捕和惩办汉奸的权柄是掌握在国民党接收大员手中。倘若他们得知关露的真实政治身份,就更会借题做文章而对她毫不手软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关露找到长期领导她的吴成方同志,向他提出让她迅速转移到解放区去的要求。但吴竟没有同意,认为她并不怎么引人注目,国民党政府是不会抓她的。

幸亏当时还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对关露表示了很大关切。他们让先期赶回上海的胡绣凤夫妇转告关露,要她注意安全,防止国民党以汉奸名义陷害她,要她最好能转移到新四军去。关露在战前就结识的好友、当时正在重庆的王炳南同志也委托先期赶到上海去的夏衍,请他设法安排关露转移到解放区去。他认为一般的群众不了解关露的真面目,小报上又曾经有攻击她的文章,这对她很不利。不久,果然有人从国民党那里了解到在他们要抓的汉奸名单里就有关露在内。幸而胡绣凤夫妇和夏衍及时到了上海,由夏衍具体安排,关露才被迅速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从而避免了国民党对她的迫害。

关露原以为,只要到了解放区,

到了自己的“家里”,一切就都会成为过去,她在精神上的压力就会消失。然而她想得也太简单了。她没有料到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之后,会使她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误解、怀疑、委屈,并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包括某些令她困惑、痛苦和造成终生遗憾的代价。

她刚到新四军根据地时,新四军里有一些原是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上海时听过关露的讲演,所以认识她。后来又都知道她当了“汉奸”。当他们在根据地淮阳街上和她不期相遇时,因不了解真相便当众指责和辱骂她的“汉奸”行为。在这样的场合她无法辩解。脆弱的神经因此而受到很大刺激,接着便大病一场,医生说她已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在根据地,关露见到了分别已久当时正在《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副刊的蒋锡金同志。他们是在一个招待所的客厅里偶然碰见的。乍一相见,诗人气质太浓的关露竟激动得痛哭起来。这哭声实际上宣泄着她多年来违心地和左联老战友们的隔绝以及自己蒙受了“汉奸”恶名的委屈情绪。蒋锡金着实安慰了她一番。时隔不久,关露便又去拜访蒋锡金,并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交给他,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蒋锡金不敢做主,便去请示社长范长江。

范长江慎重地对蒋锡金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我们这张报纸是面对上海南京一带的。那里的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并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

蒋锡金问道：“关露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

范长江说：“关露是一个好同志。她牺牲自己，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现在精神上可能受些刺激，有点不大正常，正在休养。你要好好安慰她，不要使她再受刺激。”

蒋锡金似乎不好对关露直说，怕她再受什么刺激。偏偏关露仍是诗人浪漫气十足，不断来找蒋锡金，又不断带来一些新作要蒋锡金发表。蒋锡金无奈，只好照实说道：“我已经请示过组织，你要发表作品就得换一个名字。”关露一听这个条件立刻就生气了。蒋锡金忘记了范长江的告诫，也激动地教训关露说：“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又一次大哭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最使关露感到痛苦的是她在个人感情生活中所遇到的一次挫折。她是一个浪漫气息颇浓的女性，对爱情与婚姻一向抱有理想主义色彩，向往着崇高，执着地追求完美。她因此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了代价。还在中央大学念书时，她初恋的男友就曾经给她以热烈的爱，她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了他。他曾一再动员她和他一起到法国去留学，去构筑爱的小巢。但当她发现在他的爱里已经掺杂着某些自私和虚构的成份时，便断然拒绝了他的追求。三十年代她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热潮中，为激情所鼓舞曾经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左翼社会科学家结合。但不久他们便发现彼此在性格与兴趣方面有太多的差异而友好地分手。此后，她就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大部分时间又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个人的感情生活就一拖十多年过去了。但是，两次婚恋的失败并没有使关露放弃对理想爱情的追

求。就在她这次转移到解放区之后不久，一次难得的机遇使她那久已沉寂了的爱情之火再次迅猛地燃烧起来。

还在抗战爆发前，关露在上海就和王炳南相识相知。那时王和他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住在一所独立的小楼房内。关露是他们夫妇相处很好的房客。抗战开始后，王炳南夫妇先后离开上海，房子就一直交给关露代管。整个抗战时期，他们也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抗战胜利后，王炳南夫妇因复杂的政治原因不得不分手。1946年春天，王炳南随着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关露联系上了。当时正值国共谈判军事调解期间，南京和苏北解放区之间联系密切也很方便，不断有军调处的飞机往来。王炳南和关露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深谈，这两位现在都在过单身生活的老朋友便互相萌发爱意，情感升腾，进入了两情相许境界。王炳南决定到苏北解放区去一趟，进一步发展他和关露业已成熟的感情。关露更是翘首以待。不料在动身之前，王炳南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邓颖超汇报了自己和关露的感情以及决定要去看她的计划。周、邓先是同意了，但在第二天王炳南即将登上飞机前一刻，邓颖超又赶到机场将他留了下来。邓颖超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对你的工作不利。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

邓颖超当时是中共代表团党组书记，又是语重心长从大局出发。王炳南当时是代表团外事工作负责

人，要经常出头露面代表党组织接触方方面面。为了党的工作利益，他只得忍痛割爱。可惜王炳南对关露性格上的弱点和一片痴情以及当时她在精神上深受压抑的情况缺乏更深的理解与关注，他只把她看作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因此在给她写信时过于冷静地将他们不能结合的原因直接告诉了她。

原本诗人气质很浓，在感情生活中已经屡受创伤，精神上正处于苦闷状态的关露，在接到王炳南的切断情丝的信件后，她所承受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此后，她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掀起过爱的波澜。真所谓心如枯井，苦度年华，直到走完全部人生之路。

**她不断被审查被隔离，两度入狱备受摧残。她的身体终于垮了。冤案平反，她再无牵挂，遂向死神主动走去**

关露受党派遣深入敌伪巢穴与敌人周旋的七年特殊经历，自从她转移到解放区后，就像是一层阴影，时时包围和笼罩着她，挤压和窒息着她的精神空间，危及着她的政治生命。

关露到达解放区不久，就赶上了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实际是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每个人的历史，特别是从白区来的每个人的经历，几乎都要受到审查。关露那七年间的特殊经历，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审查对象。于是在整风进行到某一攻坚阶段时，她不仅受到严厉审查，而且被拘留起来了。虽然审查者的革命动机无可非议，但对于神经本已脆弱且已屡受刺激的关露来说，其委屈与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幸而当时关露的妹妹胡绣凤积极为姐姐奔波，找到地下党的吴成方和吴的上级张唯一、潘汉年，写了

书面证明材料,最后经陈毅的批准,才恢复了关露的自由。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关露一直随苏北建设大学转移,从苏北到山东,又到大连。在此期间,她既当文学教员,又写一些作品。只是发表时还是用的化名。

1949年,关露到了北京。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1951年,她写的小说《苹果园》被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陈波儿看中,要她改编电影,她就被调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

不幸的是,正当关露在精神上的创伤渐渐得到愈合,文学创作也有了新的起点与收获时,历史又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而每一次的风暴又都将她卷入了漩涡,并使她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击。

1955年春寒料峭之际,反对胡风集团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仅仅因为关露在南京念书和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时和胡风有过一些接触,在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他们任何形式的联系都不曾有过,但她竟也被列入了另册,而且对她实行了隔离审查。也就是将她监禁起来,使她失去自由。后来审查终于有了结果:她实在不够“胡风分子”的格,于是宣布撤销审查。

风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风分子”的嫌疑刚刚排除,一项更大更严重的政治嫌疑又降临到了关露的头上。1955年6月的一天,两名公安干部直接到关露所在单位的办公室,向她出示了“逮捕证”之后,立即将她带走。

关露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的一个单人牢房里。第一次审讯她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

审讯员问:“你说从1939年起你到敌伪那里去工作后究竟有些什么问题?”

关露答:“那是党组织派我去做工作的。我没有问题。潘汉年同志可以证明。”

审讯员:“潘汉年就有严重问题,你知道吗?”

关露当然不知道潘汉年有问题。她根本没有想到潘汉年作为当年敌占区情报工作的领导干部,如今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务副市长,会有什么問題。她不知道潘汉年已在两个月前被秘密逮捕。她正是潘汉年一案受株连的许许多多的干部之一。

关露在听说潘汉年有严重问题时着实吃惊不小。她简直不敢相信。但她还是平静回答说:“我不知道潘汉年有问题。如果他真是像你们说的有严重问题,我也是没有问题的。”

审讯员:“这不能由你说。我们要对你审查。你必须将你那一段历史详细写出来,老老实实地向党作出交代,党才能相信你。”

从此,关露就被迫在那间单人牢房里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按审查人员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写,越写心里越不是滋味。当年在敌伪的巢穴中她出生入死、孤军奋战的艰难处境,历历在目。她相信自己没有做过损害党和革命的事。她苦闷、烦恼,她的精神终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于是她又一次患了精神分裂症,常常一个人呆呆地枯坐在地下,有袜子也不知道穿,看守送来饭菜时,她用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后来她被送进了医院,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正常的思维能力。出院后,当然还得回到那间单人牢房之内苦度岁月。

直到1957年3月末的一天,关露被叫到监狱办公室。管理人员对她宣布:“对你的审查已经结束,现在你可以走了。”监管人员说得这样

轻描淡写,就仿佛蹲了两年的监狱如同住了两天招待所似的。

关露回到文化部电影局后,并没有分配她的具体工作,就让她参加当时文艺界正在开展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运动。关露对陈企霞不大了解,对丁玲可是印象极深的。三十年代在上海,她对丁玲的作品以及丁玲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勇敢战斗精神,不但有所了解而且十分赞赏。后来听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又听说丁玲经过曲折斗争又终于逃脱敌人的魔掌奔赴陕北,她对丁玲更是钦佩。可如今丁玲却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这就如同两年前要她相信潘汉年是反革命一样,使她难以置信。更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在当时揭发声讨丁玲的大字报热潮中,有人点了她关露的名字,说她曾经和丁玲似乎有过什么可疑的联系。群众运动的烈火一下子也烧到了她的身上。虽然她不过在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过一个短暂时期,后来一个在陕北,一个在上海,从未有过联系。解放后在北京,她们不在一个单位,不过偶尔在公众场合见过几面而已。然而政治运动的规则是:有人向你提出质问,你就必须说说清楚。丁玲是名声很大的文坛风云人物,你和丁玲即使没有组织联系,也未必没有受过她的“反党”思想影响。于是关露又得写材料,交代她和丁玲曾经有过的联系。一次不行再写一次……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她和丁玲反党集团沾不上边。

关露的健康确实不是很好。但她没有料到,就在她深受政治风暴袭击,身心都受到严重损害时,组织上却做出了一个使她感到心灰意冷的决定。1958年初,电影局的领导找她谈话说:

“你调来电影局以后,一直没有写出电影剧本。群众有些意见。现在

你的身体也不大好。组织上决定让你退休休养。”

关露感到极大的委屈。没有能写出电影剧本，这能怨她么？身体不好又是怎样造成的呢？在电影局工作期间，三次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坐牢时间就有两年。现在她还不足50岁，难道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但这既是组织决定，她也就无力抗争。只有服从。她永远都只能服从。她办了退职手续，从此成了革命队伍的“多余人”。

60年代初，政治环境一度稍稍宽松了一些。关露希望自己能够再继续为党工作，就向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归队”。中宣部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可惜她在这新工作岗位上还没有来得及做多少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便又掀起。

1967年盛夏的一天，关露的厄运与灾难再度降临。被称作“中央三办”的人又拿着逮捕证将她带走，立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和12年前的“功德林”监狱生活相比，这一次关露吃足了苦头。

关露被关进秦城的最初半年时间内，她所受的虐待在新中国的监狱史上也是应当记下一笔的。她被关在单人牢房里，两个月才允许放风一次，她只要稍不留神，就会遭到监管人员的辱骂与殴打。在牢房里洗脚时不小心在地上洒了一些水，她就要挨打；未按规定整理好睡铺，她要被打；审讯时稍一不“老实”，更遭毒打；用巴掌、用拳头，还用大串的钥匙打她。有一次放风时，她因鞋子不合脚摔在地上，一个监管员过来竟用皮鞋踩她的手，她痛得大声喊叫起来，那监管员就更使劲踩她。这种种虐待“犯人”的情况，后来听说被人“通天”了，监狱才有所收敛。

这一次，关露在监狱整整蹲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狱。自然，那条奸奸特嫌的政治尾巴仍然被保留着。八年的牢狱之苦，使她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出狱后，她没有返回原工作单位，而是一度被送进了养老院。后来又回到了香山农村的那座小屋去居住。

雨过天晴。“四人帮”被粉碎后，社会政治的大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变。关露的一颗原已冰冷甚至死寂了多时的心又复活了。她一面继续养病，一面积极向党中央写申诉材料，要求对她的特殊经历进行复查，还她以历史的公正面目。接着，她又产生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创作激情，她要利用历史为她提供的新的机遇，重新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以实绩来回答那些把她整得精神分裂、百病缠身，竟然责备她没有能够写出作品的人们。她要重写长篇小说《刘丽姍》，要修改中篇小说《新旧时代》，还准备撰写文学回忆录等等。

很可惜，历史为她提供的新机遇，她却没能利用。1980年5月的一天傍晚，当她劳累了一天后，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经送医院抢救，确诊为脑血栓症。虽然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但却再也未能恢复正常。不仅记忆力受到严重损害，往日的许多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或根本记不起来了，而且手也不听使唤，连拿笔写字都成了问题。

此后，为了方便治病，关露不得不离开宁静的香山农村，回到城内机关宿舍来往，组织上勉为其难才给她安排了一间仅10平米的小屋。这里面还得放下三张单人床，以便给请来的保姆和一拉帮助她整理文稿的朋友临时居住。生活条件之差实不能想象。

1982年3月23日。关露望眼欲穿的为她平反冤案的文件终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无论这一文件来的是多么迟，也无论这一纸文件对于改善她的生活处境并未起到多少作用，但就关露个人的心情感受来说，她已经心满意足了。历史到底归还了她的清白和公正。真所谓死也能瞑目了。如果从1946年算起，她不断地被审查、受冲击、遭迫害，整整36年！

关露的脑血栓病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并未取得明显的疗效。生理的病苦一直折磨着她，精神上的孤苦更使她难以承受。一个长年累月躺在病床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依托和抚慰。她渐渐地不只是感到痛苦而且感到绝望了：想到自己的病大概再难治愈；她的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心愿和计划也将化为泡影。如果说在以前多次受打击遭迫害时，她虽有痛苦，但更有委屈和不平，还有一种坚定自信，她相信并期待着总有一天会使她的冤案能够澄清，她的冤情能大白于世。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她，使她宁愿受种种折磨而不愿轻生弃世。但现在，党中央已亲自为她平反恢复名誉。她就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牵挂而放心不下的心事了。她知道，冤案可以平反，但近40年来她所受的折磨和损害是再也无法补偿的。身体被整垮了，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一个健康无望的病人，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秉性难移的诗人气质使她终于萌发了轻生弃世的念头。与其躺在这简陋小屋的病床上等待死神的降临，不如自己主动迎接死神的恩赐。从此既不用再累及别人的牵挂与照应，又可以解脱自己生理的病痛和精神的伤痛与悲苦。一了百了。于是便有了本文开篇叙述的那凄凉的一幕。

# 今何在？

# 民初五大总统后裔

● 柴德森 鲍国之

袁世凯、黎元洪、马国璋、徐世昌、曹錕等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期先后任过大总统。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但他们的后裔们的踪迹在哪里，生活状况仍为人们所关注。有人揣测：他们的后裔多凭借祖上的财产，是不学无术？还多是纨绔子弟？也有人分析，三、四十年代，这些人的家丁兴旺，只是到六、七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始衰败。还有人设想，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后裔凭借着诸多海外关系重新发达起来。带着诸多疑问，我们到五大总统久居天津的后裔们家中走访，这才有了部分的了解。

## 袁世凯家族

袁世凯（1859~1916）

河南项城人，1898年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任内阁总理大臣，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建立北洋军阀政权。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省发动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而死。

袁世凯有9位夫人，17个儿子，15个女儿。这里采写的是居住于天津的两个儿子家族的近况。六子袁心武一支——袁心武名克桓，1956年逝世。曾任启新洋灰公司协理、总理、耀华玻璃公司董事、总董。创办江南水泥厂于

南京担任董事长，还兼任过开滦煤矿的常务董事。其夫人陈征是江苏巡抚陈启泰的独生女儿，1973年去美国，1986年回国探亲，1991年6月去世，终年92岁。袁心武、陈征夫妇生5女2男。大女儿袁家英1949年去美国，丈夫李国沅为宗教界知名人士，生长子李立中，1973年随外祖母陈征去美国，现于纽约迈哈顿开珠宝公司，次子李立林，美国现代派画家。三子李立扬，美国著名诗人，1990年来津受到文艺界热情接待。四子李立恩在纽约某广告公司工作。女儿李菲菲为芝加哥华人代表，其丈夫迈克是芝加哥核电站高级工程师。袁心武的二女儿袁家菡独身在美定居。三女儿袁家蕻住纽约已入美籍。四女儿袁家菽，天津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服装街、食品街、旅馆街的设计者。五女儿袁家芯和丈夫柏金和皆为天津一中数学高级教师。柏为民盟天津市委常委，生一子，于天津理工学院无线电系上学。袁心武的长子袁家宸（又名袁复），原天津实验中学高级教师，已退休，现为天津市河西区政协委员。二子彭卫，现已退休，居上海。



▲黎元洪次子黎仲修近影（上图），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之四子袁家楫与女儿袁静合影（下图）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一支——袁克文逝世于1931年，曾长居天津，善书法填词，为其父的得力秘书，又是著名京剧票友，擅长文丑，生前对其父称帝一事与其兄袁克定意见相左，遗著有《寒云日记》等。袁克文有4男2女。长子袁家鼐早已去世，次子袁家彭居华盛顿，原台湾驻美使馆工作，现已退休。三子袁家骠，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美国布洛克海门国家研究所美籍华裔高级物理研究员，夫人吴健雄，世界著名女物理学家，他们被誉为当代的居里夫妇。袁家骠夫妇平均每二、三年回国一次，1992年6月曾来天津讲学。生子袁纬承，继承父业于新墨西哥州从事物理研究，与美籍露茜结婚。袁克文四子袁家楫，现为天津市政协委员，1951年回国，现已退休。生1子1女。儿子袁勇，第四半导体器件厂助理工程师，女儿袁静，现在天津市政协统一祖国办公室工作。袁克文的两个女儿，袁家祉，在津居住无工作；袁家华原在香港经商，现在津居住，有一男一女分别去美国、香港。

在采访袁家芯和柏金和夫妇时，他们说：“我家在海外的很多人，他们都眷恋祖国，常来常往，母亲陈征，家人皆呼五奶奶，90高龄寿诞之日，在国内外的家人皆来团聚，天津市委统战、政协皆为来老太太祝寿，我

家留在国内的皆尽责于本职工作，居于海外的不忘祖国建设大业和统一祖国事业。

## 黎元洪家族

黎元洪（1864—1928）

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后升任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设参政院，被任为院（议）长。袁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他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22年受直系军阀支使复任总统。次年被直系军阀驱走，后死于天津。

在五大总统中，黎元洪的后裔要算较少的。他生有2子2女，两个女儿和长子现已不在人世，唯一健在的后人就是次子黎仲修。

在天津和平区马场道安乐村的一幢洋房内，我们见到了这位年迈的老人，83岁的黎仲修老人是全国政协委员和天津市文史馆员。老人说：“我的哥哥1983年

去世，他的3子1女现都在国外，我有2子2女，但长子“文革”中在新疆当知青时叫人给打死了，长女因病于十几年前去世，我现在和次女与次子一起生活。”老人前些年不慎摔断了股骨，他坐在轮椅上，双手不住地颤抖，但思维敏捷，十分健谈，对往事记忆犹新。谈起黎元洪的一些事时，他说：“父亲是在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的，那时我刚刚记事。张勋复辟时父亲被撵下台，来到天津办起了实业，任中美实业公司董事长。1922年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后，父亲又复任大总统，转年曹锟贿选总统，父亲又回到天津，从此一心干实业。投巨资建立山东枣庄中兴煤矿，任董事长，又在天津的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投有大量资金。当时父亲不让我参与政事，只让我读书，我是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完成学业的。家里有人有意让我出国深造，我不想离开祖国，想办实业施展才干。那是1928年，父亲去世，哥哥和我接了父亲的产业。三十年代我有了小家庭，长子长女和次女就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

谈起自己的家庭，黎仲修老人脸上泛起慈祥的笑容。对于荣华富贵，他似乎看得很淡。他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公私合营后，他基本上靠吃定息生活。不过“文革”中，他的家庭也在劫难逃，老人吃尽了老年丧子之苦。不过黎仲修老人晚年堪称幸福，享受了天伦之乐，次女黎昌履已从天津理工学院讲师的岗位上退休，照顾父亲生活。次子在天津市环保局做秘书工作，儿媳在市府工作。黎仲修晚年又得一孙子为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尽管老人身体不能动，但在女儿和儿子的精心照料下，身上没生一处褥疮。在这个家庭中，已看不出大总统后裔的迹象，它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平民百姓家庭之一。只是黎元洪威武的标准相，只挂在墙壁不起眼的角落。

## 冯国璋家族

冯国璋（1857—1919）

河北省河间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辛亥革命爆发后率领北洋军至湖北镇压革命，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时奉袁命攻下南京，任江苏总督。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冯为直系首领。皖系首领段祺瑞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冯又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对抗皖系，1916年当选副总统，1917年代理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在北京病死。

在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50号，有一座端庄素雅的奥地利式小楼，曾在1917年担任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下野后，就居住在这里。如今，这座小楼的主人是冯国璋的孙子冯海岗。这位76岁的老人膝下有2女3子。长女冯幸耘，现是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河北区海外联谊会副主任，在河北区房管局供职。次女在天津57中当教员。长子冯信，天津河北区五金交电公司经理，中共党员。次子冯达，中共党员，天津石粉厂厂长助理。三子是著名相声演员冯巩。

谈起冯国璋，冯海岗感慨颇多：“祖父出身贫农，小时候家境很惨，大年三十全家只能熬粥度除夕。祖父未成年就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后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从军后当过伙夫。中日甲午之战曾转战东北，因编写兵书而得到袁世凯赏识，民国后在北洋政府充任要职，1917年担任了代理大总统。祖父有严格的家训，就是勤俭持家、个人奋斗。这可能是因为祖父是这样发家的。”

冯国璋生有5子1女。三子冯家遇的家丁兴旺，冯家遇生有13个子女，冯海岗是其三子。采访中，冯海岗将其长子冯信介绍给我们。冯信人高马大，有1·85米的个头，相貌与其弟相声演员冯巩酷似。冯信说话声若洪钟：“自打记事起，我的家庭生活同中国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补丁衣服，再加上父亲曾是国民党员，所以我们做子女的无论是上学还是参加工作，始终都是谨小慎微。我家的亲戚不下一二百人，20%的人都在海外。‘文革’期间的遭遇在大陆的亲属无一幸免。更确切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这个家族的成员们才真正开始轻装生活。我弟弟冯巩也是在这以后努力奋斗而成名的。”

回忆起成才之路，著名相声演员冯巩说：“关键是把自我，把握好今天，我从上初中开始就着迷说相声，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和刘伟去报考中央广播说唱团，但由于我的政审不合格，曾被拒之门外，我当时还说，曾祖父是曾祖父，我是我，但没有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播说唱团才为我敞开大门，但是此前我从未中断对艺术的追求。”

冯巩除表演相声外，多忙于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的拍摄，他的家安在北京，爱妻爱子都在身边，尽管北京与天津仅百公里之距，但冯巩很少有空回津看望父母，然而冯巩在冯氏家族中却是有名的孝子，只要父母身体无恙，无论多忙他也要赶回故里床前尽孝，今年初夏他得知父亲住院的信儿后，星夜从西安的拍摄场地赶了回来，见父亲并无大恙后才放心返回。

冯氏家族后人当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且多是



在建筑领域施展才干，很少有从政者，冯容算是一个例外。她是冯国璋四子的长女，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现任天津市规划局副局长，同时还担任天津市九三学社副主委。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建筑专业高级工程师。冯容现生有一子一女，都是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冯容说：“我们国家现在更需要干实业的人才，经济兴国，实业兴国，只要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多做工作，此生足矣。”

作为家庭或家族观念极强的中国人，无论是冯海岗或是冯容以及冯巩等，都有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这就是冯国璋在祖籍河北省河间的陵墓，“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至今尚未修复。其实，冯国璋后裔们所考虑更多的还是为发展国民经济出力的问题，因为目前散居于美国、加拿大、台湾、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冯家后人，基本上都是经商搞实业的，其中多数人都带有来大陆投资的愿望，但每当听到祖坟已荡然无存的消息后，便迟迟难下投资的决心，似乎在感情上有说不清的难言之隐。据了解，河北省河间县（现已改为河间市）对修复冯国璋陵墓曾有过考虑，但终因财力不及而未能成真。

冯国璋的后裔们牢记勤俭持家、个人奋斗的家训，把握自我，把握今天为国家、小家奋斗不息！

## 徐世昌家族

徐世昌（1855—1939）

天津人，北洋军阀政客，光绪进士，清末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料理大臣等职，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的国务卿，1918年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系军阀赶下台，1939年在天津病死。徐世昌曾被法国巴黎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著述有《东三省政略》、《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工山水松竹画，书法宗苏轼。

徐世昌无子，两个女儿早亡。其二弟徐世光的长子徐绪直过继为徐世昌之子。徐世光为光绪壬午举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命其为濮阳河工督办，袁死后徐世光寓天津，皈依道院，办“道德社”，曾为天津世界红万字会会长。徐绪直早亡，生子徐延东、徐延同，皆已故世。唯徐延东留子徐保慈，现在天津市河北区第三职工中学任教，夫人于廿五塑料厂退休，生两女，一于南开大学毕业，现在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工作；一在外资企业工作。据徐保慈介绍，徐世昌如夫人王雅茹生有两女皆已故世。女婿许大璋现在河南任省政协委员。徐世昌近支显然衰落了。

另一支在天津久居的是徐世昌十弟徐世璋的后人。徐世璋曾任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交通银行副总裁，又曾兼任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饥饿救济会会长，币制局局长，1922年随徐世昌下台而去职，在天津做寓公，后曾任铁路学院名誉校董，天津毓华中学董事，工商学院董事长。东亚毛织公司董事，拥有大量房产，收藏文物字画，尤以集玉著称，是天津市知名人士，1954年逝世，遗嘱将全部古玉、砚、玺印等捐给国家。其后人有女儿徐绪年（天津人民医院退休）；徐绪如（一中心医院退休）；徐绪玲现在天津人民图书馆工作，其丈夫朱文桀现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绪璐现居北京，其丈夫是我国驻曼谷大使。

接受采访的徐延丰已年过花甲，退休在家，原在天津市汉阳道中学工作，夫人在天津财经学院任教，生2子，一在解放汽车贸易公司工作，一在房管局职大教书。徐延丰追述往事：“‘文革’期间，我们这些家族难免不受冲击。有人说徐世光任濮阳河工督办赚了大批的钱，其实祖母在世时说，当年祖父赚钱不多，曾说也就是留给兄弟们喝粥吧。”面对生活几经变迁，他感慨地说：“安安稳稳、老老实实当个老百姓最好，我家这一支和太祖父徐世昌最近，那一代是亲兄弟关系，后代多在教育界，这也许与太祖父曾自称‘文治总统’有些渊源吧！”

## 曹锟家族

曹锟（1862—1938）

天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北洋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吴佩孚同为直系军阀首领。1923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奉系后，曹锟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被囚禁，后直奉两系联合方获释。1938年在天津病死。

五大总统发迹后一个比一个富，曹锟更是富中之富。可是在三四十年代，这个家族就开始没落。曹锟的第二代唯一健在者，曹的侄儿曹士藩说：“唉，巨万积资大都毁于挥霍。”

曹锟系天津人，祖上是平民百姓，他兄弟五人，排行老三。青年时曾当过售布小贩，20岁时投新建陆军当兵，后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深造，1914年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直皖战争后继冯国璋而成为直系首领，1923年通过贿选当上大总统，曹发迹后家族成员多弃

商而仕。其中曹锟四弟曹锐由天津清乡局长官至直隶省长。其七弟曹也官至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和讨奉第四军总司令。北伐战争以后，曹锟隐居天津，但由于曹氏历居显要，其家族积资巨万，在天津曾投资各项企业，诸如，北方航业公司、恒源纱厂、同福饼干公司、大华火油公司和数家米面庄及当铺，在大沽、军粮城置有大片田地，市内建有曹家花园，并在旧英、意租界置有多处房产。

曹士藩是曹锟长兄曹镇之子，在曹氏家族士字辈份的人中排行十四，现已年逾七旬。他在40年代就离家独自谋生，所以现在是国家干部，已退休，但由于家庭生活拮据，只好外出补差，在天津古文化街聚宝斋担任业务经理。谈起三叔曹锟，曹士藩说：“曹锟有2子1女，现已不在人世。但曹锟的孙子和孙女都健在，现在香港和台湾经商，目前在大陆还有一些投资。现在曹氏家族成员少说也有二、三百人，但彼此来往很少。三、四十年代家族成员中多是纨绔子弟，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所以没有多少财产留下。只知享受，不知奋斗，当然早晚要败家的。”

说起曹士藩的家庭，他大有一言难尽之状。他说，1950年他考入东北盐务总局文工团，1951年来到河西区文化馆工作，求学心切的曹士藩于1956年考入河南师范学院，但仅上了一年学校就被生活所迫辍学回来，而1957年干部下放他又去了天津南郊区，60年代回文化馆

工作了几年，“文革”后期又被下放到造纸四厂当工人。一子一女现已成家单过，他和老伴与孙女一起生活，但由于老伴没有工作，他的退休金不敷生活开销，所以不得不出来“打工”。

说起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时，曹士藩说：“小时候当然享了不少福，但成年后我便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得靠自己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分给我的房产我不要，房产股息我不领，我那时觉得做为一名国家干部不应有什么私有财产，要和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尽管现在的生活不富有，但精神生活很是充实，家庭生活也很和美，我想这比什么都重要。”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之三子袁家骥携夫人吴健雄与胞弟

袁家楫 女袁静、堂妹袁家调留影



## 陈立夫与中国医学

●翟书惠 石林

陈立夫先生在台湾一再表示：“海峡两岸交流，可以先从中医开始合作。”

陈立夫早在20年代就与祖国医学结下不解之缘。1929年2月25日，汪精卫主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蛊惑与会者通过《废除中医中药方案》，宣称“若给中医以行政权利，恐非中国之福。”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当时，浙江名流邀请御医奚可阶等中医界人士，和陈立夫以及立法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任焦易堂等，群起反对汪精卫的《废除中医中药方案》，相持数年之久。蒋介石乃下令撤销《废除中医中药方案》，同时，委任焦易堂兼任中央国医馆馆长，陈立夫兼任理事长，奚可阶任

浙江省平湖县县国医支馆长。并宣布撤销汪精卫《废除中医中药方案》的1935年3月17日为国医节。此后，陈立夫与焦易堂、奚可阶等结为金兰之好，过从甚密。

去台后，陈立夫是台湾“财团法人陈立夫医药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台湾“中华医学院”董事长，热衷于致力中医药事业的振兴，与台湾中医学者陈太羲教授等结为新一代国医莫逆之交，尤其与奚可阶副复一博士，又是一代忘年交。

福建中医学院建院30周年纪念日（1988年11月6日），曾邀请陈立夫参加。陈立夫虽未成行，特别寄去深稽博考的学术论文《中医之理论基础》。

# 点睛传神

## ——看张良仁先生的人物画

●缪慧敏

画家张良仁先生擅长画历史人物。画人物比画山水花鸟难。人嘛，是感情动物，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因此，画家画人物，演员演人物，都需要把握人物的心灵，不单讲求形似，还要求神似。也都需要在眼睛上下功夫。古代画家顾恺之有“传神写象，尽在阿堵之中”的理论。近代人也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都是说传神的要点，在于眼睛。

在我国戏曲演员中，那些有杰出成就的表演艺术家，莫不精于此道，在运用眼神上下过苦功。像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为了练眼神，专门喂养鸽子，眼望飞鸽转动眼珠，不就是一例吗！京戏舞台上的周瑜、吕布、赵云，同是三国时期的名将，演温了，就演成一个人。而高明的艺术家表演起来就绝不雷同，就从周瑜的气躁、短毒；吕布的贪色、轻浮，赵云的忠勇、持重；特别用眼神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差异和神态气质，把这三个角色塑造成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

画家画人物，也是一样，运用眼神刻画人物，也大有讲究，也不能搞成公式化概念化。如把眼睛画成三角形，以为这就表示愤怒；画成向上弯曲的弧线就表示喜悦和微笑。那实则都是一种形象的表现程式，光是这样画，也很难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张良仁先生热爱祖国博大精深的炎黄文化，他对这条历史长河中的发光人物，满怀激情，要让一切善良、正直、友好的国内外朋友进一步了解我们东方巨龙的精神气质。

数十年来，他勤奋刻苦，孜孜以求，潜心钻研，用画笔刻画上百个历史人物，在人物眼神刻画上，尤见功力，惟妙精深，表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感染力。看张良仁先生的古代人物画，让人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近几年来，他的人物画屡次参加展览并在报刊上发表，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好评。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修军等行家里手曾经称赞：“张良仁画的人物，眼睛会说话。”今天，这里发表他的两幅国画，奉献给大家。

看他画的老子。

古今画老子的画家很多。要么，把老子画成很聪明的道士；要么，画成很淳朴的先民，都只表现了老子的一个侧面。这样让人看了老子的形象就显得很单薄。张良仁先生根据《史记》中有关老子的记载，老子《道德经》和其它记述，经过反复思考推敲，认为老子这位先贤哲人，内涵非常丰富。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这句话自身就是对立的统一。用老子这句话来表现老子的大智若愚最好不过了。看张良仁先生画的老子，驼背敞胸，宽

阔的大脑壳，高耸的颧骨，深陷的眼窝，其貌高古质朴。细看多层次的眼轮，明如秋水的眼白，当他的目光射向远方进行运思时，沉静的眸子凝而不流，高深莫测。这样就把老子的大智若愚这对矛盾处理得十分协调，老子的形象充实丰满。

《一行观天》中的一行和尚，是唐代乃至全世界的伟大天文学家。看他高坐天文台上，面对天空，双唇紧闭，眉头高蹙，竖起上眼帘，目击满天星斗，伸出食指，点着膝盖，若有所思，若有所获，刻画出天文学家的专注、探索、分析、综合的神情。

以上这些画都是十分传神，引人入胜的。

他的作品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他说“生活、传统、勤奋”缺一不可。他塑造人物总是先了解所画人物的人品、背景和有关著作，对人物有个根本把握之后，再从生活中找出雏形，通过他自己的蕴涵，下笔必为已出。为了画好古人，他经常注意画外功夫，不单是观察周围的人和事，更勤奋研读历史、诗词、戏曲，研究中国美术理论和绘画精品，从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表现力。因此，他画的历史人物都很有个性，很有深度，显现出清雅、旷朗、特别深沉的神韵，可谓中国画高品位的精神产品。

美国的超人是虚构的，中国的“超人”就在我们身边。



编者按：气功是中华文化古老文明的瑰宝，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炎黄文化的一个脉系。气功的存在从来都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对气功的阐述与诠释。于是，才有了封建迷信的伪气功，也有了“不可知论”和不承认主义。

本刊发表此文，只是想为见仁见智的气功研究提供一份粗略的素材，以推动对气功的研究，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倘若能达到这个目的，当不悖我们弘扬炎黄文化之初衷了。

### 故事已经不重要了

故事都很简单。

有一位老人，癌症、不行了。刘燕赶到时，他疼得打滚。

刘燕发功，老人不疼了。他坐起来，吃了一个苹果。他的儿女们激动地微笑着。

老人是李德生的亲家。

晚了。全身扩散了。刘燕走出病房说。李德生的夫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是晚了。怕你不来，没说。她叹了一口气：他有个儿子在国外，能等他回来就好了。刘燕说：可以。

一个月后，老人望着所有的亲人，安祥地谢世了。

还有一位肝硬变者，刘宇，脸色腊黄，双目无神。他找到刘燕。刘燕说：坐吧。请你闭上眼。

不一会儿，刘宇只觉两腿像灌了铅，定住了。头部却渐渐放松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舒畅感——又仿佛在梦中。

过了些日子，他的肝“指标”全部正常了。

又过了些日子，有人在圣诞节的晚会上见到了他。说他气色很好，正在演唱“平安夜”。

再说一则：广东有个男孩儿，聋了16年。因刘燕发功，他才有了听觉，像别的孩子一样……。

其实，故事说不完。

有多少患者就有多少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

谜团。谜团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解的。

### 有多少奇妙的感觉

城南有座 60 年代的居民楼。刘燕住在一层的半个单元里。

客厅是“接出来”的房子。沙发和长案都很普通。只是地上的那盆万年青有些特别——叶子绿得出奇，像涂着油彩。有一天，来了一位花匠。他盯着万年青发愣：没见过这么绿的叶子。神了！

刘燕微笑着。

花匠忽然有悟：这屋里有你的气场。我说怎么越坐越舒服呢！

不少朋友都说这屋子奇妙：来了不想走。

也许是心理上，生理上的微妙变化吧！总之，通体清爽，舒泰。空气格外明净，人坐在屋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与宁静。

于是，隔些日子，总有朋友相约：刘燕、我去你那儿坐会儿吧？

刘宇就是刘燕家的常客。他说：每坐一会儿，病情就跟着好转似的。

刘燕不在时，也有人感到了这种异样。

刘大师是不是刚走？

一位清华大学的物理学者问刘燕的弟子。

是刚走。弟子点头。

他的场还在呢。学者说。

气场到底什么样子？能让我看看吗？曾有朋友问过刘燕。刘燕却说：顺其自然为好。

其实，不少人都见过刘燕的“场态”。

一位部队首长，战争年代时，左耳被炮声震聋，几十年不便。刘燕给他治好了。他叹为“神功”。他的儿女们也跟着信气功。只是他的秘书半信半疑。有一天，他和家人打坐，请来刘燕“测试”——刘燕围着他们走，手在他们头顶上感应着。

刘大师手指尖有紫光！见大家收功了，秘书才露出惊讶来。

噢？大家也觉神秘。

没错。秘书再次证实：我眨了眨眼又看，果然是紫光。

刘燕微微一笑：气场是有光感的。

一位小男孩儿也见过这种光感。

刘燕去朋友家治病。他们的小儿子忽然跑出屋外：叔叔的手指放光了！

刘燕的妻子坐在外面，孩子扎在她怀里。很紧张。她就说：不要紧，那光是能治病的。

刘燕的妻子也紧张过。当时，她坐在刘燕对面。不知怎么的，她忽觉周围一切都没有了，仿佛置身宇宙。头上却出现一个锥体。锥体旋转着，把她往上吸，不断向上，越来越高。

哎呀，我不行了！她叫了一声，才慢慢醒来似的。刚才是带功聊天。我看你太累了，想让你离开一会儿。刘燕说。

她有些后悔了：不该紧张了。多感受一会儿多好，看看还有些什么。

有个好问的朋友，和刘燕说起他的母亲。

母亲几十年的头疼病，越老越甚。说的上是绝症了。至少是顽症吧。气功有治吗？

刘燕想了想：可以治。

可是，她不信气功。不是说信则灵吗？

不要紧。请她接电话吧。

电话通了。刘燕说：听说您头疼。传来母亲的声音：历史性的，又犯了，大把大把吃药片也不管用了。

我给您治治。您别有意抵触就行了。

试试吧。母亲被疼痛“拿捏”的已顾不上信不信了。

好，请您把话筒放在太阳穴上。眼微闭，呼吸自然。刘燕同时把话筒也放在自己的“天目”上，样子渐渐有些痛苦。

过了一会儿，刘燕又让老人换了几个穴位。又过了一会，他问：怎么样了？

哎呀，怪了，怎么不疼了？话筒里的声音很惊奇，并且如释重负。

好问者兴奋地说：奇了！真是奇了！怎么这么远也能发气？

气场是发射性的。刘燕说。

可以发多远？

我给深圳的患者治过病，也是通过电话。

不可思议呀！问者感慨不已。

### 让我们离开一会儿

也来讲点古。

你一定知道吕祖吕洞宾吧。你知道为什么称其吕祖吗？

当然，他道行深湛——既得云房之道，兼有火龙真人的“天道剑法”，又能显化三头六臂，可谓“天仙壮元”了。可是，你注意过吗？他是八仙中人情味最浓的一个：为百姓治病解难，在江淮斩蛟除害，很有些“群众基础”。正是基于这种影响吧，上天才救命为传教祖师。全真道还尊他是北五祖之一呢。足见声望之高了。

那么，吕祖的门徒弟子们，又是何许人也？可惜年



■为天津小患者丁剑施治

代久远了，有无这方面的谱系，也未可知。

却说清代末年，五台山有个明阳观。观内有个道士，留着长胡子，活了130岁。

人们都说他是吕祖几十代的弟子。常见他练功之前拜吕祖。

他叫祖年，道家泰丹功传人。他的弟子叫子秋，1978年才过世。有案可查。

子秋见过师父“穿墙”，确实无所隔一般。不过，祖年的真传还是施法行善，治病救人。或者说，也是吕祖的“仙旨”吧。

原来这泰丹功有两系。一系是武术，武功，用以护身。一系是气功养生，气功治病，悬壶济世。子秋则是全面继承。

解放前，子秋当过镖头，当过武术教官，社会上很有名气。醉鬼张三，燕子李三，八卦眼镜程等人，也深敬子秋。他们有了“闪失”，也去找他医治。

子秋的医道甚高。以经络、气功点穴治疗疑难病症见长。建国后，气功落入“迷信”，人们也就光知道子秋医术绝妙，却不知其所以然了。

子秋有个儿子。儿子终身未娶。

1960年，子秋得了一个小外孙。外孙早产，很羸弱。子秋就说：把这孩子交给我吧。

从此，子秋就把孩子带在身边。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孩子吃的是饼干糊（“困难时期”多数幼儿如此），长得却很好——透着一般孩子没有的精气神儿。

孩子五、六岁时，竟学着外祖父的样子“打坐”。子秋见出这孩子不凡，暗喜。决定施法于他。

这孩子就是本文主人公刘燕大师。

刘燕的名子为子秋所起，有吉祥和“生于燕”的含义。其艺名叫燕子。便有圈里人直呼“燕子”或“燕子大师”。

#### 还要做点补充

记得刘燕治病吗？

当时，李德生夫人写了四个人名，递给亲家。第一个是严新，最后一个是刘燕。那亲家颇着手圈定了刘燕。于是，李夫人赶到刘燕家。

这是1990年。

早在70年代，子秋就是李德生家里的常客。他给李德生及其夫人都治过病。有时，也带着刘燕。李家便知刘燕是子秋的传人了。

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子秋了。

到了刘燕出山，人们更是陌生而疑惑：年轻轻的，搞的什么气功呢？

1989年，刘燕和弟子来天津带功咨询。咨询点设在某门诊部。

那屋子很脏。刘燕和弟子动手打扫时，来了两个病号。

第二天来了7个。第三天15个。第四天20个。第五天挂不上号了。第六天门诊部轰动了。

轰动的事件很简单。

一个叫丁剑的孩子，从来不会坐，鞋也没穿过。刘燕带功治疗时，窗外就有人旁观。治到第6次，旁观者已挤满窗口。

怎么样了？太明显了，这孩子能坐了！

这时，丁剑已经站住了。他母亲兴奋地护着他。刘燕说：撒手。母亲不敢。刘燕又说：撒手吧，没关系！丁剑自己站住了。

来，上叔叔这来！刘燕呼唤着。

丁剑迈步了！一连走了好几步！！

丁剑的母亲泪飞如雨，俯身就要跪下。刘燕拦住了。窗外的人们忽啦一下拥了进来……

从此，越来越多的天津人相传不已：北京有个刘燕，真正的气功师！

说刘燕是真正的气功师，是因为靠伪气功行骗的人不少。

一听此人是气功师，人们往往要打个问号。

还有一次，在广东湛江。也即那个聋了16年的男孩儿的家乡。

刘燕做气功报告。台下人木然。仿佛不知气功是何物。刘燕打住了，说：这样吧，有疑难病症的，请上来5个！

台下忽然凝住了，很静。

一阵骚乱后，上来5人。

不要留情面，请讲。刘燕说。

我这鼻炎20年了。患者开始诉苦。刘燕点头：现在就治。

几分钟后，患者咧嘴乐了：通了，通了。刘大师真高！

那4人也相继有效。台下活跃起来。

还有一种惊奇，耐人寻味。

有位泰国老板和夫人，来到刘燕家。老板有些冷漠，一言不发。

刘燕先给夫人带功点穴——肾虚。双腿麻了五年多。

管用，真管用！夫人惊喜了：刘大师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一种。

“他们”即是国内某大气功师。知名度很高。他在泰国访问时，老板和夫人慕名求治过。只是“感觉不大”。老板一旁解释着。

刘燕又给老板治手疼。老板说：30年前，有个气功师给我治胸疼。他说：把胸疼弄到手上吧。我的功法只能这样。结果，胸真是不疼了。手却落下毛病。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佩服他。

刘燕带功，攥住老板的手。老板惊叫一声：怎么？不疼了？！他活动着手腕：刘大师了不起、了不起！

其实，去泰国访问的那位大师，刘燕很熟悉：他没治好的病，刘燕治好了。大概不止十几例吧。也包括聋了16年的广东男孩儿。这层背景，知道的人很少。曾有朋友感慨：刘燕，你超过那位大师了。刘燕说：不能这么讲。古人说：“术业有专攻”，气功也应该如此吧。

平时，刘燕很少说话。一天也说不了多少话。他似

乎很习惯那种“虚明宁静”的状态。

他着衣也很朴素，颇有子秋遗风。

子秋喜欢穿灰上衣。中式或人民服。内衣是粗布衫，裤子也是灰的。免裆。园口布鞋，布底。冬天，外穿军大衣（李德生送），也很得体。刘燕跟子秋出门，上街、感觉很好。

他怀念那种感觉。

刘燕给人的感觉也很好。朴实，自然，内含光洁而性度温和。

十年前这样，十年后还是这样（一位老患者评说）；在国内这样，在国外也是这样（出诊东欧载誉而归，仍是沉静如初）。总是那么本色，好像与生俱来。

### 请到幕后看看

夜色幽深，仿佛神秘的幕布。

那间奇妙的屋子里，灯光温暖，静谧。

刘燕坐在沙发上，神情自若。问者，年近中年，学有所成的样子。坐在他的对面。不多时，刘燕的弟子也来了。

问者：从最具体的问题说起吧。

刘燕：可以。

问者：那天，接通电话就治好了我母亲的头疼，我感到奇怪，决定找个机会集中问个明白。我最想知道的，是你怎么治疗？有没有一种程序？

刘燕：是有程序的。我通话时已经带功了。我的气场很快就有反应：你母亲的脑血管硬化。

问者：怎么知道是脑血管部位？

刘燕：我的脑血管有瘫痪感应，也知道要用强气感。

弟子：气场有中介作用。近似雷达，可以把信息投在屏幕上。

问者：（沉吟片刻。他想起一本书——《秩序感》。上面说：科学家发现了尼罗河鳗鱼使用象雷达那样的探测方式和装置，以测定它前进途中的障碍物的位置，或寻找出洞穴及缝隙的通路。难道人类也有这种内在装置？至少刘燕有这种特殊装置吧。可是……）气又是怎样发出的？

刘燕：天目是气眼，把话筒放在那儿，内气从气眼发放的。

问者：气能沿着导线走？

刘燕：可以，气场是手，是仪器。这无形的手可以长，可以短。

弟子：气是可以把握的。根据需要，可以集中一束，也可以有许多束。带功报告就是许多束。

问者：发出的气治什么病都行吗？



■为耳聋 16 年的广东少年全粤海施治

刘燕：要讲配气，如中药的配方。比如说：给你母亲发的是阴气。因为脑血管病要用阴功。所谓降阳升阴。治脑血管的中药，不也是凉性吗？有一次，我给赵朴老治病。先用手心发气，赵老说：很热，你发的是阳功。过了一会，我一调手，用手背发气。赵老又说：凉了，现在是阴功了。先用阳功是治赵老的风湿。后用阴功是治他的脑血管硬化。当然，像赵老这样在行的患者太少了。发多少为止呢？也是由气场判定。当我的脑血管的瘫痪感减轻或至零时，就可以停止发气。

问者：你好像比一般人多了许多“内在装置”，或者说像个精密的机器人。

弟子：带功的人体高于仪器。不用接触就会有各种反应。不像 B 超。

问者：（陷入思索）

第二天晚上，还是那间屋子。

问者仍然坐在刘燕对面，只是情绪见佳。看得出他在努力调整自己。

问者：你曾使癌症老人延长生命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刘燕：当时用的是纯阳功，作用整个体内，穿透脏

腑，骨髓。这种场在周身循环，打通气血、气脉，冲击病灶，控制病灶。对痛疼也有麻醉作用。同时，还要扶持他内里的正气，所谓培正去邪。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要设法点亮、加炭，催动并再生潜能。

弟子：人生一口气，气在命在。救人要输血，为什么不能输气呢？

问者：（点头，并联想到庄子的观点：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有道是：通下一气耳。（不觉脱口而出了）

刘燕：我姥姥病危时，我母亲摸脉，说：没有了，不行了。我把围着的人拨开，发了强气。老人喘了一口粗气。有脉了。又活了三个月。

问者：（连连点头）如此说来，耳聋的男孩儿恢复听觉，也就不难理解了。

刘燕：他是药物中毒性耳聋，造成听神经长期休眠。我的场进去后，很强，打通了听神经的故障，起到了药物和其它外在力量起不到的作用。

问者：休息会儿吧。

刘燕：可以。

问者：做个小节目吧。

刘燕：（有预感地）也可以。

问者：我今天心绪不好，你能知道为什么吗？

刘燕：（带功状）有关女友的事。

问者：（被“吓一跳”的感觉）你怎么知道？

刘燕：好气功师都是预测家。

问者：再测一步行吗？

刘燕：（沉吟）有些错综的矛盾。

问者：太准了！（仿佛命运已被人把捉）能测出结果吗？

刘燕：可以化解。需要时间。

问者：没治了！我这点秘密被你三句话就说完了。神！

问者：（情绪好多了）换个题目吧。你多大开始练功？

刘燕：五、六岁。那时，我师父让我双盘腿，五心朝上。他用绳子拴住我的两脚和后腰，成三点，然后提起来，悬空打坐。有时还要悠几下。后来，又学滚功。已经十几岁了。

问者：是打滚吗？

刘燕：不过，很有讲究。要两手相合，两脚相搭。舌抵上腭，双目微闭。然后滚动。



弟子，还在零下40度的室外练过。

刘燕：在东北，天不亮时练。只穿汗衫、秋裤。那时，我在部队。

问者：会冻成什么样？（脑海里浮现奇异的画面：寒凝大地，黎明前的黑暗。刘燕身着单衣，倒地翻跃不止。）

刘燕：进入功态后，眼前有紫光，浑身热乎乎，很和谐。比在屋里喝茶还自在。

问者：看来，你也是经历了几个队段的。

刘燕：四个阶段。小时候打坐；后来练滚功；初步治病（二十几岁）；调气得心应手（30岁左右）。基本上应验了我师父的预测。他说：你到了30岁可达到泰丹功的最高境界。

第三天。

问者：昨天讲的最高境界指什么？

刘燕：纯阳之气。也即阴阳之气分明，纯正。道德修养，至真至朴。

弟子：修德，重德是气功之本。

问者：（点头，隐约想起老子所言：万物莫不尊道贵德。）

刘燕：不讲气功道德，练不好功。也可以说：不讲医德，功法也是上不去的。

弟子：刘燕向来重医德，不重金钱地位。那天，他给人发功时，闯进一个警卫员，劈头就说：我们首长让你去一下。刘燕也不客气：对不起，我在给人看病。你先等等吧。

刘燕：我师父说过：这功法不用时如粪土，用时千金难买。前些日子，我去理发。理发师说：我腹侧疼，查不出原因。我说：下午到我家去。他去了，我发现他是气质性病变。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包在我身上了。后来，给他治好了。分文没取。

我常常想：我是水养的，土养的，不能离开泥土与水。我是泥土的儿子。要永远溶于泥土与水。永远像大地一样朴实自然。自然是永恒。

问者：（有感于老子的又一句名言，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弟子：昨夜你没有休息好吧？

问者：是。有点犯困了。休息会儿吧。

刘燕在纸上写了一首唐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然后递给问者。

刘燕，拿着看一会儿。

问者：（盯着。那字迹不像书家的，也不像常人的，却有一种飘逸感。忽然，他顿觉清爽，倦意像水纹似的退下了。）怪了，不犯困了！

刘燕：这是带功写的字。可以提神。

问者：挺有意思。（又拿起那首诗看了看）那么，你一天睡多少觉？

刘燕：三、四个小时。

问者：每天如此？

刘燕：一直是这样。

问者：你净吃些什么？

刘燕：面条。

问者：营养呢？如海鲜什么的。

弟子：基本不吃。

刘燕：我每天不吃早点，只喝十杯茶水。中午以面条，豆芽菜为主。因为我最爱吃这些。晚上也吃的少，主要是喝水。

问者：发功之后呢？

刘燕：还是不吃，也不用吃。大概我习惯以自然界的灵气来滋养自己吧。

问者：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次日上午，问者望着窗外出神。他还是想着有关刘燕的种种“不可思议”。并且，还想聊聊。

他拨通刘燕家的电话。他妻子说：他出去了。

他去哪儿了呢？散步？去农贸市场买豆芽菜或切面吗？忽然，问者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意味：一个中国式的“超人”，如此非凡。可是，当他走进茫茫人海，就再也寻他不着。就像一滴水掉在泥土里被吸收了，完全吸收了。

他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生于斯，长于斯……

## 启事

北京紫金台经济文化发展公司将于近期举办气功咨询活动。特请刘燕大师现场调治疾病，对症教练功法，解答有关疑难。咨询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有需要者可来信或电话联系。

联系人：郭玉华

地址：北京文津街7号北图分馆内6号楼

电话：6016633—227 邮编：100802



# 毕昇故里 在英山

北宋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昇墓考

●马民权

活字版的发明,是我国古代科技“四大发明”之一。其发明家毕升属何处人氏?各种文史资料均无确切记载,已成近千年之谜。

据《辞海》、《辞源》载:毕升,北宋人,业锻工,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051年前后,生平事迹不见经传。只有他的同代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载他发明活字版印刷术这件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沈括说:“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这个唯一的记载很有史料价值,它说明毕升的确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是铁一般的事实,发明的时间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而且它还让我们知道毕升并非达官贵人,是个“布衣”。

1990年,英山县志办公室首次获悉县城东北41公里的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王焱升发现毕升墓碑。1991年8月8日,县志办陈凯文、萧浪平、段茂畅专程实地勘查,在王焱升等人的帮助下,于五桂墩村退休教师田述单住宅右边找到了该墓碑,经水冲洗,碑文清晰可见。在当地村民帮助下,他们又在五桂墩村睡狮山之阳,即红花水库渠道隧洞西侧找到了墓碑底座和墓

界、史学和考古部门的关注与重视。

毕升这个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发明家何以葬在英山呢?答案只有一个:他的籍贯就在英山,毕升是英山人。从墓碑铭文上看,其夫人李妙音与其同茆合葬,碑乃其四子三孙所立。一个民族,一个家庭是历史的积淀,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作为民族和家庭的一员,哪怕浪迹天涯海角,到头来总会被民族传统和家庭亲情所召唤,叶落归根,故土难丢。如清代潮州知府李仕彬,暮年毅然弃官回归故里(今英山县南鸡鸣河),筑“石我园”怡养天年,终而葬于故土。又如曾任清朝刑部尚书的金光佛乃英山县金家铺人,老来也舍弃京都的繁华,回归故里,辞世后葬在故园。何况身为“布衣”平民百姓的毕升,更是故土难离。

那么,久为北宋朝廷命官、著有称为古代科学的“百科全书”《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又在何处发现毕升活字印刷术这一重大发明创造的呢?

据《宋史·沈括传》载:“括博学多才,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卜算……无所不通”。他从小跟随父亲宦游,后继父职,足迹遍及大江南

北。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从不放弃科学考察,且多次往来于江淮之间以及今之英山(当时英山未建县,属淮南道辖地)。他“二十四岁步入仕途,任海州沭阳县主簿……后来,他在三个县作过县令。在任安徽宁国县令时,力排众议,领导人民修复位于芜湖区域的长期废毁的秦家圩,更名为万春圩,抵抗长江下游水患……”(见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华民族七十二伟人》第180页)。毕升发明活字版印刷术的时间是1041—1048年,其时淮南大别山一带高山地区就盛行水碓造纸,到解放初尚存。还有活字版印刷所必需的原料如胶泥、松香、蜡等历来是英山的传统产品,至今还富有资源。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于1051年辞世。三年后,沈括二十四岁,进士及第,任职直至三十三岁,这十年中,沈括在三个县作县官,特别是任安徽宁国县令时的政绩在有关史料中得详述。沈括在安徽任职期间完全有可能了解到属安徽(淮南道庐州路)管辖之地(今英山)的毕升所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术的情况。

大量的实物资料和口碑傍证,活字版印刷术发明家毕升是英山

人,已具备如下五个方面的条件:

一、有碑可证。毕升墓碑为变质岩麻灰石凿成,呈竖梯形圆头式,碑高 113 厘米,宽 65—70 厘米,厚 9—16 厘米,周边刻饰连枝云纹,上部刻饰宝珠顶华盖,下部为火焰纹雕饰。墓碑和墓碑座的石质选料、风化程度、花纹、铭文运笔、雕刻都是有鲜明的北宋墓碑形制特点。

二、碑有铭文可查。墓碑中间两行大字为阳刻,非常清晰。文曰:

故先考毕升神主  
墓  
故先妣李氏妙音

华盖两旁分别镌刻日月一轮,刻“日”、“月”字样,均为阴刻,左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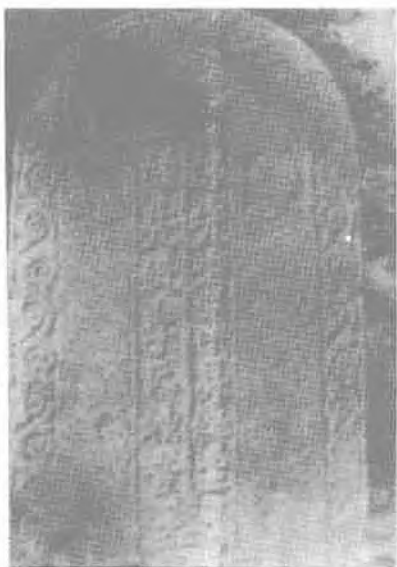
毕升嘉 毕升文 毕文显  
孝子 孙男毕文斌  
毕升成 毕升荣 毕文忠

右刻:“皇佑四年二月初七日”。

黄冈地区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张尤智和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孙启廉等文物考古专家通过实地勘查后认定:“从墓碑铭文看,这是活字版印刷术发明家毕升无疑。”

三、有文物可佐证。英山在北宋时期经济、文化都较发达,具备了产生毕升这个发明家的文化、物质条件。毕升墓地周围方圆百里有四处毕姓墓葬和府第遗址。继毕升墓发现后的 1993 年 5 月,在毕升墓西南 9 公里的过路滩乡王垸村葫芦地,又发现毕升孙男毕文忠墓。毕文忠墓碑形制与毕升墓碑基本相同,碑高 121 厘米,宽 74—80 厘米,厚 11—19 厘米,与其墓座连成一体,碑文均为阴刻,有“故□□毕公文忠神主墓”等字样。

据有关专家研究,英山史前就有人类生存,古为皋陶故里,汉为英布封地。我们对英山境内出土的文物作过研究,宋代时这里人丁兴旺,文化、经济环境比较好,其出土的文物宋代居多,这一成果已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认定。



四、有毕姓相关地名可考。据民间口碑,北宋时毕姓在这一带是一门望族。毕升墓地西三公里处有远近闻名的毕家铺,其畈中有明代毕原亮十秀才墓;墓地南一公里处的萧家大屋相传为原毕宰相府,尚有遗迹;墓地东十五里处有明代毕翰儒墓;毕升墓地附近红花村田畈,昔时叫毕家畈,畈中有一个刻有毕仲良的古代石碾,不远处的路边横亘一件长近 2 米的椭圆形石盆,上刻:“大元辛卯至正十一年九月吉日李门第九代李昂男李荣同妻汪氏置……”等字样。附近有多处名为李家垸,李家上垸的村落和李氏祠堂遗址,至今仍聚居着许多李姓人户,说明宋、元以来,李氏宗族世居于此,毕升之妻李氏妙音当是本土人氏。这些可佐证毕升成长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

五、有毕氏传说民间野史可鉴。经查毕氏家谱,按毕氏“文”字辈推算,毕升乃周文王之十五子毕公高之后二十六世。其孙辈毕文显、毕文斌、毕文忠乃二十八世。相传,毕升后代出了个宰相,其族属在草盘占河“造钱洞”中用活字版伪造朝廷铜钞,被朝廷查觉,罪连九族,满门抄斩,幸存后裔为保存性命不敢姓毕。取原繁体“畢”之“田”字头,改姓

“田”,亦改姓“萬”,如今五桂墩、毕家铺一带姓田者多,姓毕者无。

毕升墓地所在的草盘地镇,纵横几十里,昔时叫“金盆地”。东有鲤鱼尖高耸,南有钻天凤入云,西有篓子石挺拔,北有玉皇尖巍峨,素有“四支天烛照金盆”风水宝地之说。这里是大别山主峰近麓,群峦叠翠。毕升墓葬在睡狮山之阳的毕家坳坳口之右下侧,墓后左是来龙岗,山势逶迤屈曲,宛若游龙,毕升墓穴正在龙鼻上,墓地前十几米处是古代的东河河道,现改为田畈,昔时中有小港,水流平夷悠缓,根据“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以水止气”、“内气止生”之风水要求,来龙岗的地气则是遇水即止,而且聚之不散,故“善葬者心原其起以观势,乘其止而插穴”,凡属龙穴,端赖水为应征。毕升墓葬在来龙岗的尽头而循水处,正是根据来龙岗的山势,乘其止插穴的。参照“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说法,毕升左边来龙岗即为“青龙”,右边的睡狮山,即合着“白虎”。毕升墓朝东南向,前面有三道圆巧秀丽端正齐整的小山重叠形成笔架,而最后一道山虽被炸取石料,但仍不失当年秀俏,仍像伸向蓝天的一支彩笔。远处峰峦簇拥,叠嶂层层,而偏右的对面河口

处，高峰峭壁，直耸天表，其水口真有“紧如葫芦喉”之感。毕升墓葬于此处，说明毕升后裔对墓穴的选择极为讲究，也是“地灵人杰”之使然。

1993年10月14日—10月17日，武汉大学教授、历史系考古研究室主任杨宝成，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员孙启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劲，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谭维四，黄冈地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吴晓松等文物考古专家以及省、地、县新闻界30多人，深入到草盘地镇五桂墩村、大屋村、红花村、毕家畈、毕家铺等处实地勘查毕升墓和相关府第、石碾、墓碑以及李氏石盆等文物实证；过路滩乡涉水过河至王垸村六组葫芦地，实地勘查毕升孙男毕文忠墓碑与墓地。对毕升墓和毕文忠墓认真研究、科学考证，作出了鉴定。一致认为：

(一)根据毕升墓碑的形制、花纹、结构及碑文内容考证，确认毕升墓是北宋皇祐四年(1052)所立。墓主即是我国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经对该墓碑座落地点的实况考察，认为此地就是毕升的埋葬地。毕文忠墓碑及其墓地的发现，进一步证实该地即是毕氏家族的故里和墓地所在。

(二)毕升及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史籍中仅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有简略记载，毕升墓地的发现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科学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三)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史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对世界文明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毕升墓地的发现无疑对于研究中外文化史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四)毕升墓地的发现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纪念这位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发明家，英山县委、县政府正积极筹建毕升纪念馆和毕升陵园。以毕升研究为启动点，开发利用英山人文资源，大力发展深山旅游业，将毕升和相关的人文资源开发与英山两个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面向经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毕升故里闻名全国，走向世界。

不久的将来，伟大的北宋活字版印刷术发明家毕升的故里——英山县，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谁能取到警卫三师师长钟健魂的首级，赏黄金一千两！”“捉拿共匪头子钟健魂！”

这骇人听闻的通缉令，贴满了1945年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京沪线上大小报纸也飞传着这个通缉令。

钟健魂现名钟血浪，就是照片上这位红光满面、虎气十足的90岁的老人。他可不是普通的敌工干部，他是在经历了宏伟的大革命，经历了残酷的白色恐怖，经过了近20年曲折的道路，终于从敌人内部拽出了全副先进武器装备的南京日伪警卫三师，回归党的怀抱，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任人民解放军华东七纵副司令的老共产党员、黄埔老将。

当钟血浪带着南京日伪警卫三师起义，到达江苏新四军军部时，大革命时期的一位老朋友、新四军司令部参谋主任夏光，一见面就喊出了钟健魂1925年在黄埔军校参加周恩来、蒋先云领导的“血花剧社”时取的别名：“钟血浪，是你！回来了，太好了！”二人热烈握手话离情。真是“浮云一别后，流水二十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未斑。”

钟血浪经过滚滚血浪又回来了。他又恢复了自己革命的名字。但人们说：“太血腥了，去掉一撇吧！”从此，他就叫钟血浪了。

钟血浪的故事折射着近百年中国复杂的历史，鲜为人知，但有传奇色彩，因此笔者特意进行了专访。

## 血浪滚滚铸健魂

钟血浪，湖南岳阳张家村人，本姓张，1903年生。他父亲因参加了反清斗争，遭到全家抄斩，其父被杀

钟血浪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黄埔军校学员，今年91岁，曾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攻打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是至今还健在的极少数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他打入汪精卫伪政府，任汪伪军的师长，后率该师起义，参加新四军，任华东野战军七纵副司令员。他一生经历非常复杂，非常丰富。本文由他的女儿钟鸿所写，读来颇具传奇色彩。

# “理想是顽固的”

——日伪南京警卫三师起义策划者钟血浪传奇 ●钟 鸿

害。钟血浪及其母亲则万幸地被他父亲的战友钟昌济救出，逃到平江。钟血浪从此改姓钟。幼年的钟血浪半工半读，当过放牛娃，红茶厂童工等。1920年17岁时，参加湘军学兵营当兵。1921年随湘军到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2年由谭延恺、李富春保送到滇军讲武堂学军事二年。1924年国共合作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钟正在李富春主办的中央政治班学习，参加大会保卫工作为带队的队长。1925年2月，黄埔军校与滇军讲武堂联合组成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成立血花剧社，由周恩来、蒋先云领导。钟参加并取得名钟血浪。3月，钟即调至黄埔军校二期任军事教官，到海丰训练农民自卫队。6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沙基惨案。

五卅运动掀起了各地人民反帝的高潮。1925年6月，广州工人、农民、学生、黄埔军校学生10万多人，举行了援助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街时，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亡、重伤二百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沙基惨案”。钟血浪说：“我的同学吴光远性子强暴，死也不肯跑开，我就冒着枪林弹雨，硬把他拉出敌人的火力圈。拖着他从血流成河的地上连跑带跳回到内街。我们没直接回黄埔军校，跑到黄花岗，跪在烈士陵园前，哭得死去活来。整整哭了一个通宵。凄风惨惨，冤魂啾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样受外国人屠杀呢？帝国主义等着吧！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一定要讨回血账。一直到天亮，我俩才回学校。老师、同学还以为我们被打死了呢！”血的洗礼，促进了钟由民主革命思想转向共产主义思想。随即参加了黄埔军校内由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学习班。周恩来、萧楚女、

恽代英、蔡畅等都来讲课。至今，钟仍难忘萧楚女的举止音容。他说：“萧楚女为人诙谐，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下了课，夹着大皮包上苦力饭店和拉黄包车、拉板车的一块吃饭，没有一点大学教授架子。这种朴实的作风，真正令我佩服得很。他当时是公开的共产党员，除在我们政治班讲课，还在大学里讲课。萧楚女文章也写的好。有个女大学生慕名来访，一看萧楚女原来是个脸上有麻子的大块头男人，就哈哈大笑起来。她原以为萧似其名、如其文，是个秀气的小姐呢！在周恩来、萧楚女等共产党员的教导下，我又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新青年》《向导》等。通过这些学习，我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懂得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放穷人，解放全人类。理想形成后是很顽固的，为了理想我奋斗了一辈子。”

同年10月，钟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攻打军阀陈炯明、洪兆麟的第二次东征。东征总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钟于总政治部任宣传员。钟血浪1926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5月开始参加北伐，调至国民革命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也在四军，称铁军）七十七团当营长。也就在这时，该团老营长利运洁通知钟血浪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此，钟血浪由民主革命青年正式成为自觉革命的共产党人。

## 奔赴南昌叹挫败

1926年7月9日，钟血浪在广州东教场参加了北伐宣誓大会。当时群情激奋，老百姓自费印发支持北伐的传单，北伐战士个个士气高昂。10日出发，12日就攻

占长沙。钟随即被派到长郡中学当军事教员，宣传革命；同时李维汉在长沙办了一个政治班，钟当班长。同年双十攻占武昌。1927年初，组织曾派钟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毛泽东为所长，张国基为教务干部。在这段时间里，钟和张国基常到毛主席家做客，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和杨开慧都平易近人。那时毛主席是共产党领导人又是国民党宣传部长，他们就住在普通的平房宿舍里。他们有两个小孩，武汉天热，小孩都光着屁股。杨开慧也常到政治班听课，我们都相识，常在他们家吃饭，杨开慧总是给我们做湖南人最爱吃的红烧肉、炒辣椒、大钵汤菜。这是一段多么难忘的日子啊！”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在南京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与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对立。但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也发起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政府也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宁、汉合流，反革命势力大张。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反动的血腥的恐怖政策吓倒，毅然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钟血浪所在的四军七十七团也决定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

钟说：“我们七十七团的船只，从武昌去南昌，刚到九江，就被反叛的薛岳部打散。团长胡公勉立刻通知我和二营营长利运浩：‘赶快离开，要保存共产党。’我和利运浩马上脱下军装，沿着河边的芦苇逃出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找到一只小木船渡了河。当时我是‘独驾一舟千里去，心与长天共渺茫’。上岸后，又身无分文，只好一路讨饭到长沙。我虽然逃出来，但没有参加成南昌起义，部队也损失了，好恼火啊！”

## 秋收暴动恨折兵

“到长沙后，我去樊西巷一个小纸烟店找组织。烟店老板就是组织的联系人，他叫我去安源煤矿。我马上向我叔叔借了20块银元，动身到了安源。当即被派在井下做杂工，实为党的宣传员。安源煤矿的工人生活很苦，宣传好做，我在礼堂里讲过演，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教他们唱国际歌，很快就将矿工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组织上将我领导的这些矿工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特务营，让我任营长。一师师长就是毛泽东。我们这个营又叫炸弹队，因为我们有个任务就是利用矿上的炸药做土炸弹。用锡皮和棉布包裹炸药，中间塞上雷管，扯出引线，扔出去就爆炸，类似手榴弹。工人叫这手榴弹做‘洋蒜头’（蒜，音jiao，蒜头学名为薤xie，是湖南人爱吃的一种似蒜非蒜的鳞茎菜），炸弹队还配有梭镖、大刀，枪很少，这些都是为秋收起义准备的。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以夺取长沙为目标。战时，我们营编入一师第二团，团长为原安源煤矿警卫队长、地下党员王兴亚。

“二团共两千多人，有矿工，有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队。先攻打萍乡，未成。转而乘铁篷火车闯过敌人火力网，进攻醴陵，得胜。进了醴陵城，我抓紧机会给老百姓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随即，又奉命攻打济阳县城。没想到这下却中了敌人的埋伏。我带领的第一营从一个城门洞进去的。把守城门的兵不多，三下五除二的就把他们解决了。我们的队伍长驱直入，走进街巷。街上没有人，两旁店铺也都关了门，我们正在纳闷时，忽然，从每个窗口劈里啪啦射出了枪弹。糟了，这才知道我们中了敌人的埋伏，被包围了。进退两难，只有拼命地对打。一时炸弹和枪声震耳欲聋，短兵相接，白刃全红，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其惨烈情景如同古战场一样。战斗进行了约两个时辰，可怜我们的土炸弹、大刀、长矛，怎么敌得过敌人的洋枪洋炮，我们的队伍成片成片地倒下了。这些无名英雄，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却真是无愧于工农大众啊！没有被打中的战士，有的逃跑，有的卧倒，但跑的人又纷纷被打死。我见突围有困难，就埋伏在死尸中间。天黑了，枪声暂停，敌人也顾不上收尸。我这里悄悄地蹭到街边，扒开一个小店铺的木板门，钻了进去，蹑上小楼。怕敌人来搜捕，随手就把楼梯抽了上去。从天窗越过个屋顶，跳进一个晒台，又跳进一间房子，躲在一个犄角里。很快，就被睡在这间房内的一个小徒弟发现了。他见我浑身是血，紧张地说：‘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暴徒吧！’我说：‘我是挑夫，遇上打仗，不敢走了，趴在死人堆里，所以弄了一身血。’我们矿工队本来穿的都是便服短装，‘你就让我在这儿待几天再走吧！’这时老板也上来了。原来他开的是个小印刷厂，巧的，他也姓钟，比较同情革命，没有轰我，也没去报告。他对我说：‘天亮了，怕要搜查，你还是赶快走吧！’老板让我换了黑色的长工衣服，和他的挑水师傅一起到城外去挑水，混出城去。这招还真灵。因为这个城市喝水都靠城外的河水。天微亮，钟老板的长工就带我到较远的湖边去。在僻静处，他让我撂下水挑，逃走。就这样，我逃出浏阳城，悄悄进了长沙。唉！这次，反动军队又吃掉我一个营，我好恨啦！”

## 陷人死牢巧遇救

钟血浪怀着无限的悲愤，夜行晓宿，连奔带跑到到了长沙。他有多少话要和组织诉说啊！可是当他再跑到樊西巷小纸烟店里时，已物是人非。代表组织的老板找

■ 钟血浪九十大寿与女儿钟鸿合影



不到了，钟血浪买了包纸烟马上走了。

哪知钟血浪回到家中不久，忽然来了三个人。其中两个国民党兵，一个穿便装的，手中拿着绳子，什么理由也不说，上来就把钟血浪带走。钟妻贺澹江问他们：“这么晚，把他带到哪里去？”对方根本不理睬。就在贺澹江急得到处去求救而无人管理时，钟血浪被带到陆军监狱，每天承受着残酷的肉刑。钟只说自己是做小买卖的，除此，什么也不说。但当时，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钟仍然被送往死牢。他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在敌人横枪押送中，从陆军监狱步行约两个小时，走到长沙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钟被推进牢房，喀嚓一声铁门关了。在这个牢房里有个别强盗犯，青年政治犯居多。晚上靠墙坐地而眠，到处是尿尿，而这些对钟血浪已是无所谓了，他脑中不停地闪过无数壮烈的场面，沙基事件，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他说“我不怕死，但这样死太屈了，好不容易拉起的军队就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了？好伤心啊！好恨啊！只要不死，一定带两个营回到党里，一定要把在南昌和浏阳损失的两个营夺回来。”

巧在这时，透过铁栅栏，他看见一个国民党军官的身影，走进司令部的办公室，正好是他在长郡中学当军事教员时的一个学生——吴仲孚。钟想通过他，也许可救。钟立即将身上唯一的一个银元给了一个牢卒，他说衣服臭了，要换衣。牢卒不认识字，钟写个条给他的妻子贺澹江，让她快去找吴仲孚营救。

贺澹江接到纸条后，忙卖了金戒指，买了点心盒去

求吴仲孚营救钟血浪。吴在长郡中学时，加入共产党。1927年许克祥反水，几乎被杀，跑到武汉他堂兄吴尚师部（国民党第八军二师）暂任政治部主任。吴仲孚的堂兄吴尚此时正是长沙警备司令部的要员。贺澹江也是钟在长郡中学教政治班的学生，相恋成婚后，就在长沙安下了小家。因此，贺认识吴。吴见过贺后，就跑到牢房来看钟血浪。钟对吴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你还不知道？”他明白这是钟告诉他没有暴露共产党身份，吴仲孚借其政治部主任之职，查询了钟的卷宗。看到钟确实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分，吴仲孚即对司令部有关人员说：“你们把这人弄错了。”他们说：“有人看到他在醴陵做共党宣传。”吴说：“不会的，看错了！”对方说：“要辅保！”吴说：“以我的脑袋担保！”就在钟血浪被捕的第十天，吴仲孚对贺澹江说：“你明天黄昏后到刘剑虹那里去等他。”刘剑虹曾是钟在广东政治班的一个同学，当时也是在长沙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工作。钟夫妇在刘剑虹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吴与刘带着马弁，亲自送钟血浪赶快离开长沙到武汉去。

## 流浪播迁找党难

钟血浪连夜逃到武汉后，住在贺澹江的亲戚家，天天到马路上去碰参加秋收起义的同志，秘密寻找党组织。那时武汉很乱，正处在反共高潮之时，形势很紧张，何处去找？有一天，竟然在汉口街遇见了秋收起义时的第二师师长余洒度，钟血浪好高兴，以为可找到党了。

哪知余说他也找不到组织，问他住址也说“没准住处。”说完就匆匆走了。（据近日电视《狂飙》中说余酒度在秋收暴动后，到了井冈山，但和毛委员闹分裂，私自逃跑，后投奔国民党，又因贩卖大烟，被国民党枪毙。）看来武汉不宜久留，钟皿浪即与妻至南京，寄居在于孤儿院做事的贺澹江的姐姐家。

五更归梦二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钟说：“1929年我又到广州去找党，也就是找过去认识的同志，如利运洁、胡公冕、吴光远。日日夜夜找，总是找不着，又常发现有特务跟踪，苦恼啊！我是一个基层党员，又都是直线秘密领导的，找不到他们，还能上哪里去找党的线索呢？跑破铁鞋无觅处。估计上级党组织可能在香港、上海租界，但也是绝对保密的，又怎能找到呢？我贫病交加，彷徨复彷徨。至此，想利用自己学过军事、有实战经验的长处，找个职业暂时荫蔽下来，一边继续找党。就下决心去找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此时做寓公，本想求张介绍我到部队里带兵，以便有起义的机会，可是他介绍我到上海京沪铁路局常州、上海北站任警务分段长。”

“这时我又用钟健魂名。在铁路这段时期里，我与一些进步青年很接近，想通过他们也许能找到党。但当时又不知他们是否党员。近十位的青年中，现在记得的有荀彬（解放后为西南政法学院任副书记）、陈绍卿（解放后在民航局工作）等。其中，有一位告诉我：他们想在复杂的旧上海火车站做件重要事情，我表示默许。我多次试探谈组织问题，但他们都避而不谈。久而久之，铁路主管方面对我产生怀疑，撤了我的职务，另派一个国民党特务顶替我。”

从此，钟经常失业，也找不到组织，穷愁潦倒，苦闷异常，长太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没米下锅了，还在牌桌上消愁，气得已怀孕的妻子贺澹江吞了安眠药。翌日太阳已高，钟见贺仍不起床，喊也喊不醒，发觉不对头，急送医院才将妻子抢救了过来。通过这一段愁苦的日子，钟健魂更明晰了一个想法：要想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必须抓武装。

## 身入曹营心在汉

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上海铁路局派钟为防空专员。日军占领上海后，钟辞了路局的事，因而又失业。想去内地参加抗战，可黄埔六期同学孙立达、罗教柱劝钟就在南京做抗日地下工作，并介绍钟到日伪军校当中队长。钟想：这倒是一个抓军权的机会，就这样入了伪军校。当时罗教柱是汪伪典礼局的参军。罗通

过参军长唐莽向汪精卫介绍钟健魂是黄埔二期的军事教官，又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铁军中的一个团长。因此汪就将钟也安排在典礼局任参军。钟一心想拉支队伍回到党里，就利用参军身份积极活动。1941年，弄到一个旅的番号，招募了一、二千人，编为独立十四旅，钟任旅长，驻南京中华门外。钟说：“我当独立第十四旅旅长时，秘密而大胆组训人员，常讲辛弃疾及其祖父辛赞虽在金人占领区做事，而为宋朝出力的爱国起义杀敌的故事和西汉苏武牧羊词等。十四旅很快具备了起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寻寻觅觅找不到党，急死人。想把队伍拉至茅山新四军部，但没有联络人。结果，由于我从招兵、建旅、到一些活动都过分独立，引起了驻地附近日军的怀疑。日军派人在我旅驻地的水塘内投放霍乱细菌，以致很多官兵患传染病。我也被送入传染病院进行检查，企图害死我。我强求带随从医官同住。进医院后，不用医院的药，不用医院打针，甚至连喝的水都是自己副官从外面送来的，因而躲过了日军的毒害。同时托人外救，过了两礼拜，这才出了鬼门关——日寇防疫医院。我被送回十四旅驻地时，部队已被日军借口患传染病解散了。只好又回到典礼局。”

## 东山再起夺军权

“纵然计不成，慷慨志犹存。”钟皿浪失去了一次掌军权的机遇，但他没有泄气，而是总在寻找机会。当时南京有日本兵一千余人，有三个汪伪警卫师，有一个军官学校。警卫三师1944年成立，师长陈孝强，设有直属的炮兵连、特务连，师下辖七、八、九三个步兵团，分别驻防南京郊外句容、江宁、六合三县。该师全部日式装备；兵力来源：军官由伪中央军校的军官及原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充任；士兵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组成，是伪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陈孝强，广东人，黄埔军校二期学生，曾任国民党军队范汉杰部第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师长。1942年日寇对太行山进行扫荡，国民党军溃败，陈孝强被俘，解送南京。陈和汪精卫、陈璧君是同乡，陈即投靠汪、陈，并成其心腹。不料，1944年8月，三师驻光华门机场附近的士兵与日本兵发生冲突，打死了两名日兵，其连长被日军拘留，陈孝强也因此被免去师长职务。钟健魂借机活动，也因为他是黄埔二期的军官，此时又是参谋武官公署中将参赞武官，汪伪就派钟接任伪警卫三师师长。



##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钟健魂接受十四旅的教训,不再轻举妄动,为起义做了充分的准备。警卫三师平时就是训练军队,钟借此连续办了三个军事训练班。挑选爱国的、身体好的军士、班长、副班长 200 多人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军事技术,更主要的是通过师生关系培养一批自己的心腹。其中有位名李树春的,原是八路军被俘战士,钟将他连升两级提为中尉随从侍官。钟经常给李一些钱,让他周济同学买些烟酒,学生都称钟为老师,打破了森严的官兵等级关系,建立起较亲密的师生关系,这为后来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学生后来都在起义中代替了原来的排、连长。解放后李树春在北京廊房医院任副院长。还有他培养的士兵唐万春,解放后任江西三波电机总厂党委书记。

另一方面钟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钟听说原三师政训班主任赵鸿学曾接触过新四军,他就通过下棋逐渐接近赵。恰好赵是中共地下党员、汪伪军委会政治部秘书——徐楚光的亲戚,为徐的外围。徐、赵正感到三师的策反工作不好做,因为三师中、下级军官皆为汪伪和原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的,长期受反动教育。钟任师长后,徐、赵从侧面观察:发觉钟虽为中将师长,但生活作风正派,不赌不嫖,不时还同士兵一块吃饭,休息日与家人出门游玩,也不坐小车而是坐公共汽车。这在伪高级军官中是罕见的。因此决定向钟进行探寻。形成钟找党,党找钟的良好局面。

他们从下棋聊天中彼此逐步熟悉:徐、赵知道了钟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不是蒋的嫡系,敢于接近钟。一次,下棋交谈时,钟问赵在苏北李长江部的情况:“听说你在政治训练班受训时讲了一些新四军的好话,被关进了感化院?”又问赵:“你认识新四军里的哪一个?”赵答:“认识好多人,连陈毅我都见过。”钟又试探地问:“你既认识这些人,他们能不能和我来个互不侵犯呢?”赵向徐汇报,徐即去联系商定互不侵犯的事。不久徐要赵通知钟。某月某日有新四军 20 余人途经句容县,双方要互不攻击。钟即下令给驻扎句容的三师第七团:“没有师部命令,不准随时发生战斗。”这新四军的 20 余人果然顺利通过句容县。由此,彼此进一步默契。

随之,钟将赵鸿学安排在离解放区较近的驻扎在六合县的三师九团为团长。

就在钟暗中准备策反三师起义之时,钟的十五岁大女儿——澹泊从国民党大后方西安来了。她在西安从报上看到了钟健魂是大汉奸的消息后,义愤填膺,带

着大义灭亲的思想,随来往商人来到了南京。幼稚的澹泊言谈之间流露出对父亲的谴责,没想到父亲说了句:“哼!国民党还想和共产党斗”,说得澹泊莫名其妙,父亲要求女儿每周打扫庭院,培养艰苦朴素习惯的作法,也使澹泊感到父亲神秘难测。钟血浪说:“有次,澹泊注意我的手枪,问我如何上子弹,如何瞄准,我就警惕她了,把枪收好。她当时还是孩子,哪懂得我的心思啊!”

## 假传命令暗牵龙

钟健魂设想了三套起义班子:第一套是派师执法处主任高建章与淮南敌工部副主任陈雨田联系。1945 年初,即派高建章将江南三师仓库中的一些武器、弹药、电台潜运至江北六合九团的军库里,连九团团团长赵鸿学也不知道。高建章家就在六合,自家有船,其父是撑船的,因此,转移武器等极其秘密而又安全。第二套班子就是赵鸿学九团。第三套班子是钟亲自培养的军事班,以李树春为首的 200 余骨干。三套班子均由钟健魂分别秘密接触,他们彼此互不知情。当时钟处于日特、汪特、蒋特多方监视下,行动必须十分谨慎。有一天,钟到司令部去,汪的一个特务在与钟的谈话中,突然撂出一句:“你小心点,我枪毙你!”汪精卫也说:“我看你有悻悻之色。”因而钟总是小心地与各方周旋。与党的联系人徐楚光、赵鸿学的接触也是若即若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摊牌。

起义方式也准备两种:一是与新四军联系好,由那边接应。一是联系不上则采取战备行军,边走边派前哨联系。比如三师平时主要是练兵,只有一次命他们到茅山打新四军,钟即准备到前线后,当即联系起义,也打听好了是粟裕部队。但到那里后,新四军早转移了。

汪特威胁钟不久,钟也认为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带走三师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对赵鸿学说要直接与新四军代表见面,于是徐楚光就正式以新四军代表身分与钟见面。当时徐根据形势发展,对三师有两个方案:一是占领南京,一是把队伍带到解放区。钟认为占领南京一个师的力量不足。为使早日带队伍到解放区,钟佯称汪精卫可能要撤换他,要尽快起义。于是徐楚光一方面立即与新四军联系;一方面与钟共同研究起义行动方案。

当时伪军调动,必须有伪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如果引起日伪怀疑干预,不但部队带不走,反而要遭殃。于是钟健魂利用日本人过礼拜六回家休息的空隙,擅自用伪军军委会的名义命令七、八两团立即出发,务必于

13日前赶到江北六合竹镇,对解放区进行扫荡。钟本人是伪军军委委员,所以假传军委会命令,一时还可以蒙住下属中心向国民党的军官。钟发出命令后,立即亲自率师直属炮兵连和特务连连夜渡江。真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钟率领的直属炮兵连和特务连从南京通济门外上船,沿护城河进入长江,顺水而下,到达东沟,转入滁河,奔六合县城,与驻防六合的九团会合,朝安徽省大英集前进。七、八团驻扎南京附近,八团驻林陵关,南京正南顺秦淮河而下进入长江不远,在燕子矶被日本兵拦阻;七团驻句容,在南京东南,只有一个营过了江到了东沟,与师部一起走了。其他营则被敌人发现,受阻于江南。

1945年8月13日,进入六合解放区。新四军六合游击队不明底细,进行了阻击,将该师一名军官打伤,钟健魂下令不准还击。徐楚光也写条给游击队长,告知是起义部队。游击队长也不认识徐楚光,但见三师受到阻击没有还击,便当即决定派副区长王之春前来联系。证实了是起义伪军,即将该师带入钟家集,受到群众欢迎。

三师尚有一些顽固的下级军官不愿投向新四军,进行骚乱。有个姓彭的军官持蒋介石一份命令伪军“不许乱动”的电报威胁钟健魂,钟健魂立即秘密卸了他的枪支,看管起来。接着采取紧急措施:在钟家集刘保长家召开排长以上军官会议,由三师执法队和六合支队侦察队担任会议警卫,凡参加会议的军官进门时,得把随身枪支交给警卫人员。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先讲了形势,说明当汉奸没有出路,投降新四军才有前途。徐楚光代表新四军表示欢迎。钟还宣布:不愿投向新四军的,可发路费回家,如反抗,就地枪毙。同时赵鸿学向全体士兵,宣布三师起义的消息。全体士兵鼓掌欢迎,还宣布各班班长代替排长职务,排长代替连长职务,替换了所有原国民党和汪伪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

## 壮志虽酬母罹难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委会得知伪警卫三师起义抵达解放区后,立即派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刘长胜到钟家集接收起义部队。刘长胜也是钟北伐时期的战友,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乐事。而此时此刻的重逢更非一般可比。是游子经过了千般考验,万般坎坷,重新回到了兄弟姐妹的身边,回到了党的怀抱的大喜事。钟带回了3000余人。带过来的武器和弹药有:九二重炮9门,八五炮9门,七五炮16门,重机枪34挺,轻机枪117挺,步枪1100百余支,掷弹筒117个,弹药数十万发。另有

电台2部及其他物件。打破了蒋介石暗中指示“不许伪军乱动”、企图全部接受伪军作为他反共军力的幻梦,为解放战争增添了力量。

新四军军部接受了起义三师后随即决定:将起义三师编为华中独立第一军,由钟健魂任军长,同时给钟办了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手续;由刘贯一任军政治委员;徐楚光任军副政委并兼参谋长与第二师师政委;原九团为独立一军第二师,赵鸿学任师长,同时吸收赵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师编制暂空;原伪警卫三师师部直属炮连、特务连和第七团一营合编为军部直属特务团,由钟原准备的第一套起义班子负责人高建章任团长。

独立一军在淮阴码头镇整训期间,华中分局和华中领导人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接见了独立第一军全体人员,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

1946年3月,独立第一军奉命从码头镇向苏中海安开进,与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合编。钟皿浪任纵队副司令,赵鸿学任第五十五团团,炮兵连编入七纵队部。第七纵队司令刘培善、政委陈丕显。刘培善在苏中海安附近向独立一军干部致欢迎词中谈到“我们欢迎一位新来的纵队副司令——钟皿浪同志……”,当时43岁的钟皿浪不由得涌出了游子返家热呼呼的眼泪。他终于实现了1928年他在狱中的誓言:“只要不死,一定带两个营回到党里,一定要把在南昌和浏阳损失的两个营夺回来。”

钟皿浪的宿愿得偿,但他的母亲却被日伪抓进监狱,被国民党折磨致死。

钟皿浪在起义前4个月,即将妻儿送往苏州农村妻子的亲戚家。老母不肯离家同去,又不好向她明说,于是在带部队走之前,托付住校的大女儿澹泊:在钟走后由她带奶奶一起去苏州农村等候消息。可是大女儿澹泊也未能带走恋家而不知原因的奶奶。就在钟走后的第二天——星期日晚上,日本人察觉了钟假传伪军事委员会的行军令,当即包围了钟宅,逮捕了钟健魂的母亲。钟此时的妻子朱霞真说:“1945年4月份,健魂就对我说,顶好离开南京。我就带着六个孩子到苏州娘家住,奶奶不肯同我到苏州,总说:‘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有个烧饭的师傅照顾她。当时,健魂住在部队里,我就每半个月来南京看看他老人家。8月14日早上我在苏州家中,忽然有人送来一封健魂写来的密信,只有一张草纸,我用米汤涂,就显出了几个字:‘什么都丢开,带六个孩子走到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我非常纳闷,下午就乘车去南京,想看个究竟。我们家住鼓楼,我刚走到下关,遇见一个熟习的女警察,她紧张地

对我说：“你来干什么？赶快走罢，你们家被日本人包围了，老太太被抓到日本宪兵队了。”我只好掉头回苏州，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孩子们乘船到远离城市的偏僻的洞庭山我外婆家。后来，听我苏州的妹妹说，我离苏州第二天，来了便衣和伪军，问我哪里去了？不久，我就看到京沪报上登着日军投降的消息和国民党通缉钟健魂的通缉令。后来听说奶奶先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审问她儿子、儿媳妇哪里去了？老太太什么也不知道，挨了不少打，接着又被国民党折磨死了。”

钟健魂从小是孤儿，与其寡母相依为命。钟一向十分孝顺母亲，因此每说及其母的罹难，声音哽咽。

钟皿浪的妻儿后来都被接到解放区。大女儿滄泊也被接到解放区，她这才明白其父神秘的面纱后面的赤子之心。

## 七战七捷军旗红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钟皿浪带过来的这支起义部队中，有很多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不少同志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七纵在参加粟裕领导的著名的七战七捷中，五十五团三连就表现得很突出。曾当过钟皿浪警卫员、此时为三连战士的唐万春回忆道：“当时我是五十五团第三连二班的战士。三连就是南京警卫三师的师直属特务连，一律是日本三八式步枪，并有3挺歪把子机枪，3只掷弹筒，是五十五团最强的一个连。在七战七捷的如皋战役中，我连担任了主攻任务——切断，第二天是主攻打穿插，第三天打歼灭。第一天投入战斗，全连124人，第二天结束战斗时，剩下48人。但俘虏了100多人。其中俘虏用的也是歪把子机枪。我说了句：‘这好像是南京一师的枪。’一个高个俘虏说：‘我们就是南京警卫一师。蒋介石还都南京后，把我们编成补充一师，警卫二师编成补充二师。本来还有警卫三师，投八路军去了，当时日本人慌了，南京全城戒严三天，下了通缉令：谁能取到警卫三师师长钟健魂的首级，赏黄金一千两。’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南京大街上都贴满了通缉令，谁都知道。’我们三师过来的战友，多数牺牲在七战七捷和金门失利中，如今在如

皋城东南竖起了英雄碑。”

全国解放后，他们又积极参加了解放军的建军工作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47年夏，钟皿浪要求到华中党校学习。随后被派到华东军大任副教务长兼高干研究班主任，负责培养师、团干部。

军人是边打仗边上课。钟随军大一直打到济南，被分配到济南任防空司令，直到淮海战役结束。

大军南下后，华东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任命钟皿浪接管京沪区铁路管理局运务处。后历任杭州、上饶、上海铁路分局副局长。1955年，周总理任命钟皿浪为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直到1964年离休。

## 喜逢盛世度晚年

钟皿浪从1921年随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老同盟会员、孙文之友）由湘打入广州救援孙文起，至1949年解放战争，身经百战，何止九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成叛徒、特务，遭到革命小将的毒打，又一次与死神相伴。钟说：“当时，30来个年轻人，拳打脚踢我这一老翁。他们是些不懂历史的年轻人，哪里知道‘铁可折，玉可碎，海可枯，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呢？我不怪他们。旧中国太丑恶了，那时广州街上老鸨牵着被刺伤了双眼的童妓在路边拉客，真可怜；旧社会到处是骗子、流氓；失业的滋味也不好受，连吃饭都困难呀！上海租界上的巡捕也随意欺人；帝国主义看不起我们，残酷地杀害中国人，这都让人恨哪！……我尤其忘不了为新中国而牺牲的那些战友，那些战士。我跟随党打天下，建设新中国是我一生的宿愿，虽然受到许多挫折，我也感到很知足了。”

钟皿浪自60岁离休至今30年，风雨无阻地每天到他未离休前、领导开凿的交通大学的青年湖湖畔散步。如今他虽已满90岁，仍红光满面，腿脚灵活，头脑清晰，话音琅琅，文笔简洁，字迹刚健。

每到节假日，他总是微笑地欢迎来看他的各路儿孙，倾听他们的高谈阔论，当听到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信息时，他的微笑往往就变成了开怀大笑。

## 邮购 启事

本刊现有1993年精装合订本（总10—总21期），每本定价42元，邮费2元。欲购者可向杂志社或读者服务部汇款，款到发书。杂志社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邮编：100802，联系人：朗瑜。读者服务部地址：北京朝外金台西路机械工业学院分部《炎黄春秋》读者服务部，邮编：100026，联系人：李洁清。

另外本刊有创刊号至1992年底部份单行本（缺总第3期和总第9期），欲购者可按每本2.80元汇款到本杂志社。

# 齐燕铭遗札

●吴泰昌

数月前故去的齐燕铭，在海内外文化界向负盛名。三十年代初，他在北平诸大学教授时，就有《中国文学史》等著作面世。抗战后去延安，数十年来，他因忙于统战、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多年治学的心得大部未及形诸文字。这是异常抱憾的事。

比如，他对《红楼梦》就有不少卓见。1963年，国内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在故宫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会，曾轰动一时，不久被邀去日本展出，深得扶桑友人赞誉。齐燕铭与阿英主其事。他们常常为此交换意见，书信不断。这个展览，那些年被判为黑的，阿英保存的这类信札被作为罪证抄走了，至今多半下落不明。近日清理阿英遗物，意外地发现幸存二封，从中也可窥见齐氏红学观点一二。故特介绍。

阿英同志：

近得《龙岩诗词含钞》，其中有两则涉及《红楼梦》者，不知可供访求资料之线索否？送上一阅。原书阅后盼仍归还。

敬礼

齐燕铭

(1963年)七月四日

另一封也写于1963年。其时红学家对新近发现的曹雪芹像及《曹氏宗谱》有争议，他从北戴河来函，提出自己的见解。

阿英同志：

电画均悉，展览总算开幕了，真是大喜之至。五个月的劳动，成绩还不错，但把你累坏了。

曹雪芹像查明很好，但我觉得和王冈所画的未必是一个人，王画的那个人从样子看似更“酒肉”一些。

曹氏宗谱事已听昆仑（著名红学家王昆仑——引者）讲到。这是一大收获。看来这方面资料今后是可能多找到一些。据说谱上无曹，果然，那可能是做为不肖子弟除了名的。这在过去是常有的事。这倒更可做为“叛逆”的最好说明。

我大约月底可以回去，余面赞。

敬礼

齐燕铭

九月二十日

可以补充的是，前年夏季，有天下午，我曾陪上海来的两位友人，去三里河新居看望他。那天本意原是想请他为一家刊物写一篇回忆京剧《逼上梁山》在延安创作和演出的文章。经再三恳求，他允诺了。这篇长文，以《旧剧革命划时期的开端》为题，刊在1978年2月发行的《文艺论丛》第二期上，这也许是他有关文艺论述的绝笔。那天恰

逢北京少有的雷雨天，窗外大雨不停，经主人挽留，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谈到前几年的“评红”运动，他说有的观点混乱得很，有些评论文章的作者连书也没有读懂。他认为有必要撰写一部阐发小说有关文物典籍的书，否则时代久远，读起书里描写的生活会愈来愈感到隔膜。在归途中，我们曾议论，凭他的渊博学识和对旗人生活的稔熟，如果有时间，他准能写出一部漫说红楼的好书。去年7月，他在北京医院住院，他很想将来空闲时写一部读《红楼梦》的札记，不过目前不可能，还是争取先写一篇关于曹雪芹展览的文章，借此也表达对老友阿英的一点眷念之情。

齐燕铭是中国当代一位知名的书法家。这大概不是孤闻吧。于篆书尤其拿手，行草也好。他工作过忙，偶为友人书写条幅，纯出之厚谊。故他的手迹在世间流传不多。不止此，他还擅长篆刻。近些年劳作甚少，我曾见他为夏衍、李一氓所刻，足见其珍惜患难之情。他喜藏印谱，于铃印之理论极其精通。十几年前，当他得悉阿英近获铁云藏印二册，连夜趋访，阅之爱不释手，当即携回，与自家所藏一一相较，写下一篇精彩的读后记：

阿英同志尝从扬州得铁云藏印两册，白纸本，原封面题铁云藏印三集，上、下，犹是刘鹗手书。上册五十七叶。每册半单面朱拓六印，其面印以一面为一印，每叶承八印。上下两册共计六百七十九印。按刘鹗藏印铃拓成谱约在一九零五年左右。其书一叶一印三集之初稿也。以余所藏三集校此初稿，此虽少二十余印，然亦颇有此长而彼短者焉。如：余所藏虽得收藏者以臆标注册数，检之内容，殊清乱无理；初稿上册为秦汉以来私印，次两面印，下册先古官私印，次秦汉以来官印，次长宋文，次玉印，次套印，其排比虽未必得当，然亦稍有伦脊矣，此其一。余所藏本两面印均为一叶一印，与其他各印混淆难分；初稿两面印二十三叶，较然可识，如贵、嬰两字，若非初稿，即无法知其为两面印矣，此其二。初稿内有注明印页数者三十二处，亦另本所无，此其三。从来印谱甚少注明卷叶数者，藏印家谱既定稿，铃拓之役每假手他人，因之次第淆乱在所常有，西泠印社所出各谱，其边款甚至张冠李戴，不校原印，何由而知？此所以印谱稿本之可贵也。

一九六五年九月齐燕铭读后记

又余所藏本之第十四册，两面印缺三叶，无初稿本对校，亦无从而知。

据方家云，这是论述印谱很有价值的一段文字，同时它本身也是一页珍贵的墨迹。

# “赤子深情终未改，

# 欠多少父老相思债”

●刘 淮

战士扛枪，记者握笔，穆青，你一辈子没放下笔。从清凉山下到长安街大道，从千沟万壑到一马平川，五十多年了，跨越了半个世纪。你已不是当初穿草鞋揣铅笔走访边区劳动英雄的昂藏七尺少年，即便是如椽的铁笔，也早该磨秃了。古稀之人，你，该歇歇气了。“不，只要我活着，我的笔就不会停歇。”“那么，到哪里才是一站呢？”“这个，我从来没想过。”

是的，我早该知道会这样回答，因为从你全部的通讯报告，以及你的言谈举止中，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信息。

记得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春节刚过，雨雪菲菲，我走进新华社。心想，我将要访问的这位文章惊四海的名记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谈锋犀利、议论纵横的才子型文人，还是威严凝重一派领导干部的神气呢？都不是。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温厚长者，说话不多，语调平缓，连手势也很少。但是说着说着他便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神采飞扬，或是泪水盈眶，感叹不已。是什么使得这位见多识广的老记者如此激动呢？我发现，只要话题一沾劳动人民，特别是他曾结识的，他便仿佛换了一个人。

金字塔的月夜，威尼斯的水色波光，赞比亚雷霆万钧的维多利亚大瀑布，美国长木公园静谧的紫色睡莲，都曾使穆青迷恋。但是他朝朝暮暮思念的是祖国大地上默默奉献的劳动人民，真可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不写出他们的风貌和光辉业绩，他便坐卧不宁，欠债一般。正像他在《黄山抒情·金缕曲》那首词中末两句所写的“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相思债。鬓堆霜，丹心在。”

植林模范潘从正老人，外号“老坚决”，他那弯着腰背着树种，在飞沙走石的大地上蹒跚的身影，多年来就一直在穆青的脑海闪现。60年代中期，穆青写完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本打算就写老坚决的，但“文革”一来，万马齐喑，穆青的全部采访资料不知去向。在

牛棚里，他暗暗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会把他写出来！”十四年后，1979年，穆青终于推开老坚决的篱笆门。老人正弯腰侍弄树苗，他惊讶地回过头来，见到穆青便哭了。“十几年了，还没人到这里来看过俺。”是的，物换星移，连河南宁陵新上任的县、区干部也说不清老坚决是何许人，以及是否还在种树。可是穆青没忘，四处打听，八方寻觅，好容易才来到他家。老人捧出早年省、地、县发的奖章，上面已布满灰尘。穆青对同去采访的陆拂为说：“这是一颗尘封土埋的珍珠，我们要精心拂拭，使它重现光彩！”

果然，同年4月，大地一片新绿时，穆青与陆拂为合写的报告文学《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问世了。像一道闪电，三起三落种树不止的老坚决那高大形象，突然展现在万千读者面前！这，穆青才算了却一桩十四年的“相思债”。

穆青，这回你该松口气了吧？“不，还有任羊成哩，二十多年，我怎么也忘不了他腰上那一圈褐色老茧……。”

任羊成，河南林县红旗渠工地的抢险队长。他身系粗绳，凌空作业，飞身悬崖峭壁间。绳子勒得腰部血肉模糊，脱不下衣服。天长日久，结成一圈紫色伤疤，旧伤未愈添新伤，最后竟成了一圈褐色老茧！66年初，穆青见到他，摸着老茧止不住流泪，“羊成，你受苦了。”这样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汉子，怎能不写！又是“文革”风暴斩断了穆青的文思，但他对抢险英雄的怀念没有断线。1990年，穆青得知任羊成的一些消息后，让两位记者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任羊成，背面端端正正写着：“送给人民功臣任羊成同志”。1991年，穆青特邀任羊成来北京会面。见面不久，穆青就问，当年腰里的那圈老茧现在还有没有，排险时的脚伤落下毛病没有。1993年底，穆青从新华社社长的位置上退下，他仍然不肯休息，以七十二岁的高龄，顶风冒雪走访河南，又会见了任羊成。

转过年来不久，他写的《两张闪光的照片》便出现在报纸（《经济参考》2月26日）上。文章记述了任羊成在平凡劳动中惊天地泣鬼神的牺牲精神，以及穆青同他的深情厚谊，这笔长达二十多年的“相思债”才算有了个了结。

作为记者，采访了，写了，登了，人物的形象家喻户晓，倍受欢迎，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他必须重新上路，去寻访新的人，新的世界。原先的人和事，渐渐漂远了，淡忘了，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啊。穆青，你呢？“啊，哪里忘得了！他们一个个都铭刻在我心上，风雨抹不掉，时间冲不走。他们那惊人的智慧，无穷的创造力，为子孙万代造福的高尚品德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是我的楷模，也是我写作的源泉和动力，又怎能忘记？何况他们当中有的人已同我结成生死之交哩。”

这使我想起了植棉模范吴吉昌。

1978年，穆青同陆拂为、廖由滨合写的报告文学《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发表，从此十多年来，两人的交往便没有断过。1980年，吴吉昌进京开会，送给穆青一株棉花，枝枝杈杈满缀着银桃。他说：“俺就是个摆弄棉花的，棉花就是俺的命，啥时候你看见这棉花了，啥时候就看见俺了。”

1982年吴吉昌进京，捎来二斤新棉花。穆青过意不去，说以后再别捎东西。棉花，北京哪里买不到！老人摇摇头说：“俺知道北京有，可这棉花是俺自己试验田里种的，老伴特意弹的，绒长，暖和着哩！俺就是想让你絮个褥子铺在身下一准暖和。你身子暖和了，俺心里也就暖和了！”

1987年，老人患了前列腺癌到北京动手术，穆青正要出国访问。临行前一天，赶到肿瘤医院看望，并交代自己的秘书常去照顾。在国外半个多月，穆青始终悬着一颗心，直到回国看见老人术后身体逐步康复，才塌实下来。到吴吉昌家看看，是穆青多年的愿望，1990年他果真到山西闻喜县的涑水河畔登门拜访。两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吴吉昌执意要留穆青吃午饭，他头天就指挥家人把菜洗得干干净净，煎饼摊得薄薄的，馍蒸得白白的。还宣称：“明天，他们（指县上）要拉穆社长走，俺就叫娃娃把大门拴上，拴上大门他就走不了啦！”

饭也吃了，实验田也参观了，专区和县里的同志催穆青上路，可这老哥儿俩实在是难分难舍。谁能想得到他们告别的场景吗？叮咛、挥手，久久伫立……，不，凭谁也休想猜到。还是让我们读读穆青《涑水情》（《瞭望》90年35期）中的末两段吧！

饭后，县和专区的同志催促我上路，老人高低不让

走，说他还要给我表演一下他老家山东的抬花轿哩。我知道他是想留我多呆一会儿，便鼓掌欢迎。于是老人把白手巾往头上一裹嘴里哼着抬花轿的小曲，便当场舞蹈起来。只见他手舞足蹈，扭腰甩胯，左一脚，右一步，走出了一套套花样。那神态，那舞姿，逗得乡亲们一阵阵大笑。但当这满堂笑声过后，一阵悲凉之感却蓦地涌上心头。我了解老人的心情，更感激他的美意，但他毕竟是81岁的高龄，又是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啊！没有那种真挚深沉的感情的冲激，他怎能有如此神奇的活力，难得的兴致！

眼看就要分手了，老人默默不语，我心里也不好受，只一个劲地叮嘱他快去北京复查一下身体。同志们一再催促我上车，而老人却突然拉起我的手悄悄地说：“让俺再陪你走几步……”说着便向汽车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们手拉着手默默地走着走着，50米、100米，走过去又绕回来，我看见老人浮肿的脸紧绷着，眼睛里闪烁着湿润的泪光。

车开了，我不敢回头看，我知道老人正呆呆地望着我，望着我……

这真是人间至情的流露啊！纵使李白《赠汪伦》的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也还没有达到这种刻骨铭心的地步吧。

但是，更有谁能想到吴吉昌临终前的愿望呢！他自知病魔缠身，即将不起，便反反复复交代家人他唯一的希望和要求：“俺老了，离该走的日子不远了。等俺走时，啥也不带，就把老穆送给俺的这两本挂历给俺带上。”挂历不是什么稀罕物，但那是穆青送的，上面印有穆青拍摄的海外风光，吴吉昌希望在自己静静地躺在地底下时，有它作伴就不寂寞了。92年12月，吴吉昌去世，穆青正在病中。他发着烧含泪写下挽联，让秘书专程送去，上联是“廿载论交为兄为弟涑阳北京存知己”，下联是：“一朝诀别我痛我悲人间天上有余哀”。

穆青，像你与吴吉昌这样生死阻隔不了的友情实属罕见。就你来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不，还有老坚决，还有……”。

前面提到的种树老人潘从正，穆青曾四次前去他家访问。两人在门前合栽了一颗泡桐树，穆青在一篇文章里称之为“我心中永生的树”。他们的友谊就如这棵树，年年开花，芳香四溢。老坚决八十高龄，记忆力衰退，耳朵也有点背，但是对于穆青四次迈进家门，他能清清楚楚说出是哪年哪月哪日，每次穿的什么衣服，说的什么话。穆青无意中提起“樱桃好吃树难栽”，自己早已忘却，老坚决却在自己的苗圃里试栽了两年，楞是让人挑着担

子把樱桃树苗从家乡送到北京的新华社大院。1986年，老坚决打发孙子园林风风火火来北京，要见穆青。穆青吓了一跳，以为老汉出了什么事。园林说：“俺爷逼着我到北京来，说他好几年没见你了，想你啦，非要我来看看你啥样不可。”“就为看看我，值得跑一趟北京？”穆青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他找出一张自己的彩色照片交给园林，“把这张照片交给你爷爷，让他看看，我还是很好吗！”老坚决收到以后，特意将它放进镶嵌家人照片的镜框中央，时时摩挲着镜面，不忍放手。

1989年底，老坚决去世了。穆青流着泪对人说：“我还是真想他。”如今，老坚决坟前已是青草萋萋，立在坟前的那块墓碑，是穆青为文并亲自书写的，凝聚着这位老记者的哀思和对亡友的赞颂，是散文，也是诗，加上他那刚劲峭拔的书法，可说是珠联璧合。碑文如下：

长眠在这里的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名叫潘从正，人称“老坚决”。

他在世八十七年，却有半个世纪抛家离舍，同妻子住在沙荒地培育苗圃植树造林。风沙曾掩埋过他，断粮几乎使他送命；病了，他不肯离开，老了，还趴在地上拖着土袋修了五十米坡路。

他千辛万苦移栽的苗圃和防护林，历经劫难，几起几落，但他并没有气馁。他说：“他毁，俺栽，他再毁，俺再栽，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

此处原先有棵老柿树，年年都挂果，纵是压弯了腰也硬撑着。他常夸这老柿树不偷懒，说人生也

是一棵树，也应该多结果。老柿树移栽到别处后，他对家人说：“我死了就埋在这里。”

如今，他的遗愿实现了。经他培育的树苗已经绿满宁陵大地，四里长的防风林已堵住了万碧风口，两千多亩风沙地也已变成良田。人们将永远怀念他。你看，那高大的树干，是他坚实的身影；雪白的梨花，是他高洁的灵魂；绿色的风涛，是他爽朗的笑声；郁郁葱葱的林带，是他生命常青的丰碑……

他默默奉献的一生，是我国一代农民的风范，他为国家为人民织网劳蛛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历史将会证明，他比我们更年轻。

穆青，这篇碑文，连同你所写的许许多多通讯、报告文学，都不是单纯赶任务创作出来的，而是从你的心底流淌出来的一曲曲劳动人民的赞歌，歌中将普通百姓的荣辱沉浮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形成庄严美丽的乐章。你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博大深沉，充满活力。它们飞进千家万户，扣响了多少人的心弦！如今，你以古稀之年仍然跋山涉水行走在大地上，怀里依旧揣着笔。作为记者，你的青春常驻！还记得吗？16岁你参加八路军，将“穆亚才”三个字改为“穆青”，取意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 李登辉秘书雷秉章退休当算命先生

●翟书惠 石林

雷秉章，台湾“总统府秘书室”秘书。他跟随李登辉四十年，从省政府农林厅、“农复会”、“行政院”、“台北市政府”，一直到“总统府”，雷秉章一直是李登辉身边不可须臾或缺的首席智囊，更是李登辉最倚重的资深行政幕僚。

年届七十余岁的雷秉章，正式卸下职务，闲来无事，想到以邮寄方式为别人算命，让许多老同事惊异不已。雷秉章说：“佛家重施舍，有所谓的法施之说，也就是用你的智慧帮助人。我为人算命，从不在乎别人给不给钱。”

这位“总统”幕僚是怎么会上算命的呢？

1956年10月15日这一天，当时任职台湾省农林厅的雷秉章，奉派到云林去出差。归途因错过客运班

车，只好在北港街头徘徊。忽然看见前面有间小书店，反正还要等三小时才会有班车，便信步向小书店走去。就在那毫不起眼的乡间小书店里，雷秉章买了一本专门讲八字算命的《渊海子平》。刚买来这本古文相命学专著时，翻来翻去难以理解。

“我就有这样的脾气，愈是看不懂，我愈是要看！”他足足花了四、五年的时间，终于弄懂了这本书的理论，并且以农林厅的同事为对象，进行实习，尝试替人批八字、算命的乐趣。

有一次，雷秉章为李登辉算命，他断言：“中年比少年好，晚年比中年更好。”因为当时两人兼有公私情谊，彼此把算命当作公余的雅趣，并不认真。

雷秉章退休之后，认真当起算命先生了。

# 灵验的「红兜肚」

●柳萌



吃五谷杂粮，难免要生病，有了病治疗就是了。问题是有的病，检查不出病因，医生无法医治。就拿我来说吧，长期以来肚脐疼痛，做过粪便化验，做过钡餐造影，都没有查出病因，中西医都无可奈何。我忍痛生活了二十几年。

有次同我三弟谈起此事，他说505元气袋能治杂症，建议我不妨试试。抱着有病乱投医的想法，托一位好友给我寄来一个，拿到手里一看，我不禁窃笑起来，心想：这不是小时候戴的兜肚吗，这也能治病？！既然拿来了，就戴上呗。我过去有时肚病半夜被疼醒，最严重的时候，得起来揉着肚子走动。戴上这“红兜肚”两个月之后，夜里疼痛明显减轻，白天还有时放屁，渐渐地肚痛在缓解。这“红兜肚”，还真灵验。戴了半年，闻着药味儿淡了，我又在药店买了个新的戴，没想到，连大便干燥的情况，都有一定的好转。这时我完全被这充满祖国医学科学神奇的“红兜肚”折服了。

我曾向一位中医朋友探讨过此事，他说，中医讲究“气不通则痛”的道理，505元气袋，既然有化淤疏气的作用，当然就会使你的肚痛消解。中医中药好就好在能调整人的身体。朋友讲的这番话，使我明白了，这“红兜肚”，是有科学道理的，难怪它有疗效。

如今市场上的医疗保健品很多，有的别看价钱贵，却不见得有疗效。象505元气袋这样即有疗效又经济的保健品的问世，实在是给普通百姓造福的公德高，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更多人的欢迎。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我觉得固定方法还需改进，炎热的夏天围着紧绷绷的带子，实在不好受。我自己曾试着改进过，结果并不理想，只好求助发明家啦。（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中国作协编审。著作甚丰，作品多次在全国性的评选中获奖）

## 欢迎邮购 505 神功系列医药保健品

### 神功元气袋（普通型）

功能与主治：健脾益肾、调整气血、通经活络、平衡阴阳，用于脾胃两虚、气血不足、阴阳失调所致的胃脘痛、慢性胃炎、腹胀、腹泻、中老年虚劳、阳痿、腰肌劳损及妇女月经不调、痛经、带下等病症。长期使用，可增强体质，改善微循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无毒副作用。每个邮购价：82.50元

### 神功药枕

主要功能：滋养精、气、神、平衡阴阳、扶正祛邪、清肝明目、醒脑开窍、益智安神、芳香避秽、清热解毒、通脉活血等。

保健治疗：神经衰弱、头晕头痛、健忘失眠、胸闷心悸、咳嗽气喘、咽喉肿痛、伤风感冒及高血压病、脑血管病、颈椎病引起的诸症。每个邮购价：82.50元

### 神功元气袋（儿童型）

功能与主治：健脾益肾、益气养血、消食化积、平衡阴阳，用于小儿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腹泻、遗尿等症。长期使用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无毒副作用。每个邮购价 82.50元。

### 神功健美纹胸

主要功能：滋养精、气、神、平衡阴阳、扶正祛邪、祛风散寒、舒经通络、活血伸筋、益肾温经、健脾和胃、清热解毒、益气养血、丰乳防萎。

保健预防：乳腺增生、乳腺炎、乳房无名肿块、乳房发育不良。并对预防肿瘤癌变、缓解或治疗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等妇科杂病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邮购价：82.50元

受厂家委托，北京紫金台经济文化发展公司向广大患者代邮购上述保健品。请大家汇款时注明品名及数量。

汇款地址：北京市文津街7号北图分馆内6号楼

郭玉华（收）

邮编：100802



# 《炎黄春秋》杂志征求改进意见表

亲爱的读者：

您们好。《炎黄春秋》杂志于1991年7月创刊，到现在整整3年了。3年来，本刊在广大读者的热心关怀和支持下，在上级机关和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作出了一些成绩，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为了改进工作，提高本刊的质量，使本刊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各项工作有一个较大的改进，出现一个新的面貌，在全国众多报刊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此，我们特印发征求改进意见表，希望爱护本刊的广大读者踊跃提出您的意见。请在下列各项提问中，划(√)、划(×)，或写上您的意见。此表填好后，请寄交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炎黄春秋》杂志社收。邮编100802。谢谢合作！

《炎黄春秋》杂志社

## 一、读者对象调整

### (一) 年龄阶段

1. 25岁以下( ) 2. 26—35岁( )  
3. 36—50岁( )  
4. 50—65岁( ) 5. 65岁以上( )

### (二) 性别

1. 男( ) 2. 女( )

### (三) 文化程度

1. 初中( ) 2. 高中( ) 3. 大专( ) 4. 大学毕业( ) 5. 大

学毕业以上( ) 6. 其他( )

### (四) 月经济收入

1. 300元以下( ) 2. 300—500元( )  
3. 500—800元( ) 4. 800元以上( )  
5. 其他( )

### (五) 职业

1. 党的工作( ) 2. 政府工作( ) 3. 教育( ) 4. 科技( ) 5. 文化( ) 6. 部队( ) 7. 商业( ) 8. 工业( ) 9. 农业( ) 10. 新闻( ) 11. 医务( ) 12. 服务行业( ) 13. 无职业( ) 14. 其他( )

### (六) 职务

1. 政府工作：a. 一般干部( ) b. 科长( ) c. 处长( ) d. 司局长( ) e. 部长( ) f. 部长以上( ) g. 其他( )  
2. 教育科技：a. 教授、研究员( ) b. 副教授、副研究员( ) c. 讲师、助理研究员( ) d. 教员、实习研究员( )  
3. 新闻出版：a. 高级编辑、记者( ) b. 主任编辑、记者( ) c. 编辑、记者( ) d. 助理编辑、记者( ) e. 其他( )  
4. 医务工作：a. 主任医师( ) b. 副

主任医师 ( ) c. 医师 ( ) d. 助理医师  
( ) e. 其他 ( )

## 二、阅读情况

(一) 您是通过何种渠道第一次听说或看到本刊的:

1. 亲朋友好介绍 ( ) 2. 从图书馆阅览室看到的 ( ) 3. 从邮局发行广告知道的 ( ) 4. 从报刊发行广告知道的 ( ) 5. 从电视广告知道的 ( ) 6. 其他 ( )

(二) 您是怎样得到本刊的

1. 从邮局订购 ( ) 2. 从杂志社订购 ( ) 3. 零散买的 ( ) 4. 其他 ( )

(三) 您订购(或零买)的本刊。

1. 您自己一人阅读 ( ) 2. 全家阅读 ( ) 3. 阅后转给其他亲朋好友阅读, 大约几人 ( )

(四) 您是何时开始阅读本刊的:

1. 1—6月 ( ) 2. 7—12月 ( ) 3. 一年之前 ( ) 4. 两年之前 ( )

(五) 在您心目中,《炎黄春秋》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杂志(可有一种以上的选择):

1. 严肃性的 ( ) 2. 消遣性的 ( )  
3. 史料性的 ( ) 4. 知识性的 ( )  
5. 文献性的 ( ) 6. 其他 ( )

(六) 您最喜欢阅读本刊的哪个(或哪几个)专栏:

1. 求实篇 ( ) 2. 春秋笔 ( ) 3. 英杰谱 ( ) 4. 殒星篇 ( ) 5. 人海浪 ( ) 6. 文萃苑 ( ) 7. 古镜台 ( ) 8. 时代风 ( ) 9. 其他 ( )

(七) 您认为本刊刊载的哪篇或哪几篇文章最好 ( )

(八) 您认为本刊刊载的哪篇或哪几篇文章最不好 ( )

(九) 您认为本刊在您所阅读的刊物中, 是:

1. 最好的 ( ) 2. 比较好的 ( ) 3. 一般的 ( ) 4. 比较差的 ( ) 5. 最差的 ( )

## 三、改进意见

(一) 您希望本刊增加哪些栏目(可选择1项或几项):

1. 现代人物 ( ) 2. 现代题材 ( )  
3. 历史人物 ( ) 4. 历史题材 ( )  
5. 中共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 )  
6. 国民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 )  
7. 其他党派的 ( ) 8. 海外华侨华裔的 ( ) 9. 民族的 ( ) 10. 其他 ( )

(二) 请您在下列编辑发行工作中举出最需改进的项目(可举出1项或几项):

1. 编辑工作 ( ) 2. 校对工作 ( )  
3. 图片 ( ) 4. 印刷 ( )  
5. 制版 ( ) 6. 纸张 ( )  
7. 收到时间 ( ) 8. 其他 ( )

(三) 您希望本刊增加哪一类文章, 请举例 ( )

(四) 您希望本刊能为读者做哪些工作:

1.  
2.  
3.

(五) 您还有其他何种批评和建议

1.  
2.  
3.

# 炎黄春秋



右起：蒋纬国、张梦白



## 李立三的绝命书

## 张梦白与蒋纬国的师生情谊

## 笔魂

——记书法家王明远

## 女诗人英露的苦难人生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3.20元